

炎黄春秋



周恩来和赵丹谈文艺需要民主
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
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

奇人陈翰笙要跨三个世纪

斯诺眼中的焦点时刻

骇人听闻：

40万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

血战上甘岭

——李德生的回忆

10
96

总第55期



李德生

长征·世纪丰碑

大型诗书画展在京举行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型系列活动主要项目之一——《长征·世纪丰碑》大型诗书画展9月8日在京拉开帷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迟浩田，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为书画展题词。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老红军萧克、陈锡联、马文瑞等同志出席开幕式。

展出的一百五十多幅书画作品中，有著名书画家关山月、陈大雨、崔子范、王成喜、林墉、慕凌、赵绪成、王天一等歌颂长征胜利的艺术精品，也有马文瑞、王平、叶飞、伍修权、李德生、张爱萍、陈锡联、杨成武、萧克、廖汉生等近七十位老红军的墨宝。

← 萧克参观画展

↘ 钱伟长参观画展并会见张铨秀将军

↓ 马文瑞参观画展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 11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4.00 元

春秋笔

- ②周恩来和赵丹谈文艺需要民主.....周 哲
⑥韦国清与冀边府大捷.....王振华 张广华
⑨陆定一与百家争鸣方针在遗传学中的运用.....于光远等

他山石

- ⑫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韩凤琴

英杰谱

- ⑬搞原子弹王淦昌埋名 17 年.....马京生
⑯奇人陈翰笙要跨三个世纪.....张 彦
⑳血战上日鹫.....李德生
㉑我所了解的孔从洲.....杨荫东

殒星篇

- ㉒我的老师闻一多.....李曦沐
㉓胡耀邦和他的警卫员.....舒 云
㉔古柏一生遇一知己.....陈其明
㉕斯诺眼中的焦点时刻.....武际良

文荟园

- ㉖“马上诗人”张爱萍的长征诗.....东方鹤

时代风

- ㉗异国航天业巡礼.....剑 盟
㉘贵州人翻贵州山.....刘宏伟

人海浪

- ㉙中央苏区第一任妇女部长周月林的曲折人生.....万 刚 辛 畅
㉚芬娜走进蒋介石家门.....窦应泰

遗闻录

- ㉛骇人听闻:40 万女性沦为日军的性奴隶.....苏智良
㉜长征途中红军骑骆驼坐骑.....于 东

神州光

- ㉝杨廷宝:中国现代建筑的创始人.....孙宅巍

古镜台

- ㉞洋务运动:一个悲怆而沉重的话题.....徐庆全
㉟司马迁后人今安在.....李 钱

周恩来和赵丹 谈文艺需要民主

● 周 哲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著名的“新桥会议”。

新桥会议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6月6日晚,周恩来来到新桥饭店看望代表,在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个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个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与赵丹已是老朋友,便问:“都有谁在?”赵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说黄宗英病了,对赵丹说:“走,去看看去。”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了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声琅琅地进得屋来,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赶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好。改造也不在外表。”

正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几位未去看电影的代表找来,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等人。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我没有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

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从事演员工作,1959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对黄宗英来说,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太强,任务压得又紧,层层领导对剧本审查关口过多。黄宗英搞了一年的编剧工作,剧本绝少成活,一急竟然病倒了。这次她是带病来京参加会议的。黄宗英遇到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新桥会议的小组讨论中,许多艺术家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大家见周恩来来了,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满肚子的话想说,三言两语就讲到了会上讨论的情况。黄宗英鼓足勇气问:“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说就说呗。”黄宗英便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隔行的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接着她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上海市委为了塑造基层党的书记的光辉形象,交给上海电影局一个重大题材,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这一任务落到黄宗英等人头上,可偏偏她这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上



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电影工作者在香山。站在周恩来前面的是赵丹

级要求他们两个星期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阵。这样的阵容，把创作组的人员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阵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好不容易把提纲顺了下来。大家私下里说：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

黄宗英的话使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早就听说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有怨言，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黄宗英说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周恩来还得知，会上争论得最激烈的作品是《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人认为小说写得好，有人则认为电影改编得好。这篇小说酝酿和创作于1957年。作者高缨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发表以后，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而创作的。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舒畅的心情，试图反映彝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小说于1958年初发表，很快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嵋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电影，请作者

高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恰在这时，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宣扬的是“人性论”；还有人干脆批评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工作者是最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为此，高缨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时，把那些涉及到“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尽管如此，对这部作品的议论仍然不断。

电影拍成后，恰逢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会上放映了这部片子，并把小说发给与会者对照影片进行讨论。赵丹和黄宗英等人看了以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

周恩来听大家说完，更感兴趣了。他伸手向陈荒煤：“能不能发给我一本？”正巧赵丹手头上有这本书，但上面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恩来离开新桥饭店，已经很晚了。走时他要求陈荒煤：每期的会议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6月17日晚上，周恩来又来到新桥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谈话，研究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6月18日下午，他再次约陈荒煤等人到中海西花厅座谈。当晚，

周恩来特意调来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与有关人员一起观看。

6月19日下午三时半，周恩来来到大会会场，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我首先声明，今天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怎么改？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提出：“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为什么一国总理的话会被“打入‘冷宫’”，他何以“难过”？在座的有人十分清楚。原来，1959年春，为纠正“大跃进”以来文艺界盲目强调数量、忽视质量，违背客观规律，走向极端所产生的一系列恶果，周恩来非常焦心。4月24日，正值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马上要接受24小时的卧床治疗的周恩来，仍然利用这天早上的机会约请电影界代表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陈荒煤等人到医院病房里座谈。周恩来以老朋友的身份亲切地说：“一个时期以来，我想到一些问题总想找你们谈谈。通过几次会议，我发现文艺工作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一条腿走不好。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这次谈话10天以后的5月3日，周恩来再次召集文艺界人士到中南海紫光阁开座谈会，会上，他以《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为题，专门讲了文艺工作的辩证法。他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这本来

是老问题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同志常常强调这一面，忘记那一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在‘大跃进’中，产生一些缺点，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接受教训……”接着，他讲了文艺工作的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问题。最后告诫文艺界：“要从思想到工作方法，学会两条腿走路，以便做好我们的工作，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不断前进。”

周恩来语重心长的话，按理说应该能够促进文艺部门纠正当时走极端的倾向。然而，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这一讲话并未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甚至文化部和一些省市都未向下传达。以致在后来几年中，文艺界的问题和“左”的错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

周恩来在新桥会议上讲话中所带的特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时隔两年，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新桥会议的机会抓紧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他说：“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在讲话中，他首先表示：“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

除了“开场白”，周恩来一共讲了七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七大感想。这些问题，对当时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

周恩来严肃地说：“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已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他还提醒大家：“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达吉和她的父亲》，并谈了赵丹、黄宗英和他自己的感受：

“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指“温情主义”——引者）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

“小说比较粗犷，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

赵丹坐在台下仔细地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倍受鼓舞，感觉太过瘾了，尤其是国家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赵丹非常感动，他忘却了台上的周恩来是总理，只觉得自己是在听一位朋友讲话。

尽管赵丹“看电影时流了泪”，他仍认为小说比电影强；尽管周恩来看电影时“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并且对小说和电影作了各有所长的评价，他还是讲“小说比较粗犷”，“电影加工较小说好”。赵丹认定了他的看法，想找周恩来论论理。

7月1日，周恩来邀请大家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

这天，周恩来兴致勃勃地来到香山，烈日炎炎，翠柏青青，周恩来与大家拾级而上，谈笑风声。赵丹此时拽着周恩来讨论起《达吉和她的父亲》来。

“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周恩来感兴趣地问。

赵丹直言：“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

赵丹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冲着赵丹既亲切又不示弱的语气说：

“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围人被他俩的认真劲逗笑了。这一场景下，香山的游人早已认不出谁是国家领导人，谁是普通的艺术工作者。更让大家感到不一样的是，在山上照合影相时，周恩来几乎都是站在后排的角落上。

后来赵丹回忆香山之事时，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原来，赵丹在来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刚开会的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为此，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就问他：“阿丹，你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赵丹的话后来被周恩来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参加会议时，亲自点名叫赵丹发言说：

“听说你不敢讲话了？你说吧，在我面前还有什么顾虑呢？”

一路上，周恩来与大家边探讨问题边游览，最后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他还指指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补充说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

游香山的第二天，新桥会议闭幕了。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讨论情况和周恩来讲谈的精神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党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左”的思想得不到根除，这两个文件也未能真正实施。但是周恩来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民主作风，深远地影响着党的文艺工作。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韦国清与奠边府大捷

● 王振华 张广华

1953年5月,法国殖民主义者任命纳瓦尔为印支远征军总指挥。纳瓦尔抛出一项军事计划,要点是:他首先要消灭南部和中部的越南人民武装力量,然后集中全部兵力与越南人民军的主力决战,夺取决定性的胜利。为实现这一计划,法国殖民主义者为此增调兵力,美国为其增加军援。纳瓦尔又在南越大力

扩充伪军,并集中精锐兵力作机动力量,妄图夺回战争主动权。1953年秋,他派员空降奠边府和增兵上寮,建立起连接上寮和奠边府的南乌江防线,以图阻止越南人民军完全解放越南西北和进军上寮地区。

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于1953年夏天回国述职后,于10月25日回到越南。韦将毛泽东、彭

德怀关于越南战场作战方针和重大措施的意见,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作了转达。

胡志明当即表示:“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正确的,实行这些方针、措施,就可粉碎纳瓦尔计划。”

韦国清根据中共中央和胡志明的指示精神,帮助越南人民军制定了冬季攻势作战的全面计划和部署:1.使用两个多师的兵力攻取莱州地区,然后进军上寮。这是主要作战方向。2.以两个团的兵力攻中寮;以一个加强营进入下寮。同时中部五联区的主力攻取西原,造成南北夹击上寮之势。整个部署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经验。它从越南战场实际情况出发,避开了红河三角洲法军力量集中、防御严密的强点,去攻击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而敌人防御薄弱的地区。

1953年11月,韦国清随越南前线指挥部赴西北作战途中,获悉法军空降奠边府。12月7日,莱州守敌也弃城向奠边府,遂与越方商议:掉师追击逃敌,包围奠边府。越方决定,增调兵力,发起奠边府战役。

奠边府是一块不大的南北狭长的盆地。在这块小平原上,法军集中了一万多人的精锐部队,并配以重炮、坦克和飞机等重型武器装备,建立了8个有多层火力配备的据点群,挖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据点周围设有多层铁丝网、电网,还埋有密集的地雷。修建的两个飞机场,每天可空运数百吨物资。法国国防部长、法军总参谋长专门邀请了美军高级将领视察了奠边府的设防,他们声称这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炮台”,是“东方的凡尔登”。纳瓦尔还狂妄地扬言要在奠边府“碾碎”越南人民军队。法军采取这种集团据点群的防御作战形式,始于1952年冬的西北战役后期。当时正在前线的韦国清敏锐地认识到,这是法军针对越南人民军无大口径火炮、攻坚能力差而制定的。因此,他在那次战役后就建议,越方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加强炮兵建设。经中国政



中国顾问团领导人韦国清(中)、
邓逸凡和梅嘉生在北越前线

府同意,在中国境内为越南人民军装备和训练榴弹炮和高射炮部队。二是加强部队攻坚战术训练,提高军事素质。1953年5月,上寮战役结束后,韦国清帮助越南人民军抓了这项工作。他指导军事顾问团同越南高级干部共同研究编写教材,以统一战术思想,并用统一的教材进行军事训练,为下一个冬春战役的胜利打好战术基础。

1954年1月,越军增调步兵和炮兵部队,包括在中国装备训练好了的榴弹炮、高射炮部队,相继抵达奠边府前线。这时,越军共有四个步兵师和一个工炮师。对奠边府形成了紧密包围。

从1953年12月下旬起,进入中、下寮和西原北部的越南人民军主力进展非常顺利,消灭了不少敌人,缴获了大量军事物资,解放了越南西原北部和中、下寮大片地区,控制了越南通向老挝、柬埔寨的六条东西向公路,斩断了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战略交通线,打乱了纳瓦尔的战略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抽调机动兵力去增援中、下寮,而无力大规模增援奠边府。

1954年1月,韦国清又建议越方在进行攻奠边府准备的同时,抽调三〇八师向南乌江一线发起攻击,15天内歼敌五个多营,解放了南乌江流域,使奠边府法军陷于完全孤立。

经过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的越军,军政素质有很大提高,但是面对奠边府这样强大坚固的法军集团据点群,敢不敢打?能不能打?怎样才能打胜?越军指战员中有些人对困难看得过重,信心不足,担心打不下来。根据这一情况,韦国清领导军事顾问团,首先通过与越军前线指挥部主要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研究工作,达到统一思想认识,定下作战决心。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对越军干部做解释说服工作。在越军前指于1954年一二月间召



韦国清、梅嘉生同越南人民军领导人武元甲等在研究作战计划

开的两次干部会议上,韦国清和顾问团副团长梅嘉生先后应邀讲话。中国各政治顾问还帮助越方加强对部队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有针对性地进行战前的思想动员工作。

韦国清还亲自制定了“剥竹笋”战术,就是一层一层地剥,一口一口地吃,以求最后全歼敌人。

1954年3月上旬,周恩来总理鉴于由苏、美、英、法、中五国和朝鲜(包括南朝鲜)、越南(包括越伪政权)等共二十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将于4月间召开,向我驻越军事顾问团提出,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之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韦国清认为,根据当前的情况,要配合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斗争,只有在奠边府想办法,力争全歼奠边府守敌。韦国清与越方研究后认为,攻击奠边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于3月中旬发起攻击。

韦国清本着毛主席教导的首战必胜的原则,领导各师的顾问组,帮助越方精心组织了第一阶段作战。一举攻歼奠边府北面的兴兰和独立山守敌各一个营,迫降班桥守敌一

个营。第二阶段作战部署是,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和全部炮兵火力,对芒青中心分区之敌进攻。以紧缩包围,控制机场,3月30日晚,战斗开始后,突破前沿顺利,但进入纵深时,法军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进行顽抗和反击,越军干部缺乏应变能力,部队伤亡增多,攻击受挫。

这时,日内瓦会议即将召开,奠边府成为朝鲜停战后举世瞩目的又一个战争热点。中共中央军委不断地向韦国清催问战况,并对如何啃下奠边府这块硬骨头提出了具体意见。韦国清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结合战场实况,帮助越军总结战斗经验,改进作战指挥,补充和整顿了部队。为加强对法军的围困和打击,一是组织部队大挖战壕,逐步紧缩包围圈。用战壕将芒青中心分区与南分区之敌分割开来。战壕一天一天向前延伸,主壕、支壕纵横交错,把法军分割得七零八落。二是组织部队开展狙击活动。以冷枪冷炮不断地给敌人以杀伤,迫使法军不敢在工事外活动。三是组织部队开展政治攻势。法军士兵成分复杂,有多种国籍。针对这种情况,越军以扩音机用多种语言对敌广播、喊话,起到了削弱斗志、瓦解敌军的



政治顾问组邓逸凡(左二)等人与越军总政治局副主任黎麻等在边界战役前线合影。左八为本文作者王振华

作用。

法军在奠边府一切供应全靠空运。每天要有上百架次的飞机空运各种军用物资,方能维持一万多守军的生活所需和战斗消耗。韦国清把断敌空运视作夺取战役全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战役开始,越军高射武器部队给猖狂的敌机以重创,三天内击落敌机16架。随之,越军的重炮火力射向飞机场,敌机改为空投。随着越军的战壕向前延伸,包围圈日益缩小,敌机空投的物资大都落到了越军阵地。这对越军是一大补给。

这时,美国统治集团看到了奠边府法军处境危殆,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到海南岛西部的北部湾举行“演习”,声称要用B52轰炸机轰炸奠边府越军阵地,甚至示意要丢小型原子弹。

在此期间,越军部队长期露营,非战斗减员增多;有些部队伤亡较大,战斗力减弱;加上连续作战数月,指战员产生了疲惫情绪。由于

敌机狂轰滥炸和雨季到来,越军后勤运输也日益困难。

在美国威胁,法军困兽犹斗,本身困难增多的形势下,越军高级干部,面临着是克服困难全歼守敌,还是信心动摇功亏一篑的选择。韦国清坚定地认为,越军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法军困难更多,而且无法克服。越军只要不怕困难,咬紧牙关,抓住敌人的弱点,连续作战,就能够夺取战役全胜。本此精神,他先与越军前指主要领导人交谈,统一认识,坚定信心,然后共同研究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和克服实际困难的办法。

从4月下旬起,法军增兵上寮,企图接应奠边府守敌突围南逃。韦国清立即与越方研究,及时作出了防敌突围的部署。并于5月1日发起第三阶段作战。战至3日,越军逼近芒清法军指挥所。5月4日,法军向奠边府最后空投一个伞兵营的援兵。此时,韦国清认为,总攻时机已经成熟。经与越方研究,决定

于6日晚向敌人发起总攻。战斗开始后,越军从四面八方方向敌人猛烈进攻。越军所有炮火,包括由中国装备训练刚刚运抵前线的六管火箭炮向法军阵地齐射,以极大的威力震慑了敌人。至7日上午,芒清之敌已失去最后屏障。法军见大势已去,于当日14时打出白旗,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里少将及其参谋部人员全部被俘。当日,越军三〇四师向南分区之敌发起进攻,守敌两千余人于晚间南逃,亦被越军全部追歼。至此,历时55天的奠边府战役,以法军惨败、越军大胜而宣告结束。

奠边府大捷战果辉煌。共歼敌17个步兵、伞兵营,3个炮兵营,连同工兵、装甲、运输等部队,共16200人,其中俘虏10903人,包括将校军官41人,尉官和军士1749人。击落击毁敌机62架,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降落伞三万多具,及大量其他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1954年5月8日,即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的次日,正是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开始。

奠边府大捷,使越南代表团不仅处于正义的反侵略的地位,而且处于战胜者的地位;而法国代表团则与之相反。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7月中旬,日内瓦会议就《政治宣言》和《印度支那停战协定》达成协议,并于7月20日签字。按照这个协定,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在印度支那全境实现停火。法国政府将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从印支三国撤退其军队。7月22日,越法双方下令停火。历时8年多的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印度支那和平得到恢复。至此,韦国清领导中国军事顾问团所担负的帮助越南夺取抗法战争胜利的任务已经完成,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指示,逐步地撤回国内。

(责任编辑 刘文)

陆定一与百家争鸣方针在遗传学中的运用

——为纪念陆定一同志而作

● 于光远 李佩珊 黄青禾 黄舜娥

一

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于今年5月9日与世长辞了。40年前他领导我们在遗传学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1956年4月底5月初,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繁荣学术的方针后,5月26日,陆定一应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的郭沫若的邀请,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之后,在学术界的的确掀起了不算小的波澜。但是,好景不长。正如陆定一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所说的,“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不过,在对待遗传学的问题上,由于陆定一旗帜鲜明的态度和有力的指导,虽然几经波折,百家争鸣方针倒还是例外地被贯彻执行了。

二

一般认为,在孟德尔遗传定律被埋没了35年之后,于1900年被再发现以来,遗传学才开始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的研究已经从细胞水平进入到生物大分子水平。其科学理论已经为科学界所公认,其应用方面也逐步为医学和农学的实践所证实。但是,从30年代

到50年代,由于李森科取得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及以后的赫鲁晓夫的信任,他所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被当时的苏共中央和学术行政方面封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而由孟德尔——摩尔根奠基的遗传学却遭到强烈的政治批判,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帽子。遗传学家的申辩、教学、研究和出版的权利被剥夺了。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的学术观点,是以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恢复已经被遗传学所否定的拉马克主义为目的的。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在“学习苏联”的强有力的号召下,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基本上把苏联用行政力量支持李森科的一套照搬过来了。中国遗传学家中的大多数尽管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他们实际上还都保留着原来的学术观点。于是,中国在遗传学问题上也就形成了在学术观点上尖锐对立的两派。

在前苏联,由于李森科这一派在学术上的不严谨,特别是在农业实践上的无效,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公开批判李森科学术观点的文章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生物学家们的意见也逐渐公开化了。科学家中的种种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

三

有关遗传学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本来纯属

学术问题,由遗传学家自己去讨论,迟早是会解决问题的。但是由于执政党强烈的行政性干预,使之复杂化了,并把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也只有依靠执政党调整相应的政策才能解决问题。于是,遗传学问题就成为我党中央制定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主要依据,这也是陆定一1956年5月关于双百方针报告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再阐述学术自由的思想。他说,“我们主张的百家争鸣是在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还说,“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的讨论,那么学术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的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强调了百家争鸣要“以研究工作为基础”。他说,“批评和讨论要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

对于如何才能保证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法问题,陆定一指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后,如果又发生了不同意见,仍然允许讨论”。

在上述报告中,对于建国以后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陆定一也反复进行了说明。他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在某一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他还说,“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四

这个报告会不久,陆定一就同当时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谈话,要他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商讨,如何针对遗传学存在的问题,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经过磋商,于1956年8月,在海滨城市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和陆定一上述报告中的指导原则。会前,通过学习和个别交谈,提高了遗传学家们对百家争鸣的认识,消除了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学者的种种顾虑。座谈会上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两派的各种政治标签,使过去尖锐对立的、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们能比较心平气和地、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进行学术争论。会议虽然没有作任何学术结论,但还是建议主管部门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改变只许一家独鸣的局面。这就使过去数年中在学术上处于非法地位的摩尔根遗传学家,同持李森科学术观点的学者一样,享有教学、研究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平等权利。会上还散发了中宣部科学处根据苏联和我国报刊上的系统资料,经过研究整理写出的有关李森科事件来龙去脉的背景材料,以帮助与会人员,特别是来自党政部门和学术管理岗位上的领导干部,了解苏联历史上以政治干涉遗传学学术问题的错误事实和后果,吸取我国从建国以来在学习苏联方面照搬苏联错误做法的教训。会后,报刊上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宣传,产生了相当好的社会影响。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被生物学界以至广大学术界认为是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开创新局面的一个好的开端、好的典型。

但是,实际上,在遗传学界彻底贯彻百家争鸣方针,阻力还是不小的,部分人仍持观望态度。原来持李森科学术观点的科学家中,一些人仍视摩尔根遗传学为政治批判对象;原来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心情虽舒畅了,但是面对上述情况,仍然顾虑重重,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挨批。

五

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政治空气对继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不利。青岛会议开创的良好局面发生了反复。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1960年全国高等学校又普遍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同时,在前苏联,李森科又获得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支持,摩尔根遗传学再度受批受压。在这种国内外的大气候影响下,国内一些李森科的追随者,同摩尔根遗传学家之间的对立又趋于公开化。有些大学又进行了对摩尔根遗传学家的群众性批判和斗争。这种批判的声势十分惊人,有个学院的批判大字报达两万张,有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参加揭发批判。一些学术刊物和报纸又重新刊登了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文章。批判的内容仍然是贴政治标签、戴政治帽子的老一套东西。摩尔根遗传学家又紧张起来了。尤其突出的是,有一位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分管科技的领导人还明确表态:“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米丘林失败了,要再开一次会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来扭转一下形势。”

陆定一一直关注着遗传学中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情况。当他得知一些地方在贯彻中央科学政策方面发生前述严重问题的情况后,先后在中宣部的小型工作会上,在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大会上,多次批评了上述反复。如在1960年10月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和1961年1月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都批评了某些大学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再次展开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错误,批判这些学校的领导没有在生物学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实现党的领导等。在陆定一及时和有力的纠正下,发生上述问题的基层领导再一次端正了认识,认真检查了在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制止了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更大的反复。

此后,摩尔根遗传学家才真正获得了在教学、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中的平等权利,使遗传学在中国再一次得到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其中,

十年“文革”期间,“四人帮”虽然也曾企图把摩尔根遗传学当做资产阶级学说再度加以批判,但这个企图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他们就垮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遗传学的工作得到顺利发展,成为建国以来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社会经济效果最好的时期。

六

遗传学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重要学科的存亡问题,在自然科学中是最突出、最典型的;因而解决遗传学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遗传学学科本身。随着遗传学问题的解决,其他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了纠正。

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的概念从此被普遍接受了。

在贯彻中医政策时,不但解决了中医不是“封建医”的问题,也解决了西医不是“资本主义医”的问题,使广大中西医界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医学方面大力开展了对人类遗传学及其在临床医学上的研究,并已开始在医院卫生工作中起了作用。

在农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利用遗传学原理进行的玉米杂交种和水稻杂交种为国家增产了成亿吨粮食;在肉鸡、肉猪和其他许多动植物品种上利用杂交优势也已经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障碍了。运用现代遗传学方法所做的转基因工程,已经产生有实用价值的作物新品种。人类按照自己的愿望来重新组合基因、创造全新物质资源的曙光已经出现。现在,每当人们在农副产品市场和餐桌上感觉到我国越来越丰富的食品供给时,会更加深刻地理解百家争鸣方针的深远意义。

遗传学的争论问题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被翻了过去,不过每当重温遗传学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百家争鸣方针在促进当代中国科学繁荣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陆定一在政策指导上极其重要的作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

(责任编辑 方实)

日本学者关于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

● 韩凤琴

在日本学者持续不衰的邓小平研究中,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这是日本邓小平研究的一个特点。

日本的邓小平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而且有其独特的研究特点。下面,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中心,就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方面,介绍和评析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历史地位的比较研究,应该首推被日本人誉为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泰斗、毛泽东研究权威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论述。竹内实先生指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和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伟人。中国学者有人提出中国近现代史中有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竹内教授的研究视野更宽,角度独特,且富有新意。

竹内先生在1994年4月发表的退休演讲和近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仅有秦始皇和孔子已经不够了。于是,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权力又拥有思想这一类人物。似乎可以说,毛泽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秦始皇留下的全国乱立状态和军阀混战局面。他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中国。所以,我认为,把秦始皇和孔子合在一起的人,即集政治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于一身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终生的人物。如果把他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研究,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竹内先生接着写道:我在1960年会见毛泽东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毛是个读书人。他是一位不亚于李白和杜甫的大诗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不用说,他同时又是位政治家,他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思想。

总之,毛泽东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

上来,抹煞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出了第四位伟人邓小平。邓小平从1980年前后开始着手改革开放,他是一位极有见识的人物。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些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似乎只能看成是一种闭关锁国,而开放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毛泽东开明。邓小平在看清方向的同时,又不与毛泽东断绝,而是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设的轨道上前进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我认为这就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

邓小平不赞成全面否定毛泽东,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维护了中国的团结与稳定。

苏联的情况则不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突然把共产党变成非法。在这之前,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些都给苏联公民带来相当沉重的负担。这是众所周知的。

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路线,同毛泽东时代相比,在内容上有变化。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毛泽东时代的话,也许会有什么新发现。毛泽东自己如果亲眼看到今天的时代,能否同意,我不大清楚。不过,我想他或许会出乎意料地同意的。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有循规蹈矩的一面,另外还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毛泽东的功绩之一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搞革命,最后也许能取得成功,但牺牲会大得多,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苏蜜月时代。如果原封不动地沿着那条路线走下去,恐怕今天就要全面地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了。毛泽东通过开展游击战反对共产国际的做法,最后将革命引向胜利,后来又同苏联展开论战,最后决裂。可以说,中国没有受到迎面袭来的苏联解

体的冲击。

由于这些原因,对邓小平今天所从事的事业,从感觉上讲,我认为毛泽东也许会同意这条路线。

竹内先生对有人问起为什么不再担任党的要职的老人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时,他回答说:这是因为邓小平先生的洞察力和他指引的方向。

日本中国问题研究家大泽升,在其所著《中国向何处去》(三一书房,1988年)一书中,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了比较。他写道:毛泽东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一点没有错。而且,他将作为开创新中国的人物流芳千古。那么,邓小平如何呢?如果把五、六十年代称作毛泽东时代的话,那么80年代就是邓小平时代。在80年代接近尾声的今天,通过对“邓小平时代”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大概可以确定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的确,邓小平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大力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汇集邓小平讲话的《邓小平文选》中,进一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继承人。

然而,毛泽东实际所进行的和邓小平在80年代所干的完全不同。要说相同的话,那就是两个人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和中国。可是,“中国式社会主义”这句话的含义,两个人是一百八十度的不同(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

毛泽东同正统的马列主义,即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反,认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重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将早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邓小平在同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这句话里,加进了另外意思,那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泽升继续写道:正如对“中国式社会主义”这句话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思那样,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性格上也有很大差别。一个是从容不迫,具有大将风度的高个子毛泽东;一个是舌锋锐利,谈吐似连珠炮的矮个子邓小平。然而,不能忘记的一点是:两个人都是作为“爱国主义者”,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努力。

毛泽东对“近代”的理解,还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规格化的,而且是空想的,这也许是由于只在书本上接触过西欧的缘故吧。

邓小平见过西欧,又去过苏联。他的集大成,就是80年代的中国改革。

邓小平是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的第二代人。他不仅是第二代人,而且是想避免第一代失败的第二代人。毛泽东在创业上成功了,但在守业上却失败了。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1986年5月号的《中国研究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遵义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的两个转折点,同时论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文章认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这是因为这两次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了牵引力作用。

以遵义会议为转机,中国革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即不再以俄国革命的实践为样板,走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之路。这样,受共产国际指挥棒左右的情况少了。

而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转折点,不仅在于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方向转为实现现代化,而且在于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思想转变,即号召人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个功绩主要应该归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纠正了“文革”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完成了在新的条件下使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艰巨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将会越来越发挥其威力。

以遵义会议为转机,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注意克服那种把俄国革命经验绝对化、机械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寻求适合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工作方法、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确立。

遵义会议的转变的正确性,已在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转变的正确性,也将在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这些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

日本多数学者认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他们比较重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研究。较早明确地提出两个时代的,是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矢吹晋三人合著的《现代中国的历史1949—1985》(1986年,有斐阁出版)一书。该书的副标题就是“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书中分析了两个时代的不同,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和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还在继续。毛泽东在晚年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名义做了理论上的探索。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却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当作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否定了。不仅如此,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的基本观点。作者把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前十年,作为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来理解,说明他们的研究很有见地,这种看法比我们中国学者的看法要早一些。该节的“前言”写道:建国后的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在做各种探索,遇到了不少挫折。中国的探索也是人类的探索。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在《中国改革与民主化》(1992年,同时代出版会)一书中指出,邓小平时代包含有与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时代特征。他分析了两个时代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不同点是:第一,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重点转移。换言之,这也是从“政治”向“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是继续革命的时代,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被优先,实质上现实的经济建设被推迟了。然

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第二,毛泽东时代一贯重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便转到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方向上。结果,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最重要意义几乎不复存在。换言之,这是由“教条主义”转变成“现实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一种倾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切合现实情况的侧面和由于对意识形态坚持教条式的态度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当然,这同直接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关,但与毛泽东时代却有隔世之感。第三,如果把毛泽东说成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可以把邓小平评价为有组织的领导人。邓从50年代起就已经是党中央的书记,他确实是与“组织上的人”这种称呼相适应的领导人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讲,邓是比毛更有组织基础的处在权力顶峰上的人物。第四,毛泽东时代确实有过部分地承认地方分权的时期,但基本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中央集权式的。而邓小平时代由于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企业管理自主权等体制改革,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分权化了。如果毛泽东在世的话,针对80年代以后的体制改革再次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第五,毛时代正像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集中表现的那样,反复开展群众动员,而进入邓时代后,“动员”的情况几乎没有再出现。不能说在“文革”中完全没有来自群众方面自发参与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那显然是由于毛泽东从上面发出的动员。然而进入邓时代,不仅这种动员式的政治运动没有了,就连对权力提出异议那种自发参与也不见了。第六,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外的关系上,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体系。毛时代对信息控制很严,且政治教育也很普遍,一般群众几乎不具有将中国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观点。而邓时代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来。

国分良成教授接着论述了邓小平时代与毛

泽东时代的连续性:第一个共同点是不断扩大并且承认个人的权力。两个人都是第一代革命者,而且都是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毛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是有组织性的权威。虽有这点不同,但在决定重要政策时,他们都是实质上的最高权力者。从职务看,虽然邓并没有达到顶峰,但无人怀疑他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第二,两个时代均以党的代行主义维持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基本相同。当然,进入邓时代后,产生了社会上的多元主义,以至于在党内外也出现了多种主张。然而正如80年代的现实政治状况所显示的那样,好像与社会的多样化无缘似的,对一党专政的权力机构并没有作任何修改。第三,无论在毛时代,还是在邓时代,都是政治透明度差。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多种主张存在,但结局都成了权力与路线斗争,成了一方打倒另一方的历史反复。进入邓时代后,那种构图基本没有改变。第四,同上述联系起来考虑,依靠“人治”胜过依靠“制度”的政治结构在整个时代一直存在。依靠个人的权力这种政治结构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到邓小平时代。在中国,被称为“关系学”的人际关系网,常常超越制度和法律。第五,关于政治权力依赖于军队和公安等暴力机关的政治结构,基本没有变化。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天儿慧,在《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东方书店,1992年)一书中,论述了邓小平时代的四个政治特点。书中写道:始于“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时代后期,已明显看出具有超凡魅力的毛泽东政治形态的全面展开和由此造成的严重弊端。因此,毛泽东以后的政治特点是从对其强烈的反作用开始的。这可以从以下四点看出:

第一是从政治优先向经济优先的大转变。换言之,是从优先追求革命的观念和绝对平均主义向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第一主义转变。自那种转变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以来,虽表现出几次“摇摆”,但基本上还是坚持这个方向的。

第二是在毛泽东时代不断激化的路线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路线斗争减少了。

第三是在毛泽东时代受到批判的许多老干部和中坚干部大量复职和随着他们既得利益的恢复,官僚领导层型统治再次加强。正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所看到的那样,极为重视以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为中心、以军队为后盾的政治稳定路线。

第四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社会的搞活、流动化、多样化也取得进展。在各地方和各领域,知识分子和群众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他们渐渐要求开展政治领域里的变革。

天儿慧教授还就邓小平时代的国内政治课题提出如下见解。他认为第一是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和保证其实现,这是重要的课题。从现代化的一般理论来看,创造政治稳定局面的关键在于制度化。这十几年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法治”、“法制化”。作为第二个内政课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政治的特点是集权主义(向毛泽东集权和向党集权)和人治主义。这一方面造成经济上的效率不高,同时又出现许多冤假错案。因此,毛泽东政治不得不成为政治改革的最大对象。作为第三个内政课题,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素质问题,现已开始探索“政治文化”的转变。这将和从总体上提高社会的基础文化水准问题及提高能适应政治体系转换的领导与群众共同的政治意识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作者指出,在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可以看到变化与不变化两个侧面,但是,正因为形成不变化因素的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势力”根深蒂固,所以结论只能是:向政治现代化转换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

日本中国研究所机关刊物《中国研究日报》于1993年12月出版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专辑。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性功绩做了客观的评价。专辑的前言写道:自甲午战争至今百年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深足迹的,恐怕要首推毛泽东了。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有人认为应该重视这种戏剧性变化的意义。据此,那种认为邓小平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的见解也许是正确的。不过,当我们站在1993年回顾已经过去了一个

世纪的时候,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志向和他的选择对人们影响之大,别人是无法比拟的。毛泽东和由他体现的中国革命释放出来的磁力,不仅仅把十亿中国人引导到一个方向上去了,而且这种磁力常常强有力地吸引着居住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人们。

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这期专辑上发表文章指出:作为毛泽东的历史性功绩,可以举出以下几点:1.不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而是确立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路线,并且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2.中苏对立公开化后,敢于从正面抨击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时明确地告诉中国人民,应该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3.向全世界人民传播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

村田教授接着写道:从苏联崩溃这一现实来看,不能不令人感到毛泽东的敏锐洞察力。当然,尽管与苏联模式诀别了,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还没有明确地确立替代苏联模式的新型社会主义建设形象、路线和政策。特别是,越是到了晚年,越是被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幽灵缠住,陷入反对修正主义这一教条主义之中,本本主义式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并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理论框架所束缚。

然而,如果中国对苏联唯命是从,成为其卫星国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也一定会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走上混乱和崩溃之路。为保持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应绝对避免“文革”和1989年“要求民主化运动”的重演,扎扎实实地从事经济建设。这应该比什么都优先。

毛泽东断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拒绝用现成的本本和理论判定正确与否。即便是为原有的权威和一般的观念所否定的事情,只要扎根于现实,有实践依据,就果断坚持。这是一种创业者的精神,这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东西。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成功,不是与能否真正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有关系吗?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的

高速、健康发展促使日本学者的比较研究又扩展到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改革的比较研究上。

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在《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1995年2月,苍苍社)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第一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施政中心定为经济建设,这是意识到了两个失败。

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万能论的失败。在整天忙于政治斗争时,中国经济比东南亚大大落后了。排除这种政治斗争优先论,改变政治轨道,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的最大贡献之一。

另一个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采用了从政治民主化到经济改革这样一条战略,西方对此大加赞赏。然而,结果如何呢?高级顾问们开出的处方几乎近似庸医的诊断,休克疗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前苏联今日的混乱就是最雄辩的证明。从政治改革到经济改革这一戈尔巴乔夫路线的破产,促使人们对选择了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进行重新评价。

如果将戈尔巴乔夫战略和邓小平战略相对比,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和邓小平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于其理由,可能有各种解释,唯有人们的经济活动才构成经济基础这种唯物论重新得到了证明。最重要的是,人靠面包生活,无视这一基本条件谈民主,那近乎空话。

1991年末,前苏联解体。其后,政治经济上的混乱日益加深。如果从前苏联的万恶之源是一党独裁这个角度来研究,似乎可以说只要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会顺利发展。然而,实际情况是:无条件的民主化,势必导致混乱。与此相反,中国自1992年以来,连续三年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毛泽东领导反帝斗争,使中国赢得独立的功绩不可磨灭。不过,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上却出现了大的失误。在经济建设方面,务实家邓小平要比理论家毛泽东干得更为出色,这种评

论大概并不为过。

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从总体上讲是比较客观的,他们思路开阔,有的研究不乏独到之见。日本学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多研究成果,从客观上讲,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他们有机会到中国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和从事交流活动。这为日本学者提供了一种和以往迥然不同的研究环境。于是,一批批很有见地的、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不断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问世。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的邓小平研究是在争论中不断拓展和深化的,也经常出现一些不同的见解。就比较研究而言,日本也存在有扬毛抑邓和扬邓抑毛的现象与倾向。这两种现象与倾向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关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是继承、纠正、创造的关系,即:继承毛泽东正确的;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创造毛泽东所没有的。

80年代初,一些日本学者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评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很不理解,认为邓小平路线与毛泽东路线构成两极,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持保留态度,对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持批评态度。中国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同时也改变了一些人的陈旧看法。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似乎还需要时间。

另一个问题,也同比较研究有直接联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自90年代初以来,由于世界形势的剧变,已成为日本学者的研究热点。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继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贡献。

对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日本学者已有很好的研究。但是，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在关于中国现在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否成立；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这些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相悖。他们的研究，或是引用一些不实资料，或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对中国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正确地评价。如有些人认为，“中国尚未到达社会主义就不得不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倒退。”甚至还说，“中国存在改变现行路线，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实行‘U’型转变的

可能性。”云云。这些所谓的“研究”，是出自一些日本共产党系统的学者，他们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自然有其国内背景，从学术研究角度分析，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也给我们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那就是怎样把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得更加透彻，并通过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使国外同行能够尽早理解，这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原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 广 告 ○

1996年2月荣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集体称号！1996年6月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

1993年6月创刊，1996年6月发行量突破15万！

读者对象

全国百万电脑爱好者
和亿万青少年学生

电 脑 爱 好 者

邮发代号

82-512

科普月刊

主要栏目：

新视窗——紧扣电脑时代脉搏，反映应用动态，报道行业热点。

跟我学——电脑初学者可靠的伴侣，陪您加紧赶上电脑时代快车。

步步高——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帮您提高动手能力；颇具启发性和充盈灵感的小经验，为您用电脑搞开发和程序设计提供解决难题的他山之石。

服务台——真诚、周到地帮您解决学电脑用电脑的所需、所想、所求；培训、读编交流、邮购等。

网络之友——针对 Internet 和大众咨询网，面向网络爱好者，介绍网络知识，推荐热门网站，交流使用心得。

考试指南——介绍计算机考试的类别、组织、实施办法，讲解应考技巧。

市场纵览——反映技术及市场走向，剖析产品特性，推荐优秀产品，维护消费者利益，沟通供需渠道。

娱乐天地——汇集游戏、音乐、电脑绘画、家庭影院等电脑娱乐精华，为您拓出学习、娱乐、休闲和智力开发的一方乐土。

订阅方式：

1. 订阅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

2. 错过订阅期可直接汇款到本社发行部。

3. 每册76页，单价4.60元，半年27.60元，全年55.20元。

4. 邮购单价4.80元，半年28.80元，全年57.60元。均

含邮费。

5. 合订本1994年全套28元，1995年全套36元，1996年全套48元。邮购另加10%邮费。（价格优惠、诚征代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48号（100081）

单位：《电脑爱好者》杂志社发行部 联系人：刘丽华

电话：62176018 62177399 传真：62184019

搞原子弹

王淦昌

埋名17年

● 马京生

1984年4月18日,西柏林自由大学校长黑克尔曼教授,代表西柏林自由大学庄重地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

这个被德国人称为“金博士”的荣誉,是专门为获得这家学校学位50年后仍站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们设立的。王淦昌是享有这一荣誉的唯一的中国人。黑克尔曼称他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卓越科学家,是自由大学的骄傲。

在王淦昌遥远的记忆里,他27岁就成为物理学博士,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孩博士”。

1930年,他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从师于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内。

当时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迅速得到发展。

当他每天潜心于课堂和实验的时候,希特勒开始推行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专政。迈特内教授因为是犹太人,不能在柏林大学任教。王淦昌感到了德国的窒息,他无法继续沉浸在实验室中了。他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

作学术访问,见到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于1934年4月,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王淦昌还清楚地记得,当他回国后在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时,1939年2月5日,18架日本飞机向浙江大学校舍投掷炸弹118枚。

浙大辗转六千余公里,迁至贵州。那时工薪微薄,物价飞涨,生活极其困苦,已经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的王淦昌,仍然全身心地投入他喜爱的科研和教学中。

王淦昌有个宿愿,在德国留学时,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物质中存在中微子的假设。但中微子没有电荷,几乎完全不与物质碰撞,用探测器很难抓到其踪迹,如何验证它的存在?他多年来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浙大迁到遵义之后,有了相对稳定的治学环境,王淦昌开始大量翻阅资料,搜集国际上有关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法和结果,但这些结果都只是支持中微子存在的假说,而没有一个能确凿地证实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经过归纳分析,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写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于1942年1月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这篇极有创见的文章,引起了实验物理学界的极大重视,也是早期验证中微子的著名实验。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来到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了高能物理实验工作。他们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进行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1960年王淦昌宣布,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粒子→反粒子对称性的认识,也是联合所少数几个重要发现之一。是10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开发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果。

1960年12月24日,王淦昌匆匆返回祖国。当时国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淦昌的家也处境困难,然而他却把四年在国外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国家。

这时,中国已经揭开了原子弹研制的序幕。核工业刚刚起步,一向被尊奉为“老大哥”的苏联却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

王淦昌一回国就投身于这项事业中。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1961年4月1日。

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有要事相商。”这次会面,决定了这位国内外久已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从此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国防工业,成为研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刘杰向他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

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是王淦昌一生为之奋斗的、一生热切期望的目标!

此时此刻,激动不已的王淦昌,像火山爆发一般,嘴里迸出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天,王淦昌便跨进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大门。

王淦昌上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不久,陈毅、彭德怀、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就到实验室来看望王淦昌等科学家。

陈毅紧握着王淦昌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

聂荣臻元帅到西北核试验基地去检查工作,也去看望王淦昌,聂帅有力地挥动拳头,“搞原子弹就靠你们这些人了。”

王淦昌十分明白,自己以身许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为这是国家当时的最高机密。王淦昌在某些领域创造了世界第一,已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然而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将决定他在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去交流学术成果,将要失去许多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但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改名为“王京”。

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甘心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许多国外的科学家都在猜测,王淦昌究竟在研究什么?

从那时起,他的足迹从北京走到青藏高原,又伴着大漠的驼踪,走向罗布泊蘑菇云腾起的地方。

他的老伴至今还唠叨:“那时,真不知他在



王淦昌与本文作者马京生

干什么,好像又神秘又伟大。他来信的地址都是什么什么‘信箱’。我就知道他在‘信箱’里。”

王淦昌餐风饮露,沐烈日,和我们的科技大军一起用汗水赢来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在王淦昌和众多核科技工作者的奋力拼搏下,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这之后,他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1986年3月,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个重要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被采纳和列入了我国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跟踪研究战略发展的高技术计划。王老正是这样高瞻远瞩地去预见未来。目前“八六三”计划有力地推动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在回首“八六三”10周年之际,王老说:“八六三”还要充分调动更多的部门、更多的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更多的措施,鼓励在海外工作的科技人员能经常回国开展科技交流,促进祖国的科技事业更快发展。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奇人陈翰笙要跨三个世纪

● 张彦

从学者到革命家

早在20年代，陈翰笙已是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精通多种外国语言，先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和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陈翰笙27岁那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他为该校历史系教授。他的专著和论文，分别收藏于美国197所大学。他的中、英、俄、德文著作约有300种，主要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和华侨的历史问题。这些著述对不同时期的国际经济、政治问题的精辟分析，受到了各国学者很高的评价。

1915年，陈翰笙远渡美国留学，为的是想学到先进的科学知识来造福于自己的祖国。但是，外间的众多的新事物引导他朝着更广阔的世界走去。他从学园艺、学地质，直到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学历史。使他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进入了必须根本改造中国面貌的思想境界。

当中国正处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时期，陈翰笙从国外归来，很自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经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不顾个人危险，英勇地投入了反对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6年3月18日，北京数千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八国最后通牒”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

的卖国行为。李大钊领导了这次活动，亲自扛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陈翰笙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并沿途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执政政府门前时，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四百人，李大钊也受了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翰笙满怀愤怒写的一篇《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以后，引起了海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大关注。

白色恐怖的笼罩，迫使陈翰笙流亡苏联，他到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他开始认识到农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回国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农村调查，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亲自领导进行了地跨大江南北的系统的农村调查。自1928年至1934年，他们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收集了第一手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终于得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他们明确地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除土地改革外，没有别的出路”。

陈翰笙所组织的这个研究会，会员多达五百余人，通过长期实践培养出一大批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像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杰出人物。当时，这些为数可观而又颇具影响的专家学者，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线，发挥了很大威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翰笙活跃于美国、加拿



陈翰笙

大、香港和国内，坚持不懈地支持人民的英勇抗战，揭露任何妥协投降的言行。在香港，他与宋庆龄以及一些国际友人组建了“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向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募捐，将巨额捐款送到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是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通讯》上及时将新四军遭国民党反动派阴谋伏击的消息向国际上报道，激起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释后，曾为此向陈翰笙当面致谢。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陈翰笙回到桂林，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他曾向外国记者批露蒋介石秘密逮捕廖承志的消息，配合何香凝和宋庆龄营救廖承志出狱。为此，何香凝还特意给陈翰笙画了一幅梅花以表达她的谢意。1942年11月，由于在桂林举办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陈翰笙遭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下令通缉。于是，他逃亡到了印度。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在这历史关键时刻，陈翰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1946年第三次去美国。他奔走各地，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

内政，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情谊。他坦率地告诉美国人：“美国政府如果援蒋反共，就是以中国人民为敌！”他用英文演讲，用英文发表文章，效果非常显著。

1951年1月，陈翰笙和他的夫人顾淑型一起，终于回到了他们俩长期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人民中国。为了欢迎他们的胜利归来，周恩来总理设宴为他们洗尘。周恩来当时兼外交部长，想请陈翰笙担任副部长，助他一臂之力。陈翰笙不想当官，但没有直接答复，却说：“总理，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个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刀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从此，近半个世纪来，除了担任外交部顾问和参加一些人民外交活动以及三次被选为人大代表和一次担任政协委员外，陈翰笙如愿以偿，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他心爱的学术研究、教育和新闻事业。

一生淡泊名利

陈翰笙一生淡泊名利。这不仅为他的前半生的事迹所证实，他坎坷的后半生经历更说明了问题。

陈翰笙虽然享受了部长级待遇，他从来都把自己看做是个布衣。一次，一位报社记者听说他到了上海，到部长级干部常住的宾馆查询他，回答是：“查无此人。”几经周折，才在他妹妹非常简朴的住房里找到了他。据说，每次到上海，下榻在这里的一张旧双人床，已经是他的老规矩了。解放后，他在北京一直住在东华门大街一所古老而破旧的四合院里。

年逾古稀的陈翰笙，依然亲自下去搞社会调查，而且总是拒绝任何的隆重接待。一次，他去安徽凤阳县访问。一放下行李，就提出要到县委去汇报来此进行农村调查的打算。接待的人感到迷茫奇怪：哪有中央的大干部首先来向基层同志报到的？

他十分关心好学上进的青年。一个大学历史系学生写了篇学术论文，辗转托人送请陈翰笙审阅。他不仅逐字逐句审读，认真批注，他给

他写信,对论文的标题、内容、引用的史料提出了许多意见,并热情邀请这位青年来面谈。初次见面,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有关资料作了详尽介绍。经过他如此培育出来的年轻学者已难以数计,不少人已颇有成就。

陈翰笙一向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大跃进”年代的各种“放卫星”的头条新闻,从来没有打动过他。对所谓“三面红旗”也是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一些亲朋好友都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他的经济学界老朋友,怕他惹来横祸,有意识地常来给他介绍一些经济如何发展的“正面新闻”。他说:“我不要听,这是不可能的。”

“硬骨头”精神

十年浩劫中,他这样一位一生献身革命的老干部竟被诬陷为“特务”,受到审讯和虐待,与他共同奋斗终生的夫人亦因此含冤去世。红卫兵打他操他要他弯腰接受批斗,他就是不低头,宁愿一屁股坐在地上。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倒行逆施,他毫无顾忌予以痛骂。

“文革”后期,他因患严重眼病,不能继续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调回北京。他不忍看见一些失学青年成天东游西逛,就自动在家里办起了外语学习班,义务辅导上门求教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和德语。来学习的年轻人中,有不少是被打倒的“黑帮”子女,其中就有“头号走资派”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孩子。好心的友人规劝他不要再惹麻烦了,陈翰笙却依然我行我素,来者不拒。他说:“我陈翰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免费收学生,总不犯法吧。刘少奇就是有问题,他的儿女是无罪的。他们可以上工厂当工人,为什么不能到我这儿学习呢?我们是共产党国家,难道还搞封建株连、罪及妻孥那一套!?”十几年下来,在他这里学习过的已有200余人,有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也有过了“不惑之年”的大学讲师、副教授,还有工人、厂长,甚至著名的演员。

陈翰笙到了90高龄,他给自己安排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每天分早、中、晚三班工作,甚

至连节假日也不休息。他主编了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由他亲自审阅的书稿就达197册。

他还担任《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主编,已经整理出版了300万字。他同时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自从眼睛开始失明,他只能在别人帮助下看报、读书、写文章。他的自传《四个时代的我》,就是在他的口述下,由任雪芳记录整理而成。

他说:我还可以工作呵!

我是50年代在《中国建设》杂志社与陈翰笙共事的,当时他是编委会的副主任,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为了欢庆陈翰笙的百岁生日,作为晚辈和老友,我不久前专程到这位令人无限敬仰的老人在北京西城的住所向他表示祝贺。完全出乎我的意外,陈翰笙的头发还是那么乌黑锃亮。除了两眼因患青光眼和白内障而近乎失明和记忆力有所减退外,他依然那么精神、那么健谈。而且,风趣不减当年,仍然喜欢不时来两句他特有的幽默或者讽刺。比如,我问到他的眼睛,他说:“我现在是最‘清白’了——青光眼加白内障!”当谈话涉及到某个共同的友人时,他脱口而出:“他文章写得很好,就是怕得罪人!”心直口快,一如既往。

当时,作为杂志社的领导,他为编辑部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有一次,他约一个人谈工作,那人晚去了15分钟,只见门上贴着一张黄色纸条:“时间宝贵,恕不久候。”陈翰笙早已人去房空。此事传开,谁也不敢再迟到了。他编辑别人的稿子,精益求精,改了又改,一些编辑记者们没少挨他的批评。他的好风范,如今已成为这个杂志社人人都必须学习的优良传统。

我问陈翰笙:“现在还有什么令您烦恼的事吗?”“有呵!现在我没有工作做,苦极了!”他简直是用恳求的口吻要求我:“您想法给我找点工作做。有想学英文的,就请介绍来,我是不要报酬的。”直到他在电梯口告别时,他还一再叮嘱:“别忘了给我介绍个工作呵!”

(责任编辑 刘家驹)

1950年6月,已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派出了强大的志愿军,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为挽回失败,美国侵略军又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金化攻势——上甘岭战役。

40多年过去了,我们请当年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之一——李德生上将,给我们讲述劣势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优势敌人的经过……

血战上甘岭

● 李德生

1952年10月14日,美李军以七个营的兵力,在大口径火炮三百余门、坦克三十余辆、飞机四十余架的支援下,分六路,向金化北面我五圣山前沿的597.9高地和537.7北山两个阵地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这一天,敌人向我阵地倾泻了三十余万发炮弹,五百余枚炸弹,阵地表面工事全部被摧毁,我军依托坑道,与敌激战终日……

这就是上甘岭战斗第一天的情况。

敌人攻击的这两个阵地当中,有个小村子名叫上甘岭,战役因此得名。

敌人为什么在朝鲜漫长的战线上,选择五圣山南麓这两个小小的山头发动进攻?这是因为:这年秋,我志愿军已在三八线构筑以坑道为依托的防御体系,并以冷枪冷炮和小部队出袭等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大量杀伤敌人,使得美李军“在战争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为改变这种局面,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多次磋商,决定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

敌人的真正意图远远不止夺取这两座小山头,他们的目标是在攻占这两个踏脚板后,进而

夺取五圣山。因五圣山主峰高达1061.7米,它后面是百里平康平原,如若敌人得手,将迫使我后撤百余里。

范佛里特和李承晚亲临前线策划,调整了部署,以美七师接替李二师鸡雄山阵地;美四十师调至紧靠金化地区;美三师也调到铁原归负责此次进攻的美九军指挥。

一切迹象表明,上甘岭地区将是一场大战、恶战。志司、兵团首长的决心是:寸土不让,使敌人的梦想化为泡影。

10月20日,兵团命令将我十二军调平康以北地区,作十五军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当时我在十二军担任副军长。部队刚撤出战斗,正向休整地谷山开进,现必须返回前线投入战斗准备。

这时,曾绍山军长接到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的电话,要我立即去兵团接受任务。

我即刻带着作战参谋张军赶到兵团部见到了王司令员和杜义德副政委。

王司令员指挥作战一向从容,但这天却显得有几分焦急。他对着墙上的地图,边指边讲:“上甘岭地区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投入了空前多

的兵力、火力,向五圣山前沿疯狂进攻。十五军能投入的机动兵力已全部用上,但敌人的攻势仍未减弱,敌人的意图是战略性的。从各方面情报看,敌人还将投入更大兵力向我进攻,战斗将更激烈残酷。”

“我们的决心是寸土不让!五圣山前沿一丢,敌人会乘势攻占五圣山,从我中线突破,那将使整个朝鲜战局改观,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在最前沿,不准它前进一步!每一个阵地上都要和敌人反复争夺。要研究敌人的进攻特点,讲战术!以最小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

杜政委着重讲了这次战役的意义,做好思想工作,转好弯子,准备返回前线投入战斗。

最后,王司令员以十分坚决的语气嘱咐我:“战斗将是空前激烈残酷的,要准备像苏联卫国战争时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样,一个战士,从开始打到结束时指挥一个连队作战!!”

王司令员又接着说:“十二军要准备全部投入战斗。我们正在上报,为了统一和加强上甘岭前线的工作,准备成立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你负责,指挥十二军、十五军等所有在前线作战的部队。炮兵由炮七师师长颜伏负责,你们要注意协同。”

“战斗情况及时直接报兵团;也要报十五军秦基伟同志,仗是在他们阵地上打的,要听从他们统筹调动指挥,相互搞好团结。”

我当即表示:坚决执行兵团命令,指挥好前线的战斗。

随即我们研究了兵力的使用。除三十一师全部参战外,还决定将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的主力团一〇〇团、一〇二团、一〇三团全部也拉上去,和敌人展开血战!

研究完毕后,我立即出发去上甘岭。

从10月14日以来,友邻十五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他们在仅有15门火炮支援,对敌324门火炮攻击的悬殊条件下,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击,并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因野战工事全部被摧毁,守备部队伤亡也大,弹药耗尽,才退守坑道与敌继续战斗。在争夺表面阵地的战斗中,一三五团七连二排长、共产党员孙占元虽负



李德生在上甘岭指挥所前

重伤,两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击退敌人凶猛反扑,终因寡不敌众,与敌人同归于尽。该排战斗组长易才学,率领一个小组,在孙占元的指挥和掩护下,以惊人的勇敢和技巧,连续打掉敌人四个火力点,为部队反击开辟了道路。19日夜,反击597.9高地零号阵地的战斗中,一三五团二营通信员黄继光,在爆破未成、身负四处重伤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猛扑向敌人的火力点,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口,为反击部队打开了前进道路,使战斗迅速发展,一举恢复了阵地。

从20日起,敌人与我反复争夺阵地的过程中,用尽各种恶毒办法,攻击和破坏我军坑道。他们用火封锁、投炸药包、毒气弹,在坑道顶挖坑爆破,堆干柴烧,推土堵洞口等手段,企图扼杀我守坑道部队,指战员们在忍受着饥渴,伤

痛等难以想象

顽强机智作战,使敌人始终未能进入坑道,坚持了近十天的斗争,为我军大反击争取了时间。

兄弟部队英雄们英勇斗争的事迹给十二军参战部队以极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向十五军老大哥学习。

我的指挥所开设在五圣山后的德山岬,和师指挥所在一起,那是一个狭窄的坑道。地方很小,每天和衣而卧,参谋警卫员就睡在地上。吃饭只能到洞外蹲着吃,作战室也十分拥挤,但大家紧张工作得井井有条。

我到达前指的当晚,三十一师的同志们向我汇报了部队到达上甘岭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我决定九十一团首先参加 597.9 高地的反击作战。为了打好有把握的仗,我要求大家做好战场调查。

九十一团团团长李长生同志是 1938 年参军的,在延安抗大学习过一年半的参谋业务,又当过基层军事干部,有实战经验,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敌情,他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十分沉着,没有急躁情绪,对这一点,我特别满意。

我们经过三天深入第一线的调查研究后,李长生将全团干部们召集回来摆问题,想对策。

从前沿回来的干部们说:“前面打得很苦,阵地上工事全摧平了,没弹药,吃不上饭,这是主要困难!”“只要能保证弹药供应,能吃上饭,就能打!”……

弹药运输是我们的首要解决的问题。

十五军原来的弹药库,离前沿远,敌人持续猛烈进攻,前沿需要弹药的数量非常大,而且敌人动用了大量远射程炮火和飞机,从前沿到我阵地纵深几十里,层层火力封锁,前面没有公路,全靠人扛,长途运送,翻山越岭,又远又累。运输部队中,有的战士累得吐血,到了前沿,累得连跑步通过封锁线的力气都没有了,造成很大伤亡,还供应不足。针对这些情况,大家想出分段运输的办法。山后面,用汽车运,再往前,从团后勤到营到连,每五十米为一段,分几个人运送,沿途挖若干猫儿洞,藏放弹药,瞅敌人炮火间隙,就抓紧逐段往前运送。支前运输队伍将用一千三百多人,二十台汽车,在硝烟、弹片

由于阵地上全是硝烟尘土,挡住了视线,进攻的敌人随炮火跟进,炮声一停,敌人已冲到了跟前。步枪迟缓的单发射击,已失去作用,在前沿都是用冲锋枪、机枪、手榴弹,打到后来,阵地上全成了虚土,手榴弹投出去都给埋在土里,只好投空炸,所以最起作用的是手雷和爆破筒,我要求后勤就应优先供应这些武器。

吃饭问题怎么办?

针对这次战役的特殊性,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五圣山后 741 高地的一个凹进去十几公尺、可避敌炮轰击的岩洞里,由团里统一组织食物供应,从各个连队抽调来炊事员,二十四小时不熄火,日夜蒸馒头、包子,源源不断出笼,组织了五十多人的专门运输队,不分昼夜,冒着炮火风雪,不间断地往前沿运送熟食。为了保温,还用棉衣裹着,考虑到前沿战斗激烈不便集中吃饭,就用小袋子分装,一袋五个、十个包子、馒头,一次背几十袋往上送,炊事员到阵地上找人,一袋袋扔给战士们。水运不上去,就背送苹果解渴充饥。

阵地上的工事已全部炸平,到处一片虚土,一脚踩下去齐膝深,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只有用麻袋装土垒筑工事。我立即叫参谋给军里打电话:“送一千条麻袋来!”

由于原来两个前沿阵地上的坑道工事,尚未形成坑道与战壕相连接的战斗体系,屯兵坑道与山顶阵地相距四五十公尺,战斗进程中,增加兵员就要在暴露的阵地上通过,常遭敌人火力的重大杀伤,特别是敌人一旦占领阵地,就能封锁住屯兵的坑道口,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这些教训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决定,一上阵地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挖坑道,鼓励大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争取荣誉,为人民立功。有了坑道屯兵作战,解决了在阵地上“站住脚”的问题。

通信问题怎么办?

由于战斗太激烈,电线打断了,接线的电话员上去一个给打掉一个,伤亡太大,干脆,打断的线不要了,人比什么都重要。多准备些线,部队打一次反击,通信排就跟上去拉一根新线。

如何用兵?虽然是个战术问题,但却对全



九十一团八连攻击上甘岭 597.9 高地

局带来影响。

上甘岭前沿阵地狭小，敌人炮火空前猛烈，上去的人越多伤亡越大，但又要守住阵地，随时准备击退敌人不同规模的进攻，怎么办？

对付这个问题，我们在对美李军金城防御作战中，已积累了丰富的坑道战、阵地战经验，所以到上甘岭看了敌人进攻姿态后，大家感到并不陌生，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根据几天来大家观察到的敌人活动规律和上甘岭地形特点，他们感到前阶段造成伤亡过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使用兵力不当。每次敌人进攻出击人数过多，以致遭敌炮火杀伤。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团的战斗部署是：全团九个步兵连，从五圣山到最前沿，一条线排成九个梯队，使师、团控制了充足的预备队，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以对付敌人的持续进攻。不但师、团如此，直到最前沿的战斗小组，也是战斗小组长带一人守阵

地，掌握一个战士在后面补充，这样富有创造性的“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部署，既避开了敌火力优势，伤亡也不大；而当大批敌人涌上阵地时，我军炮火和手雷、爆破筒等给敌以毁灭性打击。

10月31日，十五军组织十一个连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597.9高地的敌人发起反击，夺回了大部阵地。

九十一团于11月1日接防。我指示他们：“你们要下最大决心，千方百计守住阵地！”

九十一团八连，占领了597.9主峰，三号、九号、十号、〇号、四号、五号、六号等阵地，部队不顾疲劳，立即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利用麻袋、弹药箱等就便器材，构筑了部分掩体和交通壕，同时备足了弹药。

11月2日7点多钟，敌人即对597.9高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首先发射炮弹近十万发，

坦克开至山脚抵近射击,飞机百余架次轮番轰炸,持续达两小时之久。我阵地上硝烟弥漫,刚筑成的地面工事又全部被毁。从10时起,敌即以美七师一个营、美空降一八七团一个营、哥伦比亚营,及李承晚的九师三十团一、三营,先后向我各阵地发起多路、多梯次猛烈进攻达四十余次,我八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量敌用兵,采取小兵群战术迎敌,干部战士发扬孤胆作战的勇敢精神,与敌激战七个多小时,仅以亡36人,伤59人的代价,毙伤敌近千人。

坚守在最前沿东侧九号阵地的八连四班,巧妙地利用弹坑、岩石缝隙和残存的工事,加以改造作为依托,分两个小组轮流作战,激战一天,仅以轻伤三人的代价歼敌四百多名,击退敌人大小兵力七次冲击,创造了在坚守防御战中小兵群近战歼敌的光辉范例。该班在激战过程中,连长三次派兵增援,副班长蔡兴海却说:“阵地上没有工事依托,兵多了反而增加伤亡,你们回去增援友邻吧!”有新战士听见山顶上有敌人的活动,流露出焦急情绪,蔡兴海安慰他说:“沉住气,敌人要是下来,我舍身爆破!绝不让敌人堵死我们洞口!”稳定了战士情绪,增加了战斗信心。蔡兴海的行动,充分表现了我军战士,敢于孤胆作战的大无畏精神,关心全局的优良品质和机智灵活、英勇善战的军事素养。

也是在这一天,当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时,东面一号阵地上,十五军八十六团八连来了一位同志求援,急切地说:“大批敌人涌上来了,阵地上的同志已大部伤亡,阵地危急!”八连急派一班战士王万成、朱有光战斗小组前去支援友邻。当他们快冲上阵地时,敌人也成群地往上涌,手榴弹铺天盖地扔过来,他们闪躲腾跃,又踢又扔,用冲锋枪扫射开路,终于冲上了阵地。这时,二三百敌人蜂拥上来,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他们二人各拉响两根连接在一起的爆破筒,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支援部队及时赶到,使友邻阵地得以恢复。两位青年战士惊天动地的英雄行为,教育了所有部队。战后朝鲜人民将他们的英名镌刻在上甘岭石壁上,千秋永垂!

这段时间,志司和兵团对上甘岭地区的炮

火大力加强,参加作战的炮兵,已有十个团的一百七十余门各种火炮,这对轰击敌人远射程炮兵、曲射炮火,及阻拦敌步兵进攻,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特别是对空火力组织严密,从军前指所在的德山岬直到前沿的整个上甘岭地区,组成了绵密的多层火网,频频击落击伤敌机,仅高炮三十五营,在五天中,就击落敌机五架,击伤敌机17架,使敌人空军胆寒怯阵。

11月3日。李军三个营分路向597.9高地之二号及十号阵地连续攻击十余次,尚未接近我前沿,即被我炮火击溃。下午4点,敌人30辆汽车载了一个营的兵力增援,遭我炮火杀伤之后,即撤至出发地工事去了,我军观察到敌人新的集结地以后,于下午7时,以“卡秋莎”火箭炮两个营发射了一个齐放,将这些敌人大部消灭。

11月3、4日,敌人以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兵力不断进攻,均为九十一团七连、九连击退,歼敌1200余名。

11月5日拂晓,李军组织第二师、第九师共五个营的兵力,在飞机百余架次、坦克30余辆及大量火炮配合下,再次向597.9高地发动猛烈进攻,战斗空前激烈,我防守主峰的六连顽强坚守,连续打退敌人多次攻击。8时,我将五连主力加入战斗,经过十小时激战,先后击退敌人42次冲击,歼敌两千余名。坚守在三号阵地的新战士胡修道,在战友们都伤亡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坚持战斗,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从上午打到黄昏,歼敌280余名,终于在后续力量增援下,守住了阵地。战后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杀敌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

到11月30日,共26个昼夜,我军在敌火下昼夜突击,抢修了抗道24条,长131米,掩蔽部19个,避弹坑17个,交通沟1210米……

11月5日至9日,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和第三兵团领导分别致电我前线部队给以热情鼓励。祖国慰问团也来到五圣山前线,对子弟兵进行了亲切的慰问……给前线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此时,兵团决定将作战重点东移,恢复和巩

固 537.7 北山阵地。

11月8日,我审阅修正了三十一师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计划后上报兵团。我军除步兵部署外,将以野榴炮52门,轰击537.7北山,16门轰击597.9高地的十一号阵地,13门压制注字洞南山敌人火力。另有迫击炮兵群参战。“卡秋莎”火箭炮将以三个连,施行两次齐放。在我反击成功后,还将以六个榴弹炮连,在阵地前组成1200米的固定封锁区,对敌反扑部队施以火力阻拦射击。

以这样强大的火力,集中在一个小阵地上,摧毁敌支援部队反击,在朝鲜战场上是空前未有的。

11月11日下午4时半,在我猛烈的火力袭击和掩护下,九十二团的突击连,分三路迅猛突入敌阵,仅35分钟激战,将敌人大部分歼灭,一举夺回了537.7北山阵地,并接应出艰苦固守在坑道内的部队。我军随即连夜突击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扑。果然,12日拂晓,李二师三个团残部,在300余门火炮,20余架次飞机火力支援下,向我537.7北山,发起连续进攻。激战中,我因伤亡过大,放弃了表面阵地,转入坑道斗争。九十二团在四天的激战中,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击退敌人近百次冲击,歼敌2900余名。六连七班长程荣庆,三次负伤,双目失明,在干部伤亡情况下,挺身而出,代理连长指挥战斗,直到腹部中弹壮烈牺牲。

在九十二团反击537.7北山的同时,九十三团九连,于11月11日反击587.9高地的十一号阵地。三营长甄申于战斗前一天观察好地形敌情,组织无座炮摧毁了敌人的十九个地堡,第二天反击时,在炮火支援下,他指挥九连仅用五分钟就占领了阵地消灭了全部敌人,消除了对537.7北山攻击部队西侧的威胁。12日晨,敌人一个营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反扑。我九连以小兵群战术,顽强抗击敌人进攻。副班长杨国良小组,一昼夜击退敌人21次冲击,歼敌四百余名,战斗到最后,阵地上仅剩他一人,他拉响爆破筒与冲上阵地的几十个敌人同归于尽。12日夜,二连接替九连防务,先后击退敌人一个班至两个营的四十余次进攻,歼敌千余名,至11

月20日,敌人再也不敢进攻,至此,597.9高地才全部恢复了战役前的态势。

11月14日起,九十三团二、三营接替九十二团在537.7北山继续作战,经过三昼夜激战,打退敌人一个排到一个团的70余次进攻,歼敌1400余名。

三兵团首长,于11月15日通令嘉奖我十二军。电令称:“你们打得英勇顽强,工事修得既快又好,战术灵活。望你们继续发扬这种小群孤胆的战斗作风……”

11月17日,我军又以三十四师武效贤任团长的一〇六团,接替九十三团加入537.7北山作战,继续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到21日,击退敌人一个班到一个营的50余次冲击,毙伤敌1500余人。九连一班长刘保成,胸部中弹负重伤,仍顽强战斗,直到关键时刻,手持爆破筒冲入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11月28日,三十一师奉命将597.9高地之全部防务移交十五军。12月15日,一〇六团奉命将537.7北山阵地移交十五军,经一〇六团干部战士在敌火下艰苦努力,抢修的阵地坑道工事,已可容一个营的兵力和团以下伴随火炮了。

这次战役的策动者、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后来公开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当时的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写道:“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美联社记者的报道,为这次“失败”加了注脚,他写道:“这是二十八个月的朝鲜战争中第二次损失精锐部队最多的战斗,这次损失,仅次于1950年第八军在北朝鲜惨败时的损失。”

上甘岭战役敌人动用兵力达6万人,使用了大量飞机、大炮、坦克,向不足四平方公里的两个小阵地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经过43天的激烈争夺,付出了25000余人的伤亡,也未能占领这两个小小的阵地。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我所了解的孔从洲

● 杨荫东

孔从洲同志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我党的帮助和领导下,他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转变为我党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959年8月,在孔令华、李敏同志完婚时,毛主席会见了孔从洲同志。毛主席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抗战。杨虎城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是爱国的。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南汉宸。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86年9月,在纪念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成立40周年大会上,薄一波同志指出:“三十八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的牺牲,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形象。”

早在1927年和1930年,他就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他得到的回答是:暂时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工作

孔从洲同志是陕西省长安县人。1924年春他17岁时,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只身跋涉千里到达陕北安边,参加了坚持孙中山革命旗帜的杨虎城所办的军事教导队。这个教导队,是杨虎城接受我党陕甘地区负责人魏野畴同志的提议而举办的,孙蔚如兼队长,赵寿山等人任排长。从此孔从洲就在这支爱国革命武装中工作了整整23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坚守西安,东征河南、安徽、山东,回师陕、甘的各个战役中屡建战功,由班长升至警备第二旅旅长。在此期间,他深受我党负责同志的教育,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1927年部队在皖北时,他向魏野畴同志提出加入共产党。魏野畴同志表示:为了工作方便,暂时留在党外较好。1930年他又向南汉宸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南汉宸同志同他作了一次深谈。南汉宸同志说:依你的表现,入党没有问题。但从对这支部队工作的全面考虑,你深得杨虎城、孙蔚如的信赖,暂时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工作全局。党对你信任的,你还将担负更重要的任务。魏野畴、南汉宸同志的教育,使孔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

走的决心,为积极参加“西安事变”打好思想政治基础。

西安事变时,他作为西安城防司令,干净利索地解除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反动武装;事变后,又为保护杨虎城等历经艰险

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关头。事变前夕,杨虎城任命孙蔚如为西安地区戒严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长。任命孔从洲为西安城防司令。要孔指挥警二旅、炮兵团,负责解除蒋介石派驻西安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公安局、交警总队、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等一百二十几个单位的反动武装,并占领飞机场、火车站,扣留蒋介石调来西安的五十多架战斗机、轰炸机。同时由西安绥署特务营,逮捕随蒋介石来西安参加“剿共”的陈诚、卫立煌等高级将领及其随员六十余人,逮捕蒋派驻“西北剿总”的晏道刚、曾扩情。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孔从洲和特务营同时发动,经过三小时激战,彻底肃清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各种反动武装。拘禁了陈诚等人。不久,蒋介石被东北军解回西安,事变取得胜利。十七日,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孔从洲与左权同志合作,制定了保卫西安城防的作战计划,并精心安排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

12月25日,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局面走一个新的开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等伙同十七路军王劲哉,以“反对和平解决”为借口,阴谋杀害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和将领王以哲、何柱国、孙蔚如等人和共产党员,软禁杨虎城,发动内战。孔从洲及时识破了孙铭九等人的阴谋计划并立即报告了杨虎城、孙蔚如。1937年2月2日,应德田、孙铭九首先杀害了东北军爱国将领王以哲。由于控制西安城防的十七路军已有准备,“二二事件”才未扩大。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混乱局势:2月8日派顾祝同率嫡系部队进驻西安;分化瓦解了二十多万东北军并东调安徽;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移驻渭北;杨虎城被迫移驻三原东里

堡。“西安事变”后所形成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联合、共同抗日的“三位一体”遭到严重破坏，留下严重后果。在此危机时刻，周恩来副主席留在西安力挽危局，保护了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主要党员干部，维护了已经形成的西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

1937年春节前夕，住在三原东里堡的杨虎城将军，察觉有人将对他实行“兵谏”，立即要孔从洲率警二旅一个营赶赴东里堡，将原“西安绥署特务营”缴械。经孔再三陈述，杨才同意将特务营调出东里堡休整，由警二旅负责保卫杨的安全。这一事件妥善解决后，周恩来副主席曾专程去东里堡探望了杨虎城将军。

孔从洲同志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几个月极端尖锐、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始终坚定地贯彻我党的正确方针，为“西安事变”和保卫事变成果作出了卓著贡献。

他抗日英勇，中条山一战歼敌两个炮中队；他反“顽”坚决，在粉碎蒋介石消灭三十八军的“三个步骤”中，功勋卓著

1937年5月，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我军驻地出发赴西安、南京和国民党举行谈判。适逢大雨，泾河陡涨，无法南渡。孔从洲接周副主席一行在警二旅旅部住了三夜两天。在此期间，周副主席与孔作了两次长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前途。周副主席特别指出，杨虎城将军离开部队后，你们一定要注意四件事：要注意团结，要听孙蔚如的话，千万不能受人挑拨，把部队分化瓦解；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官兵的抗战胜利信心，随时准备开赴前线；要重视游击战训练；要依靠群众，军队和群众必须形成鱼水关系。周副主席的亲切教导，使孔在八年抗战中一直铭记在心，不敢或忘。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正在庐山受训的孔从洲同志立即请缨北上抗日。1938年初，孔率警二旅开赴朝邑（今属大荔），守卫河防。6月，奉命抢渡黄河攻占永济，扼制日寇西进关中、南下豫西的咽喉。1938年7月，三十八军改建为三十一军团，不久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任九十六军军长，进驻晋南平陆、芮城一带，负责保卫中条山。孔从洲所率警二旅改编为独立四十六旅（不久改为新编三十五师，以后又改为五十五师），仍归三十八军建制。

早在1937年2月，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就致电党中央提议“巩固和训练第十七路军现有部队”，中央复电同意。1937年12月，赵寿山到延安见毛主席，表示坚决拥护我党主张，接受我党领导。毛主席指示：“培养干部、改造部队”，并决定同三十八军建立无线电联系。

三十八军进驻中条山以后，党中央为对这支部队实

行政改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由蒙定军、范明、张西鼎同志组成的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十八军工委），蒙任书记；派杨明轩、孔祥桢、姚善尘、崔仲远、何寓础等党员干部到部队做上层统战工作；动员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温朋久、陈雨皋、冯一航、程文津等到部队参加训练干部；成立干部训练班，赵寿山任主任，孔从洲任副主任，孔祥桢任教育主任，轮训军官、军士，推行“新作风”，厉行三大禁令（禁烟、禁赌、禁嫖）、四大口号（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济公开、人事公开）；选派一批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教导队，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和在连队建党的核心；成立战地服务团、血花剧团，动员组织战地群众；创办《新军人》等内部刊物，及时系统地宣传我党方针政策，等等。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部队面貌为之一新，整个防区呈现军民合作、官兵一致、团结、进步、抗战的新气象，成为保卫中条山的“中流砥柱”。

中条山东接王屋、太行，西尽河曲，东西绵亘200公里，是屏障关中、河洛的战略要地，日寇视为窥伺关中、豫西的“盲肠”。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0月，日寇向中条山发动11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在1939年的“六六战役”中，日寇兵分九路大举南下，将我军分割包围于黄河北岸的狭小地区。孔从洲率新编三十五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北突围，越过中条山迂回敌后，歼灭日寇两个炮兵中队，缴获山炮十二门、迫击炮四门，迫使日寇全线撤回中条山北麓，我军收复原有阵地，取得这次战役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就蓄谋消灭这支部队。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向三十八军派遣了大批“政工人员”，妄图从内部分化瓦解这支部队。赵寿山、孔从洲与中共工委密切配合，经过几番较量，终于迫使这些反共分子退出团以下单位。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要三十八军协同消灭中条山地区的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赵寿山、孔从洲与阎针锋相对，击毙阎所派反共分子平陆县县长，掩护平陆地区中共党组织、牺盟会和“新军”干部安全转移太行山根据地。

1940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下令将这支部队调到洛阳、郑州地区整补并守备河防。党中央、毛主席从抗战大局考虑，同意部队调防河南。周恩来副主席特别指出：“蒋介石此举，系调虎离山之计，要借整补之名，行分化瓦解之实。要提高警惕，作好应变准备。”正如周副主席所预料，部队刚一过河，蒋介石就派何应钦到洛阳，当面要赵寿山交出三十八军内部“异党嫌疑分子”三十七人，送西安“劳动营受训”。赵寿山当面顶回。孙蔚如派孔从洲持亲笔函去洛阳见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郑重说明所调军官均系三十八军老干部，绝非“异党”。河防吃紧，绝不能调动干部。经过



1959年8月
29日，毛泽东、
孔从洲主持孔令
华与李敏婚礼时
的合影。左五为
孔从洲

孙、赵、孔坚决斗争，蒋介石只好将此阴谋暂时搁置。1941年3月、1942年11月，毛主席两次亲自听取了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的汇报。毛主席指出：“要继续大量培养干部，扩大充实部队新生力量。要整顿健全党的组织，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提高警惕，防止蒋、日、伪突然袭击。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做好原十七路军各部的工作。”毛主席决定：三十八军工委以后由中央直接领导，秘密电台同中央直接联系。工委向赵寿山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赵又向孔从洲作了传达。从此，赵、孔和工委密切配合，放手交朋友，发展统一战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粉碎了蒋介石破坏这支部队的一个又一个阴谋。同时，胜利进行了蒙广战役，收复郑州，迫使日寇退守邙山桥头堡。

1943年冬，蒋介石开始实施其消灭这支部队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将三十八军从围攻日寇邙山桥头堡前线，调到巩县“整训”，置于汤恩伯部队的包围之中，调赵寿山再次到重庆“受训”，同时，派其嫡系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在张耀明到达洛阳后，蒋才向赵寿山宣布任赵为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此紧要关头，孙蔚如召集三十八军主要干部讲话，指出：“孙、赵精神不可分。以后三十八军干部如有调动，只能在军内调整，不许调出军外。”就在张耀明要来三十八军到职的当天黎明，孔从洲从几十里外匆匆赶到军部干训班，紧急集合教导队第五期学员讲话。孔说：“赵军长已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是有人要肢解我们这支部队的一个步骤。可以预料我们今后的日子将更加难过。过去不管有多大风雨，有军长给我们

遮挡。今后，只要有我孔从洲在，天大的事都由我顶着，大家不要害怕！”1944年2月7日，张耀明到职。2月16日，赵寿山才从重庆回来举行交接仪式。经请示毛主席同意，赵寿山带了几个干部去甘肃武威就职。赵行前将三十八军交由孔从洲掌握。在此以后，孔从洲在中共三十八军前方工委配合下，为保持这支革命武装与张耀明进行了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同时，通过蒙定军同志转报中共中央，希望中央派人到部队配合工作。1944年冬，豫西战役后，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周仲英、张西鼎到三十八军。行前，毛主席亲自接见他们。毛主席说：“三十八军早就有党的组织，早就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个部队在形式上是国民党军队编制，但实质上一直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部队的。他们同日寇作战是英勇的、坚定的。他们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你们去后，要肯定他们的功绩，要和他们真诚地在一起工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彭真同志对周仲英、张西鼎也作了重要指示。1945年2月，周、张辗转到达河南洛宁前线，向孔从洲转达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对三十八军的关怀和鼓励。孔表示：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周、张还协助中共前方工委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并和我党河南军区第二分区建立了联系，为对付蒋介石的破坏阴谋做好准备。

1945年6月，蒋介石实施了消灭这支部队的第二个步骤。蒋在重庆当面向孙蔚如宣布：任命孙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将第四集团军的两个军缩编为一个军即三十八军，仍由张耀明任军长。蒋阴谋通过

缩编首先肢解十七师。1945年7月17日,经党中央同意,刘威诚、张复振同志和中共前方工委率十七师回归人民军队大家庭。

蒋介石的第三个步骤是消灭五十五师。抗战胜利后,五十五师先调郑州、开封,1946年1月移驻新乡。孔从洲同志感到内战已迫在眉睫,几次要求率五十五师回解放区。中央两次电示:“暂停起义”、“应用一切办法保存自己”。同时,派人向孔传达:利用国民党整编机会,争取获得美械装备之后再回来。3月,胡宗南调五十五师驻河南巩县,置于胡部二十七军和九十军包围之中。4月,胡宗南以“整编”为借口,调孔任整编三十八师副师长,五十五师改为五十五旅。孔感到情况紧迫,即派人向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请示立即行动,中央当即复电同意。5月10日,胡宗南派董钊到郑州执行彻底消灭五十五旅的阴谋计划:伪称调该旅由巩县乘火车开赴新乡“剿匪”,待部队上车后立即包围缴械。5月15日,孔从洲同志发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通电,率五十五旅突围。经过激烈战斗,部队伤亡惨重。多数官兵进入豫北、鲁西解放区。党中央、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多方派人接应,将孔从洲接回鲁西根据地。孔到达菏泽后,刘、邓代表党中央对孔回到解放区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刘伯承同志说:“你们这次长途突围,真是不容易。你们回来了,我们非常高兴,还准备恢复三十八军。”孔回到邯郸后,朱总司令特致电:“欣悉将军反战起义后已安抵邯郸,谨致慰问欢迎之忱。”

1946年9月1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孔从洲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13日,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邯郸宣告成立,辖十七师、五十五师,孔从洲任军长,汪锋为政委,刘威诚、陈先瑞为副军长,通电全国。毛主席特电嘉勉:“祝你们胜利地参加了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决而奋斗到底!”从此,这支历经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锻炼的革命武装,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参加了自卫反击和全国解放战争。

“文革”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三十八军干部得到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上下奔走呼号,仅证明信就写过一千八百多份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共三十八军党组织是“黑线”、“红旗党”,把三十八军干部打成“伪军官”,把许多党员打成“叛徒”。康生、邱会作专门成立专案组,审查所谓“三十八军问题”。孔从洲同志被列为审查对象,撤销了炮兵党委委员,且经常受批斗。就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孔从洲同志坚持党中央、毛主席过去对三十八军一系列指示,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实事求是地为三十八军干部写

了一千八百多份证明材料。1972年12月,他向毛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写信,请求为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同志和三十八军干部平反昭雪,并附去蒙的申诉书。毛主席批转军委总政治部,大意是:政策为什么没有落实?让兰州军区来汇报。经过叶剑英副主席亲自过问,蒙定军同志才恢复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孔从洲同志再次向叶副主席报告了蒙定军同志被迫害情况和困难处境。叶副主席批示:调北京,重新安排工作。1983年孔从洲同志向党中央全面报告了三十八军的革命历史,要求中央确定三十八军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1984年11月17日,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确定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凡在1936年12月,参加拥护我党政治主张,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1936年12月算起;1936年12月以后参加这支部队,未间断革命工作的,从其参加部队之日算起。1985年5月孔从洲、蒙定军同志提议并征求王炳南、阎揆要同志同意,写了一篇《怀念赵寿山同志》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三十八军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斗历程。这篇文章经王震、余秋里同志修改后,由孔从洲同志呈送邓小平同志审批。6月2日,邓小平同志批示:“照此发表。”6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孔从洲同志敦厚诚信。对敌英勇善战,对党无限忠诚。他很尊重三十八军工委领导,善于与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他生活节俭朴素,对有困难的同志则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他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80年代后期,他曾对我说:1959年毛主席和他谈话时,得知三十八军工委委员张西鼎仍担任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时,毛主席说:“三十八军干部安排得太低了。”孔说这是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干部的亲切关怀,使他深受感动。对毛主席这句话,他从未向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谈过,以免增加组织上的困难。90年代初,孔从洲同志长期住院,我和其他战友探视时,每当谈话涉及三十八军在战争年代的巨大牺牲时,他总是热泪盈眶,举座亦皆歔歔不已。

今年是“西安事变”60周年,又是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成立50周年。现在,三十八军指战员还健在的已不多了。我们这些幸存者,应当牢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发扬革命传统,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孔从洲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谨著此文以志永念。

(本文为作者为纪念孔从洲诞辰90周年而作,题目和文中插图均为编者所加)[HJ1]

(责任编辑 洛松)

我的老师闻一多

● 李曦沐

闻一多先生原名家骅,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一个书香门第,幼读诗书,常“忘寝食”。后入清华学堂,“五四”运动时曾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到上海去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清华毕业后赴美学习美术。归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后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抗战开始后转入西南联大。他既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出版有《红烛》、《死水》等诗集,又精研中国古代文学,旁及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训诂学,无所不通,而且功力很深。他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都是中国文学系教授,当过系主任,主要讲授《易经》、《诗经》、《楚辞》、《庄子》、《尔雅》、《乐府诗》、《唐诗》等课,深受同学欢迎。未选这些课的同学也常去旁听,视为难得的美学教育和精神享受,以致教室经常座无虚席。闻先生的著述也极为丰富和精到。郭沫若在为他的全集作序时评价他:“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是后无来者的。”

这样一个长年埋头书斋、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博学多才的学者,怎么会成为一个英勇的民主斗士了呢?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因校舍不足,文学院暂时设在蒙自,闻先生那时还是整日呆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精研典籍,著书立说,极少下楼。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专制独裁一天天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特别是在联大门口常常可以看到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当兵的“壮丁”的行列,那凄惨的景象使闻先生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在和联大新诗社的同学谈话时说:“我们不能不管了,每一次我都跟‘受刑’一样,看到倒在马路边的那些饿死的‘壮丁’,你们看那些捆着的、拉着、枪押着的,一个个瘦成什么样子,腿杆儿那么细,走着走着就倒下一个,走着走着就倒下一个。”他终于决定不能光是闭门读书,还应关心政治。于是1944年春,他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举办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参加了民主同盟,担任了联大新诗社、冬青文艺社、阳光美术社、剧艺社等好几个进步学生团体的导师。他不仅经常和张奚若、吴晗、曾昭伦、潘光旦、钱端升、费孝通等进步教授一起参加学生组织的政治集会,而且以大无畏的精神同吴晗先生一起参加我们的每一次示威游

行,成为与学生并肩战斗,最受学生敬爱的导师。1944年春季,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国民党军一溃千里,重庆、昆明和整个大后方为之震动,联大爱国师生更是忧心如焚。这时,我担任联大的历史学会主席,我的同窗好友、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马千禾(现名马识途)要我们历史学会在纪念“五四”25周年的时候组织一次时事晚会,邀请张奚若、闻一多、吴晗、周炳琳等教授参加发表讲演。在这次会上,闻一多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联系当时提倡“尊孔读经”等复古倒退的论调,认为必须继续发扬“五四”精神,彻底打倒孔家店。他说自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愿意“里应外合”,同大家一起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封建思想。在这次会上,张奚若、周炳琳、吴晗等教授都作了很好的讲话。同学们也慷慨激昂,纷纷发言,表达了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这个晚会是闻一多先生在广大同学面前亮出自己鲜明的政治旗帜的起点。从此他便一直同学生一起战斗,可以说是“无役不与”。

同年10月19日,昆明学生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闻先生在会上发言说:“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他不起,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弄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年里,学生在昆明还举行了其他几次大的政治活动,如双十节纪念大会、云南护国起义25周年纪念大会以及会后举行的盛大示威游行等,闻先生都应邀参加,发表讲演,并且同学生一起游行。

最令人难忘的是1945年的“五四”大游行。下午,几千大中学生准时来到会场。不料大会一开始就下起雨来,有些同学为了避雨从会场走开。这时,闻先生走上讲台,大声讲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他抖动着长髯,连声高呼:“有‘五四’传统的青年,回来!”“有‘五四’血种的青年,回来!”在他的热情感召下,走开的同学都冒着雨走了回来。大家振作精神把大会开下去,通过了《昆明各大中学校“五四”纪念大会通

电》，提出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会后举行盛大游行。闻一多先生再次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1945年夏我从联大毕业了，受地下党派遣到乡下去做农村工作，行前去看望了闻一多先生。这年年底，国民党当局开始镇压学生运动。12月1日这一天，特务暴徒们用手榴弹炸死两个联大学生和一个中专学生、一个中学教师，被殴打致重伤者5人，轻伤30多人，袁复礼和马大猷两位教授也因出来制止他们的暴行而遭到殴打。于是昆明学生向全国和海外华侨发出文电，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要求严惩主谋元凶，停止内战。许多教师也举行罢教，发表声明，支援学生。重庆、成都、上海以及解放区各地都纷纷举行集会声援昆明学生。这就是有名的以反内战争民主为斗争内容的“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运动期间，联大召开过多次教授会，闻一多等在教授会上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仗义执言，为学生申张正义，使学生的行动得到广大教授的同情。教授会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并向法院提起公诉，控告反动当局的暴行，提出严惩凶犯等严正要求。闻一多还要求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辞职，否则教授就集体辞职。这一提案给了学生以有力的支持。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平津复校，教师、学生分批从昆明北返。

这时在昆明街头已经出现了国民党特务搞的署名“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墙报，称闻一多、吴晗、罗隆基为“闻一多夫”、“吴晗诺夫”、“罗隆斯基”，为迫害他们制造舆论。我准备北返后去东北解放区，行前去看望闻一多先生，向他辞行。我问他为什么还滞留昆明不走，他说一则是家口多，路费还在筹措；二则你们都走了，昆明很空虚，反动派很嚣张，我们留在这里还可以压一压反动派的气焰，给昆明的青年壮一壮胆。我一直以为以他的声望，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对他下毒手。哪知穷凶极恶的反动派在我们离开昆明的当晚，以为联大学生已经走光，就迫不及待地杀害了李公朴先生，四天之后，7月15日下午又杀害了闻一多先生。

我们在途中先后听到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害的消息。大家都万分悲恸，在武汉停留的时候，让我起草一份电文给闻先生的家属表示哀悼。这时，在我头脑中马上出现了谭嗣同的影子，并想起他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不有生者无以策将来，不有死者无以招后起。”记得我在电文中就写有“招后起”的意思。这时与我们一路同行的闻先生的研究生，后来是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的季镇淮，一听到闻先生的死讯，就不顾经济和当时旅行的困难，立即决定从武汉返回昆明奔丧。事后得知，闻一多先生坚持去参加李公



闻一多

朴死难经过报告会。鉴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大会原未安排他讲话，但他在听到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公朴死难经过时，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作了后来被称为《最后的讲演》的讲话。他愤怒地责问：“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为什么要杀死李先生！”“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真理是一定要胜利的。反动派的无耻，就是李先生的光荣。反动派的末日，就是我们的光明！”他大义凛然地宣告：“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万恶的敌人果然下了毒手。在闻先生下午参加为李公朴被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回家途中，就在离他家门口不远的地方被特务枪杀，陪同他的长子闻立鹤也受了重伤。是谁决定要杀死闻一多先生？我路过上海时见到了张奚若，张先生异常愤慨地说：“如果在中国设立纽伦堡法庭，审判这一法西斯暴行，我就要出庭作证，凶手就在牯岭！”（当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避暑）

闻一多先生过问政治，全是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他曾和吴晗先生说过：“天可怜见，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只要有这样一天，我就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是反动派连这样单纯的人也容不下，竟在他年仅47岁的盛年置他于死地。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胡耀邦

和他的警卫员

● 舒 云

一提起胡耀邦，人们想起的都是总书记的胡耀邦，没有多少人知道当政委的胡耀邦是个什么样子，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胡耀邦曾经是打仗常常不在指挥所而在前线战斗部队甚至跟突击队冲锋的政委。战争离我们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距离了，战争故事也在逐渐失传。有幸，当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三纵队司令部内勤班班长的张成海老人，讲述了他所知道的胡耀邦的战斗故事。

张成海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是胡耀邦的贴身警卫，解放后仍然和胡耀邦保持着联系。直到胡耀邦突然病逝前，他和胡耀邦在中南海还有一次贴心的长谈。张成海劝老首长不要到处跑了，也不要抽那么多的烟，退下来了就好好休息。胡耀邦说，是应该好好休息，只是坐不下来啊。他们谈起了过去战争年代难以忘记的往事，越说越激动。胡耀邦说，那时我不让你走，你非走不可。张成海说，那时我也是不想离开你的，但是我太想打仗了，作为一个战士，听见前边枪响，自己却上不去，那心里真不是滋味。

说起来，张成海离开胡耀邦是他“罢工”的结果，本来胡耀邦是坚决不放他走的，说什么也不放，要不是张成海脑瓜子来得快，他不知道牺牲多少回了。解放战争初期，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几乎没有间歇，集宁、保北、青沧战役几次最危险的时刻，都是张成海把胡耀邦救了出来。但是张成海这回是铁心不干了。

这件事说起来很有意思。

石家庄战役最后阶段，第二梯队一突入市区，刚任

三纵政委的胡耀邦就紧跟着进去了。张成海随着胡耀邦一直钻到最前边，枪炮声在头顶上响成一锅粥，却始终没有机会射它一弹。哪怕射一弹也好呵。就为这，战斗一结束他不干了。从延安跟随胡耀邦的五个警卫员陆续走了四个，胡耀邦就不放张成海，逼得他想起了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

一天，胡耀邦又要出发了，习惯地说：“走，小张，下部队去。”

张成海说：“我不去。”

胡耀邦惊奇了。

“我反正不跟你去。”张成海横下心了。

胡耀邦看说不动他，就叫上另一个警卫员走了。

胡耀邦下部队回来，问，那你想到哪里？咱们谈判谈判。张成海说我要下部队。

在一边的第三纵队司令郑维山高声说道：“你当个小排长就不错了，你还想打仗？”

张成海顶撞道：“年轻轻不让打仗，一天到晚就关在这？”

郑维山说：“我知道你想当官，官迷。”

张成海说：“谁官迷，我才不官迷呢。”

胡耀邦问：“你想到哪？”

“我想上大兵团去。”

石家庄战役第一个突破内市沟的张英辉团荣获了大功团称号，是三纵队最能打仗的英雄团之一。

胡耀邦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好，你给我找个人你再走。”

胡耀邦拿起电话,找到二十一团的团长魏群:“给你个排长,你要不要?”魏群认识张成海,知道他在闹情绪,就说:“不要。他想上哪儿?”“想上二十三团。”“不让他去。”胡耀邦直笑,叫魏群给找个警卫员。

第三纵队副政委王道邦告诉张成海:“我们研究过了,让你到纵队警卫营当指导员。”一听还在警卫营,张成海仍然不干,说:“这不是还在首长身边转吗?”

王道邦说:“警卫营四个连,每次打仗,只留一个连看家,其余三个连都得上去打仗。”张成海还是想下战斗连队。

王道邦说:“你如果不去,司令和政委都说了,那就哪也不让你去了。”

胡耀邦说:“你怎么到警卫营当指导员还不高兴去?”

郑维山在一边说:“嫌官小,当营长他就高兴了。”

张成海说:“谁嫌官小,我就是想打仗嘛。”

吃罢晚饭,张成海就要打背包走。胡耀邦的爱人李昭说:“小张,你说走就真要走?”说着把张成海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不是想媳妇了?”

李昭比张成海大五岁,是晋察冀贸易公司的科长。张成海说,大姐,你瞎说什么,我才多大?……我就是想打仗。李昭说,想打仗也不能想疯了,再多呆两天嘛,胡耀邦也说,等总结完石家庄战役后你再走。李昭看留不住张成海,就说:“你别愣儿巴几的,打仗,子弹可没有长眼睛。以后有空经常回来看看。”

说着,李昭的眼圈有些红了。

李昭忘不了张成海在战场上几次救了胡耀邦的命。胡耀邦自己也忘不了:那时打得挺激烈时,那两个警卫员就到一边去了,我还得照顾他们,就你张成海最顶用。

作为一个纵队政委,下面有旅有团,打起仗来顶多越两级下到团里,也就了不起了。可胡耀邦,一打仗,就常常跟着突击连跑。这就危险大了。为什么一个纵队政委要这样干呢?胡耀邦曾经好多次对张成海说,打起仗来,只要有需要,部队首长应尽量靠近基层。再说他是宣传干部出身,一直在机关。当年三纵队的一些干部也说政委打仗不太行。所以,一打仗,他就积极上前边去。在胡耀邦去世前一年,张成海到中南海看他,他还跟张成海说,在晋察冀,二纵队、四纵队和三纵队都是主力,司令员都是名将,人家都是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我胡耀邦呢,13岁参加红军,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还动员我回家。我不干,坚持走了过来。所以,我到战斗部队任职,就要补上打仗这一课。

胡耀邦这一补课,可苦了警卫员张成海,子弹可不管你政委不政委。再加上胡耀邦确实缺少第一线的战斗经验,也幸亏有张成海这么个好警卫员,要不胡耀邦早死过几回了。在石家庄战役之前的保北阻击战,胡耀

邦随二十四团二营。进村时,他走在前面,碰见了敌人,枪也响了,足足一个营的敌人已经连喊带叫过来了,张成海顾不上说话,20响的盒子枪就突突开了。还有一个警卫员的卡宾枪也响了。要是三五个敌人还可以抵挡一阵,要打一个营的敌人真是往虎口里送。两个警卫员拉着胡耀邦就跑,仗着警卫员枪法好,才掩护着胡耀邦退到砖窑后面。这时咱们的一个连接应上来,把敌人打退了。这之后胡耀邦又跟着突击队上去了。下来后,张成海批评他:“你这样,我们警卫员怎么负得起责任?”胡耀邦说:“怕什么?两边还有一个排呢,又不是我自己。”那次在绥远省打集宁,最激烈时,胡耀邦竟跑到最前面的机枪阵地上,副团长一看见他来了,一把压倒他,说你怎么到这来了?前面都是敌人。当天晚上,张成海不让胡耀邦住在村里,说刚把敌人轰走,不安全。果然夜里敌人摸了回来。警卫员李二丫把冲锋枪抱在怀里,睡着了。一听有动静,马上跳起来甩手榴弹。张成海拉着胡耀邦就往山上跑,村里我们的一个营也很快撤了出来。后来张成海从张宗逊司令那里弄来一匹马。一夜工夫,他带着胡耀邦跑出了五十多里地,太阳出来时到了龙泉庄。几十年后,张成海回忆这事还感到紧张,说真差点让敌人包了饺子。

1945年10月,胡耀邦带先遣支队出发去东北,到热河的巴沟走不动了。张成海说,那时在巴沟还有四车皮的日本枪支弹药,足可以装备八个团,最后这些武器都叫国民党抢跑了。张成海回忆说,这时敌人在巴沟,我们到了土城子,双方停了火。由萧克、程子华、李运昌和胡耀邦几个人组成了冀热辽总指挥部,萧克任总指挥。

胡耀邦去世后,张成海说,如果他好好休息,他不会走那么早。那次胡耀邦去湖南老根据地看望乡亲们,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了。到了湘西,心脏病发了,住了一个星期医院,稳定了才转到长沙,还是危险,就打电话给北京,李昭坐专机来到长沙,抢救了十多天,恢复得不错,护送回到了北京。张成海说,耀邦回到北京,就在家好好呆着吧,他不,中央政治局开会,他不想缺席,就去了,没20分钟病又犯了,从椅子溜到地上,马上就地抢救,然后送北京医院。抢救还是有效的,胡耀邦也清醒了,医嘱不能动。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挺好。一天早上,天快亮了,他要大便,非起来不可。医生说下地不行,他说床上不行,非要下地。医生说别急别用劲,他不知怎么一使劲,就再也没有起来。

这一年,他刚过74岁。

张成海闻讯哭成了泪人,说,老……首……长,我……应该再……一次把……你救……下……来……

(责任编辑 仲文)

古柏一生遇一知己

● 陈其明

毛泽东接到了 古柏十万火急 的敌情通报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约3600人进军闽西。途中,1月31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寻乌县葛蒲墟,与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取得了联系。

古柏,江西寻乌县塘背村人,16岁就参与组织发动了梅县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1928年3月,奉中共赣南特委的指示,领导和发动了著名的“三·二五”寻乌暴动。暴动失败后,古柏逃到梅南等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9月,古柏秘密回到寻乌,在黄沙西云庵正式成立了寻乌第一支地方武装——二十一纵队,古柏为政委。二十一纵队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以粤赣边界的阳天嶂大山为依托,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在古柏得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来到葛蒲的消息后,随即星夜兼程,赶到了葛蒲。

葛蒲,位于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交界处,离寻乌县城约50华里。经半月征战的红四军,已极度疲劳,毛泽东到达葛蒲后,急于想与当地地方武装取得联系,以便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整和补充。

这是古柏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古柏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寻乌地方反动武装的情况,并力主建议红四军向项山罗福嶂前进,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中找一个落脚点。

根据古柏的建议,毛泽东、朱德决定部队向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前进。部队当夜宿营吉潭圳下村。就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山村,翌日凌晨,红四军军部又遭到尾追之敌国民党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毛泽东与贺子珍随警卫员趁着天色未明之机,跳下小河,冲出了村外。朱德杀开一条血路,在敌我交

错中夺路突围,他的爱人伍若兰腿伤被俘,后被国民党杀害。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揪住,陈毅顺势将大衣一抛,正好罩住敌人头部,他趁机快跑脱身。毛泽覃腿上负重伤,被人架着攀岩越岭。红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不幸牺牲……

吉潭脱险后,红四军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作战,已疲惫不堪,减员严重,伤者病者甚多。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蹙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怎么办?毛泽东于2月3日在罗福嶂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前委对红军处境作了最坏的打算,并决定万一部队失败,领导人要分头潜往上海等地,化名登报联络,重振旗鼓再干。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朱德化名“王楷”,随时准备行动!

会议尚未结束,古柏带领几个队员,急冲冲地从寻乌方向赶来,向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通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军情:国民党军队已调集力量,从四面合围罗福嶂,要毛泽东率红四军立即突围。

毛泽东紧紧地握住古柏的手,连连说:“真难为你,跑了这么远的路……”

红四军遂于次日拂晓,顶风冒雪,秘密地向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边境一线转移,避免了全军遭受覆没的危险。

古柏喜结良缘, 毛泽东派人送去 一份特殊的贺礼

在游击斗争艰苦的岁月里,古柏与女游击战士曾碧漪结下了忠贞的爱情。1929年冬,红二十一纵队

驻扎在方塘寨，古柏与曾碧漪商定就在宿营地举办简单的婚礼。

毛泽东得知此事，很是欢喜，他立即派人给古柏送去一封回信，大意是：古柏同志，你们结婚是一件大喜事，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宣传污蔑我们共产党人“共产共妻”的时候，又在敌人重重围困你们的这种场合，你们的婚姻就显得更特殊。我看你们的喜事要大办，要让全县人民都知道。要大张旗鼓地张贴结婚宣言，把它贴到城里去，向广大群众宣传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共妻”，而是实行自由恋爱，一夫一妻的婚姻政策。

看完毛泽东的信，古柏连声称“妙”。他说：“对对对，毛委员想得真周到。”于是，古柏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叫人找来大捆缴获的国民党报纸，用木炭作笔墨，写了如下文字：

结婚宣言

我们是自由婚姻，不送礼，不请客，不坐花轿，不拜天地。我们不是封建婚姻的奴隶，而是革命旅途中的伴侣，愿共同为革命奋斗终生。

古柏 敬上
曾碧漪

古柏写好后，又抄写了几十份，派了几个队员，到县城和通往各圩场的交通要道上张贴。

毛泽东在寻乌作 社会调查，古柏 全力协助

毛泽东住在城内马蹄岗天主教堂。寻乌县的特殊地理环境，使毛泽东对其发生浓厚的兴趣。因这个县地处赣粤闽三省之交，其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在三省均具有代表性，毛泽东说：“明了这个县城的情况，三省交

界各县的情况大致相差不远。”为此，在古柏的陪同下，毛泽东走大街，穿小巷，仔细考察了寻乌县城的社会经济情况。

5月初的一天，正好是寻乌县城当街。古柏陪毛泽东来到南门街的郭友梅老先生的杂货店。

毛泽东扫视店内摆设，只见货架上稀稀落落摆着几卷布匹及日用小百货等，显眼处摆了点洋蜡烛、洋纱布等“洋货”，一看便知经营很不景气。

古柏介绍道：“郭老先生曾做过两任寻乌商会会长，在寻乌做生意40多年，是个县城通。”

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即约请郭友梅参加调查会。

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古柏的陪同下，认识了时为苏维埃政府委员的范大明老先生。

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把两位老人请到自己的住处，像小学生对待老师一般，一桩桩一件件地向两位“寻乌通”请教有关问题。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一边不停地做笔记；有不明白的，就请古柏当“翻译”。

古柏还陪同毛泽东走街串巷，深入店铺、作坊，打坐田间地头，与工人、农友促膝谈心，广交社会名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材料，毛泽东除请人到住地开调查会外，还多次到商会、苏维埃政府、工会等地进行走访，不拘形式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

经过20多天的社会调查，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城21个行业131家大小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逐个询问，而且对全县7个区21户大地主、111户中等地主的剥削形式、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恶劣行为，也问得清清楚楚。在这段时间里，古柏始终陪伴着毛泽东，并全力协助毛泽东整理和装订了十几万字的调查笔录。翻看那一大叠第一手调查材料，毛泽东对古柏甚为感激。在《寻

乌调查》序言中，毛泽东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在红都瑞金艰苦岁月里

1931年9月下旬，古柏随毛泽东到达瑞金叶坪村。

在红军总前委的日子里，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日常事务中，古柏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有时刚端起饭碗，遇上紧急文件，也要放下碗去批阅转呈。总前委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经常与古柏一起研究，有时就委托古柏去处理。古柏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古柏的妻子曾碧漪也在总前委秘书处任秘书，与贺子珍一起，负责收发、保管文件，破译密码，抄写有关材料。一次，曾碧漪将一段文字抄错了，她就用笔全部涂掉后，重新抄好，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后，认真地说：“古柏同志，你爱人‘贪污’了！”

古柏吃惊地问：“怎么回事？”

毛泽东笑了。他指着曾碧漪涂掉的那段文字，说：“修改文章对不要的文字或错误的文字，最好是画上框框，打上斜线。”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笔做起示范，“如果是添上文字，要画上杠杠插入正文，请审稿的同志能看清原文是什么，插入的文字加在何处。现在你这么一涂，原来的文字就看不见了。这要是做经济工作，涂掉的是数码字，人家还以为你贪污呢！”

古柏如释重负，原来，毛泽东是在教修改文章的方法啊！

在瑞金艰难的日子里，古柏、曾碧漪与毛泽东、贺子珍四人，工作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办公桌挨着办公桌，整天可以商量工作。古柏夫妇与毛泽东夫妇吃饭也经常共用一个大饭盒。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局被迫从上海迁入瑞金。临时中央一到瑞金,就极力排斥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战略战术说成是“游击主义”,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对党的路线怠工”的两面派,并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所谓的“反右倾”的斗争,对不同意见他们“左”倾错误观点,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企图以此来削弱毛泽东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和影响。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又不敢对他正面下手,首先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久,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即是邓小平,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毛,乃是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他不仅善于做地方党的工作,而且还担任过红军独立师政委、师长等职,是一名颇有影响的红军中级指挥员;谢,就是谢唯俊,曾任红军总前委秘书,在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1930年11月,他曾和古柏随毛泽东到吉安、永丰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此后,他调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师师长。虽说是他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也给他回过信;古,则是古柏。他1931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等职。

令人费解的是,邓、毛、谢、古分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多,怎么会突然成为“反党组织”呢?其中奥妙,主要在于他们都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属于“毛派”。直接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四人都对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一句话,就是他们极力拥护毛泽东的游

击战术和根据地建设的原则,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你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古柏等人十分气愤,反驳道:“我们苏区山沟都是马列主义,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倒是在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你们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是真正的‘派别的领袖’”。

“洋房子先生”听到这些言论,大为震怒!1933年5月4日临时中央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认为“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他们对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如果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此后,在中央苏区对古柏等人的批斗不断升级,并逼迫他们不断地写检查。

面对一次比一次“残酷”、“严厉”的批判,古柏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写了一份声明书,陈述了自己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批判会上,与“左”倾领导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

博古十分恼火,认为古柏等人“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限令三天内写出第二次申明书,与‘右倾’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必须考虑党籍问题”!说完,狠狠地摔过几张纸,要古柏“彻底地将问题交代清楚”!

古柏没有屈服。几天后古柏写了15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他坚定而冷静地说:“撤职、缴枪,甚至开除党籍,也得保留意见;你们只能缴掉我们身上的武器,但不能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

这样的态度,自然把“左”倾领

导者大大激怒了!事后,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古柏还真给缴了枪,派往会昌去做扩大红军的工作。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回想起这段历史时,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反邓毛谢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实是指鸡骂狗,是反对我的!”

古柏不幸遇难,

毛泽东深感痛惜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古柏则安排留下来,与项英、陈毅等人一起,继续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

1935年3月6日,游击队交通员王应湖叛变投敌,可耻地出卖了古柏。古柏在率队突围的激烈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37年秋,毛泽东收到在四川广汉中学任教的古柏之二兄古梅的来信,信中,古梅向毛泽东提出了给古柏写一篇传记的请求。毛泽东为失去一位诚挚的战友而深感痛惜,他凝思片刻,提笔给古梅写了一封复信:

古梅先生:

由西安转来大函敬悉,嘱为令弟古柏同志作传记,因忙未暇,为聊书数语,以慰古氏同胞。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用一张宽约20公分,长30公分的宣纸,饱蘸浓墨,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洒脱流畅、笔力遒劲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毛泽东对古柏的深情厚谊,也寄托了毛泽东对死去战友的深切怀念。

(责任编辑 刘文)

斯诺眼中的焦点时刻

● 武际良

年仅23岁的斯诺，怀着巨大的好奇心，远涉重洋，到中国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到达上海时，正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的第二年，整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斯诺走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目睹了神州大地的内忧外患，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一二·九”运动他都经历了，他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

斯诺读到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的小册子，他渴望亲自到苏区去，寻找红军，寻找毛泽东这个神秘人物。1936年4月末，斯诺奔赴上海，找宋庆龄女士求助。

斯诺是幸运者。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电请宋庆龄帮助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产国际没有瓜葛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昭示天下，并帮助苏区改善极为困难的医疗卫生事业。宋庆龄便推荐斯诺和在上海行医、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访问苏区。

1936年6月3日，斯诺带着中共北方局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马海德一起，通过了重重关卡，经洛川到延安，再步行进入苏区。

7月8日，斯诺和马海德到达陕北安塞百家坪，遇到了周恩来。在百家坪，周恩来接受了斯诺的采访，用英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原认为，周恩来是一个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一个“狂热分子”。在交谈中，斯诺感到周恩来温文尔雅，谈吐深思熟虑，一派绅士风度。

斯诺首次会见周恩来时，还让马海德用摄影机为他和骑在马上

周恩来握手告别拍下了电影镜头。

斯诺和马海德经过三天跋涉，于1936年7月13日到达保安。当天下午，毛泽东由会讲英语的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陪同，来到他们下榻的招待所看望。

斯诺看见毛泽东披着一头浓密乌黑的长发，面容清瘦，双目炯炯，结实的下颔上还生着一颗黑痣，他觉得毛泽东的模样很像为解放黑奴而进行南北战争的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只是他没有林肯满腮的黑胡须。一刹那，在斯诺的印象中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

晚饭后，斯诺和马海德一起走出招待所，就发现毛泽东光着头，敞着怀，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走。他边走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并打着手势。

斯诺望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背影，想到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要买他的头颅。而他却不带任何保镖和警卫，随随便便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毫无顾忌，真是不可思议。

1936年7月15日晚上，斯诺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民间传说是北宋名将杨继业的士兵开凿的。窑洞的墙上仅挂着军用地图，一条土炕上放着两只用铁皮包裹的公文箱。套间里是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的卧室，里面有一张用两扇门板架成的双人床。床上放着两条粗布被褥，上方悬着一顶发黄的蚊帐。

毛泽东请斯诺和马海德在一张没有上油漆的，铺了一块红毡的白木方桌前落座。方桌上，一只倒扣着的土瓷碗上支着一根蜡烛。就这样一连几个夜晚，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坦率地长谈。

毛泽东首先回答了斯诺提出的关于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然后还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口、文化和敌我双方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论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各种因素和必备条件，特别强调了建国国

内和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

谈到战争的前途和结局时,毛泽东预言: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将遭受长期的痛苦和巨大牺牲,但中国抗战的力量将逐渐增长,日本在战争的长期消耗中,会最终崩溃。

斯诺心中暗自好笑。毛泽东坐在这家徒四壁的昏暗窑洞里,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他的军队只是少数装备极差的年轻人,而且从富庶的南方被撵到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斯诺的眼睛里,毛泽东说的要打败日本人,将是一个“未知数”。

1936年8月初,斯诺和马海德出发去西部前线访问。行前,毛泽东让供给部门发给他们每人一套红军军服,一支自卫手枪,还有一匹马。

斯诺披挂整齐,兴冲冲地到毛泽东的住处去辞行。他一跨进院子,见毛泽东身穿蓝黑色的军装,站在窑洞门口,在明媚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容光焕发。面对毛泽东的生动形象,斯诺立即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对毛泽东说:“毛主席,让我给

您照张相吧。”毛泽东微笑着应允。

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便说:“请您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像。”

毛泽东只好向一旁的警卫员借用,但太小。斯诺灵机一动把自己头上的新军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

“咔嚓”一声。这张珍贵的历史性照片,是斯诺的得意之作。

二

1939年9月下旬,斯诺再次到延安去与毛泽东重聚。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身上穿的依然是肩肘和膝盖上都缀着补丁的粗布制服。毛泽东的头发已经剪短,面孔丰腴红润,显得比在保安时健康多了。这时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前途更是充满着自信。他说:“给我们时间。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拿些东西给你看看。”

斯诺在延安访问考察,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说法是实在的。

斯诺看到,两年多的战争,尽管

日本飞机对延安城不断的狂轰滥炸,城内大部分房屋变成了一片瓦砾。但是,延安军民却在城外进行着顽强的建设。宝塔山和清凉山下,南川和北川都新掘出一排排窑洞。

自1938年10月以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断绝物资供给,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1939年初,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身体力行,开荒种地,纺棉花。

在延安的集市上,斯诺看到了谷物、蔬菜、肉类都很丰富,手工业产品也不少,而且物价便宜。

斯诺参观了窑洞中的印刷厂正在为前方和后方印刷各种书籍、报纸、杂志,而且有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著作,甚至一些外国的文艺作品也被翻译出版。不仅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陕北公学,而且有培养科学技术干部的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延安还有自己的制药厂,边区中央医院、八路军国际和平医院的分院中有好几位外国医生在这里工作。前方的重伤兵可以送到这里来医治。

每当傍晚,斯诺和一些八路军官兵一块打球,或同朋友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他眼望着夕阳辉映着宝塔山上高耸的塔影,延河两岸飞掠着无数的流萤,古老的山城内外,到处传遍着抗战的歌声回荡在他的耳边,斯诺总是激动不已。

斯诺把他亲笔签名的一本《西行漫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接过书后,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三块肉喂你马吃”七个汉字。

斯诺看了一阵弄不懂是什么意思,摇了摇头,便在汉字下方打了一个“?”号。

毛泽东哈哈地笑了起来,用英语对他说:“Thank you very much.”

斯诺恍然大悟,毛泽东是用英



1936年,斯诺骑着红军的战马驰骋在陕北苏区的前线

语的谐音,对他的赠书表示“非常感谢”之意,于是又在“?”下面打了一个“!”号,表示对毛泽东的幽默十分赞赏。

斯诺在延安一直访问了十多天。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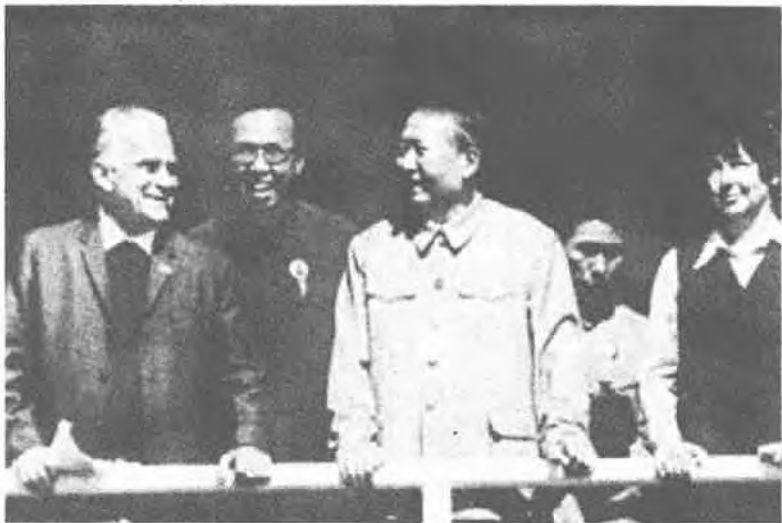
斯诺了解到陕甘宁边区在年初召开了第一届参政会议,代表着边区200万民众的,由民众选举的参议员145人出席了会议。参议员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的代表。边区有80%到90%的人民群众参加了这次选举,甚至住在偏远山村的小脚老太太都蹒跚着走很远的路去投票。大会讨论了边区建设和抗战问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出边区政府委员15人,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对此事作了记叙。他认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验”。

在国民党政府的逼迫下,斯诺返回了阔别13年的美国。临行前,斯诺去向他的良师益友宋庆龄女士告别,宋庆龄对他说:“你会回来的,我们把你看做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开心的,你属于中国。”

回到美国以后,斯诺依然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热情地向美国各界人士、亲朋好友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到处奔走为中国抗战事业募捐资金。从1942年2月到1945年3月,斯诺先后三次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况,力促美国政府直接同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

三

整个50年代,斯诺同美国当局禁止美国人访问新中国的反动政策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60年6月,



1970年,斯诺夫妇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才终于得以实现。

来到中国后,斯诺共花了5个月时间,走访了14个省份的19座主要城市。

1960年10月1日,斯诺应邀参加新中国成立11周年庆祝大会。

斯诺观看了天安门前长安大街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钢铁队伍,迈着雄健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斯诺不禁想起,1936年他和马海德抵达陕北那个偏僻、贫穷的保安小城时,出来欢迎他们的那只有百把人的红军官兵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小小欢迎队伍,如今不可同日而语了。斯诺看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正在微笑着向游行群众挥手致意的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他想到在经过了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战争,而形成如今这巨大洪流般的队伍中,“毛主席是队伍中第一号英雄人物。”

毛泽东见到斯诺非常高兴。“啊……一隔就是21年。”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斯诺无限感慨地说。

斯诺说:“自1939年后,我们没有交谈过了。”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聊一聊。”

他邀请斯诺到他家里做客。

10月22日清晨,斯诺来到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家里。

斯诺问起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告诉他:“经常保持现状”,多年来,他仍然像在延安时那样,常常从深夜工作到黎明。

“听说你在1956年夏天曾横渡长江。”斯诺想起当时国际上曾认为毛泽东那次畅游长江的举动是中国准备解放台湾。

毛泽东告诉斯诺,解放军不会用游泳的办法去横渡台湾海峡。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

他们的交谈进行了九个多小时,在吃饭的时候,也边吃边谈。

饭后,他们继续交谈。既谈到分别二十多年来国际上所发生的事情,也谈到中国的现实与外界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在新中国考察访问,正值天灾人祸时期,斯诺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实施了大规模有系统的努力去保护和延长人民的生命,并教育人民为有建设性的工作而努力

奋斗。斯诺在这次访问新中国后所写的《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党的领袖，而且更是一个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桂冠诗人……在‘百花齐放’时期，他是唯一敢将报刊及论坛公开给民众反映意见的共产党领袖。”

斯诺后来还在《时代》周刊上从哲学高度评价说：“毛泽东能够同时运用时间和空间、策略、正确和错误，这些相互矛盾着的概念；他能用行动表达出合乎现实情况的判断，似乎这才是唯一的真理。因为他始终知道对立面是一个必须的组成部分。”

四

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后的翌年，神州大地上一场持续10年的大动乱开始了。远在日内瓦河畔的斯诺焦虑地注视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1967年7月，斯诺在给张歆海的信中说：“三个月来我拼命阅读大陆的报纸杂志，也努力看从香港传过来的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它们显得非常狂热，没有理智，越读越使人感到那里的形势一团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斯诺急切地要求第三次访问新中国。1970年8月14日，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抵达北京。10月1日，斯诺夫妇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建国21周年庆祝盛会。斯诺夫妇安详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排客人西边的尽头。周恩来迈着轻捷的步子走过来，热情地领着斯诺夫妇走进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毛泽东微笑着说，“对你的不公正待遇要得到补偿，你被邀请到这里来了。”

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云霄。斯

诺发现，参加庆祝大会的人们胸前都佩戴着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在阳光照射下像群星般闪闪发光。包括周恩来总理的胸前也佩戴着一枚镌刻着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长方形朱红色金属胸章。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举目环视天安门广场。只见广场上空，漂浮着许多五彩缤纷的气球。一个巨型红色气球上悬挂着一条长长的金色大字的标语：“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在蔚蓝的天色映衬下格外醒目。

庆祝游行开始了。奔腾的洪流般的游行队伍高高地举着无数幅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从天安门前通过，毛泽东频频挥手向群众致意，游行队伍里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当游行的队伍走过来时，斯诺看见许多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人争先恐后地拥向金水桥畔，翘首仰望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一个个眼眶里饱含着激动的泪花。斯诺还清楚地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让他的小女孩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手持一束鲜花，不停地向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挥舞着。面对此情此景，斯诺禁不住指着游行队伍问毛泽东：“你觉得这些怎么样？你的印象如何？”

毛泽东皱着眉，摇摇头。接着，他又说“很好”。

1970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的家中毛泽东同斯诺作了五个小时的长谈，这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交谈。

这次谈话是在毛泽东那宽敞的书房里进行的。斯诺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告诉斯诺：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

还是当教员。

斯诺说：“我记得，就在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您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毛泽东答道：“是的，我们避免了这种作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

毛泽东还自问自答地说：“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个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转而问斯诺，“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

毛泽东又说：“我是无法无天，这叫做‘和尚打伞’——没有头发，没有天。”斯诺带着毛泽东同他讲的这几句话及他自己的理解告别了毛泽东，告别了他所眷恋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斯诺回到日内瓦之后，尽管他已身患重病，依然不遗余力地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奔走呼号。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透露了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他到中国来治疗，并派出以马海德博士率领的中国专家医疗小组奔赴日内瓦。

中国医疗小组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日夜守护在斯诺身旁，一直到他在睡眠中安详地逝去。这一天，是1972年2月15日。

（武际良：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斯诺传奇》、《斯诺与毛泽东》等。）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马上诗人”

张爱萍的长征诗

■ 尹力

疾 风

冲破“围剿”别赣江，
辗转五省横乌江。
奔袭击溃双枪将，
一举攻占鸭溪场。

土城战酣血犹热，
赤水西渡不畏寒。
大军此去多险境，
山高路遥巧周旋。

张爱萍将军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独具特色的诗篇。此诗写于1935年2月的扎西。也就是中央红军突围、北上的第四个月。

张爱萍说他写的诗是：“常写记事篇，留给自己看。”他的记事特点往往一句一个史实，一句一串故事。

“冲破‘围剿’别赣江”，是指中央红军执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决定，突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此时，张爱萍在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任政委。

“辗转五省横乌江”，是指中央红军突围后辗转苦战了3个多月，特别是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

江一战，异常激烈，损失惨重，终从福建、江西经广东、湖南到广西，历经5省。始终未能摆脱敌人尾追夹击之局面，这一困难同天险乌江一样，横在红军面前。

三、四句是张爱萍部行动、战斗的写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担任前卫的红四师，击溃了装备有汉阳造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军阀王家烈的师长侯子担部，占领了鸭溪场。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攻土城，准备北渡长江。红四师担负主攻任务。朱德总司令亲临前沿动员，群情激昂。时任红四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爱萍，作为师指挥所成员也参与了靠前指挥。战斗中，一颗炸弹落在指挥所内，张爱萍弹弹溅落在身上的泥土，继续协助师长指挥部队进攻。激战一日未果，毛泽东断然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再寻机北渡长江。“土城战酣血犹热，赤水西渡不畏寒”，溶进了将军的意志和情思。而后两句“大军此去多险境，山高路遥巧周旋”，是将军在战场上审时度势对战争形势的判断。纵观红军四渡赤水在云贵间历时数月与敌周旋的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不能不为将军当年的论断之准确而叹服。他当

时还不满25岁。

抢夺娄山关

回首征程赤水远，
铁流北上复南转。
万仞插天中一线，
依地险，
“小猴”剪径双枪杆。

山路崎岖夜暗，
滂沱那顾泥泞溅。
天降飞兵板桥畔，
惊敌胆，
娄山关上红旗展。

这首“渔家傲”记述了一场战斗。

红军长征到达扎西后，进行了整编。张爱萍被任命为第十一团政委。

红三军团东渡赤水、占领桐梓城后，得悉王家烈一部正由遵义向桐梓急进。彭德怀即令十三团日夜兼程，力求先敌进占娄山关。

张爱萍所部八团和十团奉命从娄山关左翼远出迂回板桥敌人。

张爱萍率部取道点金山下，沿着一条蜿蜒小路急进。夜半，下起雨来，路滑难走。但，部队杀敌心切，克服重重困难，拂晓赶到了板桥附近，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主力不支向南溃逃，张爱萍率部勇

猛追击。

娄山关之敌在红三军团正面猛攻及两翼包抄迂回的打击下,守敌土崩瓦解。张爱萍部一路追杀至遵义城。

遵义城分新老两城,一条河作为分界。

张爱萍指挥部队抢占新城及城边村落,即匍匐前进到老城下河滩边,隐蔽在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指挥侦察分队越墙进城侦察,这时,军团参谋长邓萍也匍匐来到他的旁边。邓萍一边观察,一边下达任务:“明天敌人增援遵义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你们先钳制住守城之敌,待军团主力到达后,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拿下遵义……”突然,他的头一歪,倒在张爱萍的右臂上。在张爱萍抬起臂想扶起他时,他是怎么一回事,殷红的鲜血已染红了自己的袖子和右衣襟。是城墙上的敌人射过来的子弹夺去了这位红军将领的宝贵生命。张爱萍顿时悲从中来。邓萍是黄埔军校的早期学生,曾参加过平江起义,作战指挥英勇顽强、沉着果断,是军团长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是整个红军的巨大损失。

张爱萍强抑着悲痛,用电话向彭德怀报告参谋长牺牲这一不幸消息。

“你们这些猪养的狗养的统统给我死了算了!”对方叭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张爱萍的眼窝。他深知彭军团长只有在愤极悲极时才骂人。透过这无遮无拦的家乡“国骂”,他深切地感受到彭总为红军失去栋梁之才在流血。

当军团主力满怀为邓萍参谋长复仇的怒火,夺取遵义老城后,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张爱萍心里依然沉重,不禁吟哦出一首诗来:

长夜沉沉何时旦,
黄埔习武济国端。
北伐讨贼冒弹雨,

平江起义助烽焰。

“困剿”粉碎苦运筹,
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
三军倚马哭奇男。

既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了邓萍的一生;更情真意切,由衷抒发了痛失战友的悲恸之情。

就在红军再占遵义的同时,蒋介石急调他的嫡系吴奇伟两个师驰援遵义。为痛歼来敌,军委即命令张爱萍所在的十一团和一军团的三团协同迎敌。

当张爱萍和团政治处主任王平率部行至遵义城外去鸭溪和懒板凳分路的桥上时,即得知增援的中央军来了。张爱萍亲率2营先敌占领了附近的山头。敌人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敌人的后续部队增加到两个团,进攻越来越凶,炮火打得山石横飞,荒草燃烧。从遵义到贵阳公路两侧方圆20里的山区,焰火弥漫遮天蔽日。红军将士与中央白军展开了浴血大战。

几番争夺,几番激战,敌人死伤累累,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十团团长沙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壮烈牺牲。敌在飞机和地面火炮的掩护下,终于下午3时许占领了老鸭山主峰,严重地威胁着遵义城。

彭德怀命令张爱萍组织力量坚决夺回老鸭山。终于在干部团的协同下夺回了老鸭山主峰。一、三军团主力又展开了全线反击。敌人主力被歼,残部向乌江溃逃。红一军团在江北岸俘敌一千余人。

吴奇伟两个师的覆灭,是红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轰动全国。红三军团在鸭溪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大会。张爱萍即兴赋“西江月”一首:



战争年代的张爱萍(1944年)

遵义大捷

抢夺娄山天险,
直下遵义月明。
鏖战竟日老鸭岭,
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胜,
转战历数艰辛。
欢声动地如雷鸣,
远望万山纵横。

张爱萍好一个“远望万山纵横”!这是将军对未来征途满怀胜利的预测。

渡过金沙江后,他挥笔写道:

金沙浪激追兵来,
穿越枪林举谿岨岩。
火焰山前布奇阵,
笑贼尽捡烂草鞋。

诗里有个故事:红十一团到达绞平渡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交待任务,张爱萍率一支精干的小部队穿过敌人间隙西进,设法同已与军委失去无线电联络在江南岸的一军团联系,传达军委让其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火速赶到绞平渡渡江,之后赴龙街堵截滇军北进。

张爱萍率领二营和侦察排连夜溯江而上，逢绝壁断路，就搭起人梯，把刺刀插进岩缝里登蹊而上，先上去的再用绳吊上去机枪、弹药箱和电台等。夜半又逢大雨，给行动造成了更大的困难。雨后到达鲁车渡时，忽然发现对岸有一长串火把，犹如一条火龙。张爱萍断定是一军团的部队，遂用军号联络，对方火把熄灭。张爱萍又让司号员吹三军团的号牌子。他们终于接上头，传达了军委的命令。一军团部队此时又点起火把，一、三军团两条长长的火龙相向而行，煞是壮观。

在抢渡大渡河之前，他又奉命率部以每天行军 60 公里的速度赶赴大树堡，以掩护红一军团在安顺场过大渡河，来回两经晒经山。他人在山上，即诗思奔涌；下得山来，笔到诗成：

晒经山颠晒经关，
玄奘东还曝经篇。
羊肠直上通霄汉，
银星组臂似游仙。
说大圣，
笑语欢，
昼夜两趟晒经山。

节奏轻捷，韵律明快，其乐观的情绪跃然纸上。

翻越晒经山后，张爱萍被调到红十三团当政委。他同彭雪枫团长一起率部过大渡河占领天全，之后，他写了首“飞渡大渡河”：

大敌追截当机断，
敢破重围红军胆。
河水咆哮狂涛卷，
勇士夺桥铁臂挽。
安顺场边翼王难，
岂让历史重幻演？
看今朝，
鹏翅展，
红军飞越渡天险。

仿佛看到诗人立于巍峨江岸，面对滔滔激浪在放声高歌。

夹金山，海拔 4800 多米，山上终年积雪，天气变化无常。部队只

能于上午 9 时后开始攀登，下午 3 时前越过主峰。否则，夹金山任何一处都可以把你“夹”住不放。十三团每人备了根棍子，以助行进。

在翻越陡峭的雪岗时，彭雪枫让张爱萍和他一起拉着马尾巴。走了一阵儿，山陡路滑，马尾巴也靠不住了。加之一些同志没跟上来，张爱萍就停下来招呼后边的同志，看一步几喘的红小鬼十分沉重地扛着大枪行进艰难，他就把枪接过来扛在自己肩上。走到半山腰，他肩上已经有 7 支步枪了。走过半山腰，从山那边传来了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镇会师的消息。劳顿中的指战员一片欢呼，也为爬山增添了动力。

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由于高山缺氧，张爱萍胸部剧烈起伏，大汗淋漓。彭雪枫发现他背上的 7 支大枪，不禁惊呼：“你还背这么多铁家伙啊！”

下得山来，在达维镇宿营。当晚，在皎洁的月光下，张爱萍吟道：

夹金六月犹飞雪，
红军渡沪从头越。
夜宿南麓孤月升，
晨攀北峰冷日斜。
银海茫茫鸟兽绝，
寒风凛冽休停歇。
狂喜两军巧会师，
欢声雷动天地裂。

《过草地》一诗亦然：与前几首诗明显不同的是，此诗注重了对仗的工整，透出了韵律的美、建筑的美。

绿原无垠漫风烟，
蓬蒿没膝步泥潭。
野菜水煮果腹暖，
干草火烧驱夜寒。
坐地随意堪路宿，
卧看行云逐浪翻。
帐月席茵刀枪枕，
谈笑低吟道明天。

过草地之艰难世人尽知。然而，诗人却笑对其难。“坐地随意”，

视泥潭、毒水如平川、庭院，举重若轻；“卧看行云”，观暴雨狂风为巧云轻纱，苦中作乐；以明月的清晖作帐、没膝的荒草作席、冰冷的刀枪作枕，而且“谈笑低吟”，其气派、意境不能不让人想到“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之千古名句。

长征红军经过哈达铺改编后，主力继续北进。张爱萍所部在翻越六盘山时，于固原县的青石嘴歼敌骑兵两个连，通过平（凉）固（原）公路封锁线。行进途中时值夜半，皓月当空，恰逢一镇，张爱萍决定就地宿营。

翌日清晨，一些老乡围观突然住进来的红军，张爱萍不禁问道：“这是什么地方？”老乡回答：“是吴起镇。”哦，已经到陕北苏区了！指战员们一阵惊喜。

至此，时值 1935 年 10 月 19 日，红三军团在红一方面军编成内胜利完成了历时 1 年、纵横 11 个省、行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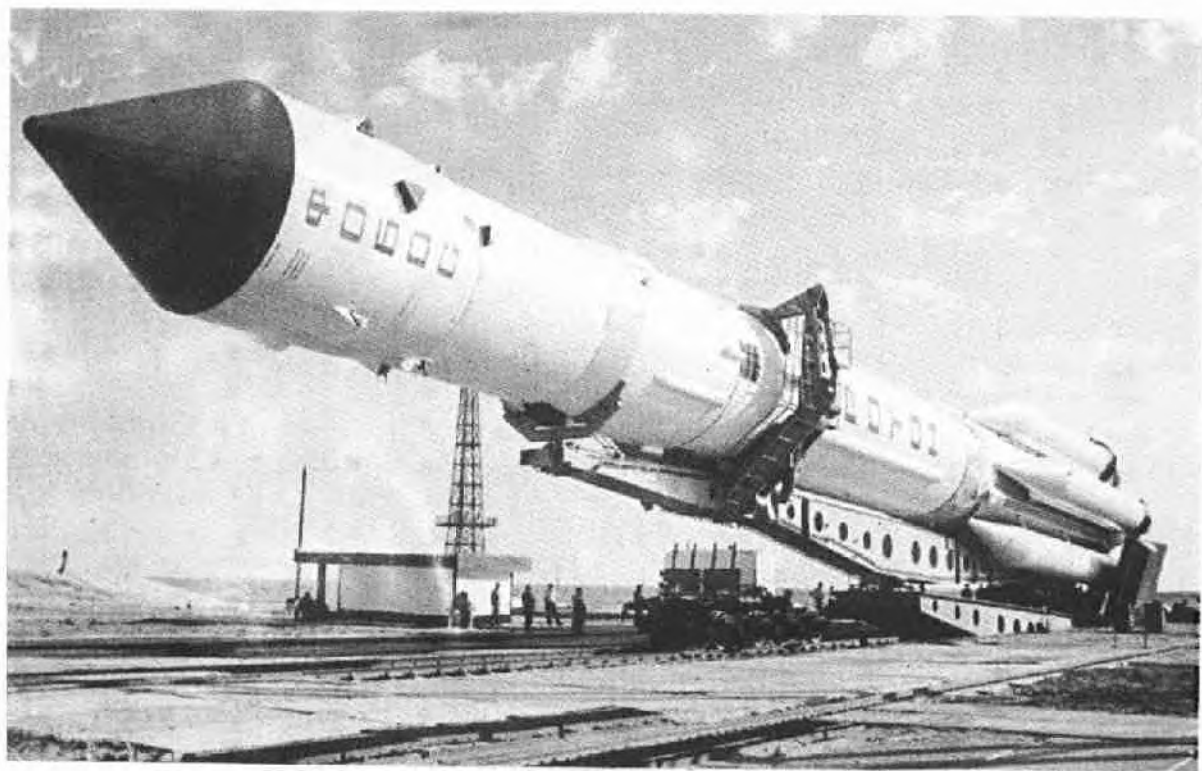
张爱萍即兴赋诗一首：

胜利到达吴起镇

秋风凉月伴征程，
马不停蹄步疾行。
未遇人群逾四月，
夜半宿营吴起镇。
晨见村头聚乡亲，
高喊“欢迎铁红军！”
方知陕北苏区境，
惊喜已抵自家门。
军民相会激情涌，
欢呼声震九重云。
千难万险等闲过，
长征胜利举世闻。

张爱萍的长征诗，目前能读到的有 12 首，基本体现了红三军团同时也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始末。他的每首诗都是他亲历亲感的历史事件，捧读他的长征诗，长征的万水千山万险千难又在眼前展现。

（责任编辑 仲文）



异国航天业巡礼

● 剑 盟

莫斯科城东北角有一处神秘的建筑群，这些外表极其普通的楼宇，就是闻名于世的前苏联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

指挥控制中心宽大的走廊相互贯通，拐来拐去没有尽头，像是在走迷宫一般。我们参观了这里的主计算机工作站、分系统计算机工作站、医学监测生命保证站、通信联络站、轨道控制站、指令发送接收站……令人目不暇接。载人航天从发射、入轨、对接，一直到离轨、返回、落地，都靠这些工作站来指挥、操作和保障。

当我们来到指挥厅时，正赶上“联盟 TM15 号”飞船与太空中运行的“和平号”空间站正进行对接，一

幅动人的真实情景清晰地显示在指挥厅的屏幕上。

大屏幕不停地变换着显示数据信息，空间站、飞船外景和航天员在舱内工作的图像。这艘飞船上载有三名航天员，其中两名俄国人，一名法国人。他们在飞船内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技术操作，一边又不时地对着摄像镜头在飞船上招手致意，使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随着高速运行的两个飞行器的距离越来越小，这时只见飞船与空间站上各自向上伸出一个用于对接触角插在了一起，对接成功了！这一对接技术，竟如此轻松。

飞船上的圆形舱门打开后，三个航天员像游鱼般地从舱门依次“游入”空间站，与远离地球很长时间而生活在寂寞的空间站内的航天

员重逢，他们亲切握手、热烈拥抱。

在指挥大厅入口处的墙上，我们看到记载着前苏联辉煌的载人航天史。自从人类首次进行太空遨游的航天员尤里·加加林离开地球又安全返回的那时起，以后的每一位航天员上天前，都要把自己的光辉形象和“飞天”的简要记载留在这里。

人类飞向太空，要经历真空、辐射、温度骤变、强烈振动、巨大噪音、严重过载、长时间失重，还要经受飞行时的紧张心理以及在太空中忍受孤独寂寞等等一系列复杂而艰巨的考验。

前苏联航天员训练中心首选加加林，是他具有无可争议的长处，无与伦比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飞行成功的坚定信心和他那健康的体魄，乐观的心理，办事认真、灵活的头

脑、好学、果断、谦虚、自我克制能力等等素质。

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着“东方号”宇宙飞船绕地球一周后安全返回地面，实现了世界上飞行器首次载人航行。加加林也由此成为地球上人类的第一名“太空人”。并且，他的这次太空飞行震撼了世界，人类首次进入太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如今，这面墙上已密密麻麻贴上了近百名航天员的照片。除尤里·加加林以外，有1963年6月16日至19日驾驶“东方6号”宇宙飞船绕地球飞行48圈，航程200万公里的世界上第一位女航天员瓦莲金·弗拉基米娜·捷列什科娃。她1969年被当选为国际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当年为了纪念她，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以她的名字命名。

这些航天员在航天站上不仅开展地球资源勘察、天文观测、太空物理实验、进行太空植物栽培、制造生产晶体材料和药物，而且出舱进行了太空行走、太空安装作业以及太空轨道转移等试验。这些活动为人类进一步征服太空，在太空建立长期生活基地，开展不同的星际航行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和经验。

我们来到莫斯科郊外的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预备航天员们都要在这里进行严格的培训，这里是一个真正的航天员的摇篮。接待我们的航天员训练中心主任是一位佩带着中将军衔的笑眯眯的军人，他曾经也是一名飞过天的航天员，据说这个中心像他这样经历的人还有许多。也正是有这么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比较完备的训练设施，才使前苏联的载人航天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要经历发射上升、入轨运行和再入返回这么三个最基本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环境条件非常陌生又极为严酷的宇宙空间进行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得

有丝毫的差错，否则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通往苍穹的征途上，他们的困难、挫折、事故和失败使人类获得了深刻而宝贵的经验教训，正如这些太空人所叙，今天所付出的各种代价是为明天开发利用宇宙空间这一巨大财富的投资。

我们从莫斯科乘坐专机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来到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拜科努尔发射场。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这座规模庞大的发射场兴建于1955年初，1957年10月4日，这里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开始了人类的航天时代。

这个热闹非凡的发射场曾发射过“飓风号”、“质子号”、“宇宙号”等各种型号的运载火箭，并且这些火箭每种都有几百发的发射记录。

当今世界上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能源号运载火箭曾于1990年载着102吨重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从这里点火进行无人驾驶飞行，在太空完成了预定任务后又安全返回在这里。

“东方/联盟/闪电”号火箭从1957年开始到1990年曾进行过1400多次发射，发射最频繁的年度竟达到一年40—50次，并且它的成功率很高，这种火箭曾把近百名航天员送上天去遨游太空。

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一位副司令，他两鬓斑白，身着紧身半袖上衣，肩上佩带着少将军衔。他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一次“联盟号”飞船发射任务中，火箭在拜科努尔发射场刚刚起飞仅几十秒钟，他马上敏锐地发现飞行不正常，这时的航天员面临着灭顶之灾，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果断地下达了处置命令，启动了飞船上用于安全救生的逃逸系统，将航天员从火箭的顶端分离出来，使航天员死里逃生。

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对方一

张张友好的笑脸，他们热情地回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说：“对中国朋友应该是什么都可以讲的。”

初次见面，我们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们，就问：“是称你们先生呢，还是称同志？”他们的回答却都是一致的“当然是称同志”。

这里航天器发射的频率很高，据统计，仅1989年全世界共进行的100多次航天器发射中，他们就占了70多次（而美国还不到20次、欧洲7次、日本2次）。就是这个数字也还比前三年的发射数低，1986年至1988年的三年间，每年的航天器发射量都在90次以上。这些航天器中有载人飞船、运货飞船，有军用卫星、民用卫星和科学研究卫星。

离开这片土地的前一天，我们又回到指挥控制中心观看了几天前发射升空宇宙遨游后返回地球在拜科努尔着陆全过程的壮观景象。

二

正值樱花盛开的阳春四月，我们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征途。

战后的日本不仅工业发展得比较快，航天工业的发展也很迅猛。火箭与航天是日本工业中比较新的产业，起步于50—60年代，7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日本当局认为，是否拥有现代火箭和航天技术是日本能否在国际舞台上巩固其政治威望的要素之一，因而十分重视和支持航天工业的发展。

近年来，日本依靠自己雄厚的电子、冶金、精密机械加工等技术实力，使空间技术很快地得到了应用。据统计，日本已向空中发射了50多颗人造卫星，有用于传输通信和广播的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有用于天气预报的气象卫星，以及地球观测卫星、宇宙探测卫星等。他们利用卫星进行通信、气象、导航，已经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反过



日本种子岛发射场

来,航天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产业技术的进步。例如日产汽车公司是日本固体火箭生产的主要承包商,三菱重工是火箭结构生产和全箭的总装厂,川崎重工负责发射设施和大型地面设备,控制系统、遥测系统、地面接受系统均由各公司承包生产。目前,日本参加航天产业的企业数足足超过100家。

日本最初从国外引进了“N”火箭技术,接着又发展了“M”火箭、“H-1”火箭,但令日本人感到自豪的还是“H-2”火箭和吉信发射场。

我们一行来到了本州岛中南部浓尾平原上的名古屋市,日本自行研制的新型H-2运载火箭在这里的三菱重工业公司生产。

在工厂参观过程中,我看见巨大的“H-2”号火箭正水平躺在厂房里进行总装,车间的技术人员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火箭的性能等情况。在出来的路上,我想着刚刚看

过的火箭,对这种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火箭的外保温层发生了兴趣,便很随便地问了一句“你们火箭外皮保温层好像有些别致”。陪同的先生指着旁边不远的一栋厂房说:“那里就是火箭外皮保温层的加工车间,火箭的保温层便在那儿进行加工处理。”我知道日程上没有这一项参观内容,但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生产过程呢?”他说:“这要看今天那里有没有工作,只要能打开门,你们就可以去看,请你们稍等一下。”说着快步离去。

不一会儿,他快步走过来说:“拿钥匙的人马上就来,我们可以过去了。”于是领着我们来到了车间里。“你们都是内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要客气。”从他那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到对我们友好的表情。

离东京不远的筑波,是日本新起的科学城。这里有卫星生产制造

厂,有航天控制中心,还有载人航天研究设施,我们在这里一一地进行了参观。来到这里的航天中心主楼前,我发现三个旗杆上分别有三面旗帜在随风飘扬,一面是日本国旗、一面是日本航天标志旗,还有一面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主人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专门在这里升起了我们的国旗。

日本的航天发射场建在九州鹿儿岛南部的种子岛南端,岛上丘陵起伏,属亚热带森林气候,岛上居民不多,主要是渔民,只有两个不足万人的西之表镇和中种子镇。但这里却有令日本人自豪的航天发射中心,这个中心由大崎发射场、竹崎发射场和吉信三个发射场组成,它们的位置都清一色坐落在海边。

这个发射场从1988年开始发射“H-1”火箭,在这里把不同型号的卫星送入太空。

1985年,日本开始了“H-2”火箭的研制工作。

用日本朋友的话说,前几种火箭因为是引进的技术,在对外合作、交流及国际商业开发利用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而“H-2”火箭是日本自己独立开发研制的,所以这种火箭可以自由地参加国际航天发射服务市场的平等竞争。

“H-2”火箭终于在1994年2月首次点火升空,并一举获得成功。

日本的航天发射场在种子岛,尽管这里位于远离人口密集地区的最南端,但这一片浩瀚的海面是渔民们辽阔的捕鱼区,巨大噪音对捕鱼造成了影响,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定,即每年只能在捕鱼淡季很有限的2-3个月内安排发射。

我们到达种子岛的当天傍晚,发射场为我们举行了日本式丰盛的欢迎宴会。席间大家吃着和饭,喝着老酒,共叙情谊。

前来作陪的种子岛镇镇长用一种异样的目光不住地盯着我的西装领口,我感到有点纳闷儿,这时他已

走了过来,与他简短攀谈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西装领子上别着一枚五星红旗中间竖立着长征二号捆绑运载火箭的纪念章引起了他的兴趣。我们俩搭上话茬后,他就一个劲儿地说中国的火箭是如何先进的,夸奖这枚纪念章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有意义。我心领神会了,于是我从自己的领口上摘下纪念章递了过去,没想到他用双手捧着这个比拇指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小玩艺儿,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谢谢”、“谢谢”的同时,又深情地点头哈腰90度对我连鞠了三个躬。当他回到原来的座位后,又与他身边的朋友手舞足蹈地比画着,别人盯着他的胸前欣赏,他则得意地摇头晃脑,并又朝着我举手致意。

种子岛发射场的前一届主任,现在是日本载人宇宙株式会社的董事长。为了表示真情实意,他提前从东京出来,陪同我们一道考察。

听同行的先生讲,像他这样的发射场主任,任期只有三到四年,新老领导之间的交接很简单,一般连面都不见,老领导留下办公室的钥匙和文件后走人,新领导来了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和思路开展工作。日本的许多企业都像这个发射场的情况一样,先抓管理人员,再抓技术人员,要企业人员首先树立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意识,然后用各种制度和规定对人员进行制约,还要有人员与人员之间进行竞争的机制和条件。另外,老领导离现任后一般情况下也很少再到老单位,以免干扰他们正常工作秩序,实际上更多的还是他们心里想自觉回避。这次老主任前来陪同你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片心意。

日本种子岛上的航天测控站虽然规模较大,但人员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的问题就由社会去解决,而站里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和管理工作,并且各种大型设备的操作大部分都是由生产厂家派人来负

责,不仅可以保证质量,而且也可以提高效率。这些思路不能不说是一种科学的、有效的经验。

这些都引起了我久久的思索……

三

当我们由旧金山乘飞机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机场后,令人兴奋的还不仅是美国南部风光的好奇,更主要的是这里有获得世界航天史上许多个第一殊荣的航天发射场。

卡那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坐落在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半岛上,这里的发射指挥控制中心设有不同用途发射控制室,可以单独对火箭、航天器进行检测和发射控制;这里还有运载火箭、宇宙飞船、航天飞机以及各类卫星的装配检测大楼,为了满足“阿波罗”飞机和“土星5号”这样体积非常庞大,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的航天器测试,月球港建造了一座长218米、宽158米、高160米,相当于50多层楼房高度的测试装配厂房。这座建筑物的使用

面积约34200平方米,内部容积约360万立方米,在这个大楼里可以同时检测和装配4艘“阿波罗”飞船或其他航天器;另外,这里的航天跟踪控制设施可以对发射上天的各种航天器进行测量控制。

当执行发射任务时,特别是航天飞机发射时,肯尼迪航天中心防护线外的空地上便成了喧嚣的“大集市”,人们举目凝望空旷无边的大西洋上空,等待着一饱眼福。当夕阳的霞光与航天飞机发动机喷射的橘红色烈焰交织在一起冲入人们的视线时,人们此时此刻的感觉似乎与太空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在好莱坞蜡像馆,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第十次航行爆炸时与其一起罹难的7名航天员活灵活现的音容笑貌大大地吸引了我们。

当年,我在中国的电视机上看到航天飞机爆炸的图像时,曾经被这一噩耗震惊过,可以说这是世界航天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现在,我就站在他们的前面,不禁产生出一种敬佩之情。我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他们是开拓天疆的



作者在美国
卡纳维拉尔
角航天飞机
发射场

勇士,是向宇宙挑战的强者,他们的名字已载入美国英雄的史册。人们无不赞扬他们探索宇宙、进军太空的大无畏的精神。

25年前美国在世界上领先登上了月球,到1972年12月“阿波罗”共进行了7次登月飞行,在这7次载人登月飞行中,除1970年4月“阿波罗13号”飞船在赴月途中因服务舱液氧箱爆炸而中止登月,3名航天员被迫依靠登月舱的动力、水和氧气绕过月球驾驶着飞船死里逃生返回地球外,其余登月全部成功。共有12名航天员在月球表面停留302小时33分钟,他们在月球表面行程90.6公里,在6个不同的地点带回381公斤月球岩石和土壤样品。整个阿波罗工程历时约11年,耗资约255亿美元。

阿波罗飞船经过10次载人和不载人飞行后,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3名航天员离开地球踏上了赴月的征途,大约经过100小时的长途跋涉,人类派出的使者首次在月球这个“静海”着陆。航天员出舱前,怀着既欣喜又恐惧的心情对登月舱各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做好了发生意外情况时能立即起飞的一切准备工作。

7月21日格林威治时间3时51分,指令长阿姆斯特朗首先从舱门钻了出来,他站在5米高的小平台上,静静地望着这个陌生而又荒凉的月球表面,几分钟后他伸出左脚,顺着扶梯走一步停三步地向月面上走去,九级扶梯仅有5米高,而他却走了整整3分钟。地球世界上有无数的人们从电视上观看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壮举。当他的右脚还停留在登月舱上,而左脚小心翼翼地触及月面时,发现左脚陷入月面并不很深,这时他才鼓足勇气将双脚稳稳地立在了月面上,对着地球上的人们说出了等待已久的第一句话:“对一个人来说,这是第一步,但

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令阿姆斯特朗遗憾的是,这个月球上原来只是一个没有水、没有空气、也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安静世界。嫦娥没有前来欢迎,吴刚也未未来献酒,文人笔下的诗情画意此时荡然无存,只有深黑色的天空,棕灰色的尘土和一片令人恐怖的荒凉。他们穿着笨重的航天服在月面上像袋鼠一样跳跃行走,挖土取样,安放仪器。在月球表面插上一面用尼龙丝编制成的特制星条旗,这面旗由于一根弹簧丝的作用,在这无风的月面上看起来也好像是迎风飘扬。他们还在月面上留下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写着:“1969年7月,地球人首次在此踏上月球,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为了减轻返回时的重量,也为了到月球一游留点纪念,他们把两套价值60万美元的航天服和三架摄影机等不需要的设备物品留在了月球上。他们在月面上停留了21小时36分,在舱外活动了2小时24分后,地面发来了离开月球的指令,登月舱从月面上缓缓升起,7月24日安全返回地球。

美国具有技术优势和经济实力,他们在太空建起了有人操纵的长期空间站,驾驶着航天飞机飞去飞回,他们的航天技术遥遥领先。

自从1981年4月12日美国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首航成功以来,“挑战者号”、“发现号”和“亚特兰蒂斯号”也相继投入飞行,到1990年底,使用这4架航天飞机共进行了38次往返于太空与地球之间的载人航天飞行,199人乘坐航天飞机参加了飞行活动,其中有12名女性航天员。在这些飞行中,航天员们除了在太空中进行各种科学试验外,还进行了46颗卫星的施放工作,人们所熟悉的“麦哲伦号”金星探测器、“伽里略号”木星探测器,还有太阳探测器以及“哈勃”天

文望远镜都是由这些航天飞机运上天,安放在太空轨道上的。航天飞机的首航指令长约翰·杨,曾6次上天遨游,创造了世界上天航行次数最多的记录。

有一次,我随同几位美国朋友从北京前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美国人中有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他是美国休斯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据说这位先生早年既是军人又是科学家,还与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同过学、共过事。从出发时我就发现他手中抱着一本书很专注地读,他既不聊天、不谈笑,也不在候机厅里游赏,一直到返回在成都机场中转候机时,我才发现他读的是《中国历史几千年》。他认真地告诉我:“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不一样,中国现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派新气象。几天来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意思,就是想在离开中国前留下一个对中国的客观的印象,现在印象有了,她是可爱的、是美好的,我会把它珍藏在心中。在西昌,我看到你们发射场以及那里的技术人员很亲切,也是称职的。我认为把卫星运到中国来发射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中美两国卫星发射的合作是会成功的。”说完之后,他又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上印着唐老鸭、米老鼠的精美画册,我看到上面的书名写着《DISNEYLAND》(《迪斯尼乐园(美国加州大型游乐场)》),他打开书掏出笔在扉页上写下“With warm regards, and thanks.”然后在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我说:“请收下这些吉祥物,留作一个纪念吧。”

我被这些话语和举动深深地感动了,我长久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贵州人移贵州山

——“中国耕地保护万里行”贵州篇之一

● 刘宏伟

行走在贵州高原上，脚下永远是长长的山道，眼中永远是绵绵的山岭。耕地在大山的挤压下显得局促而尴尬。笔者看到：漫山遍野的突岩颓岭上，稀落的玉米苗长在那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坑里；甚至，农民们从石缝里一把把地抠出泥土，运下山来，铺在自家屋顶上，一年四季就在这块“屋顶耕地”上种瓜点豆。

袁桂荣副省长告诉我：一位农民被告知分到了八块田，可他就是找不到那第八块田在哪里，正在疑惑之时，一位村干部指着他放在地上的斗笠：“呸，第八块田不就在你斗笠下面吗？！”

这不是笑话，袁副省长说这个故事时一脸肃然。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人均耕地仅0.83亩。贵州人祖祖辈辈都是在石头缝里求生存。

愚公移山在中国早就家喻户晓，因毛泽东的倡导成了人类精神的美誉。199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站在贵州高原寒冬的冷风里，望着工地上修造梯田的大军，兴奋地连声称赞说：“这的确是愚公移山！”他把这一美誉赠给了贵州人民。

那天，江总书记与遵义县石板镇的农民们一起奋力挥锄。从此，每到冬闲，贵州的山山岭岭就活跃起一支支“坡改梯”的愚公大军。他们把那遇风就跑土，遇晴就旱的石脊见地，改成一块块保水、保土、保肥的农田。

将千家万户的人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战天斗地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屡屡成功的法宝，贵州“坡改梯”工程的成功证明：这个法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威力依然。

最初，遵义县石板乡乡长冯文章起早贪黑地走村串寨，挨家挨户动员村民们参加“坡改梯”工程，穷了几辈子的乡亲们几乎不再指望青石板上会有奇迹发生。而且，对政府的“谁改造谁受益”的政策也半信半疑。最终驾不住冯乡长的百般说服，终于上山了，当村民们从“坡

改梯”中得到了粮食与收入的双增加时，他们异口同声夸赞的人，就正是这些真心实意的乡村干部们。

贵州人将“坡改梯”工程弄得很像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从省、地、州、县到各乡镇都层层设置了指挥部。最令当地群众欣喜的，是指挥部里的政府官员们表现出了可贵的“勤政”风貌：在桐梓县，各级指挥部以党纪、政纪作保证向上一级指挥部签订责任状，层层都承办了总数为一万亩的“坡改梯”施工点。副县长刘茂杰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就是要一级做给一级看；在绥阳县，县长郭黔生亲任指挥长，全县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点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脚步；在遵义县，县委书记李冠伟仅对石板村这个工程点就先后四十多次亲自去为群众排忧解难……

那遍布贵州高原的众多“坡改梯”工程点，几乎成了凝聚当代贵州人的精神家园。农民们在这里自强不息，靠双手脱贫致富；到这里参加义务劳动的各界人士，则在炸石改土的过程中磨砺自己，报效社会。在那义务劳动的浩浩大军里，有中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们，有省、地、州、县的机关干部们，更有省委书记刘方仁，省长陈仕伦。当人们用岩石垒起一道道石坎时，当人们在长长的石坎里用一捧捧的泥土铺出一块块的梯田时，那关于耕地保护的国策，那关于珍惜家乡土地的忧患意识，就潜移默化地在心底深处扎根了。

这，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耕地保护工程。

贵州省因贫困县众多而一直受到来自国家的扶贫救援。这项救援因“坡改梯”工程的出现有了一个新的方式：以工代赈。新的方式标志着参加“坡改梯”工程的群众从政府手中领到的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救济金，而成了事实上的工程款。虽然每亩就只有一百多元钱，拿去买了炸药、雷管等工程必需品后已所剩不多，但是

人们赞成这个!因为,这是我们并不富裕的国家在有限的金钱对贫困地区进行着收益无限的救助。这无限的收益在贵州被广泛概括为一个很有对仗味道的句子:功在当代,利在子孙。

事实上,利在子孙的“坡改梯”已经提前利在当代了。于是,笔者在采访中就有了连续不断的惊喜:

在桐梓县,五年来改土 56788 亩,新增耕地 3600 亩,新增粮食产量 4260 吨,新增经济作物产值 503 44 万元;在绥阳县,五年来新增耕地面积 3000 多亩,综合治理后的水土保持面积达到 73000 亩,更有许多边远的贫困村寨因为“坡改梯”工程的开展而终于通上了电、修

起了村级公路;在遵义县,五年来仅石板镇就改土 3009 亩;在长顺县长寨镇的一个名叫楠木井的工程点上,新增耕地 11 亩,改梯造林 200 亩,而那 400 亩杂交玉米的亩产量一下子就新增了 35 公斤!

当笔者来到这个位于山谷深处的楠木井工程点时,听说朱镕基副总理刚刚视察完毕离开这里。环顾着被整治一新的梯田梯土,朱镕基副总理感慨万分地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

“光靠高楼大厦是不稳的,土地留下来才是稳的。”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三月风》 征订启事

在青春的旅途上,《三月风》以一双真诚的眼睛关注你:关注你的人生命运;你的人生价值;你的自我追求;你的人生体验和思索;你的权益和需求。《三月风》奉献给你的是一片真诚;留给你的是一份青春记忆……

《三月风》贴近现实,辟有:人道与社会、社会冲击波、文化观象台、人在旅途、百味人生、心灵驿站、环球采风、两性世界、休闲杂记、艺术与人、文摘集萃、维纳斯星座、文学众生相、野蔷薇、世间百态、医林一绝等众多栏目,一册在手,尽览社会、人生;一旦相识,永难分离。

《三月风》16开48页,从1997年1月每册由1.20元调为2.20元,每月3日出版(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1025/C,邮发代号:2—546,各地邮局订阅、零售。本刊办理邮购,可破季订阅,如有漏订和订阅不便的读者,也可直接向本社发行部汇款邮购(请在附言中写明刊物名称、期号、订购数和收刊人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本刊全年定价26.40元;邮购每册加邮寄包装费0.15元,国外代号:M—777,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总发行。

现尚存少量1987年、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合订本,每本10元。1993年合订本,每本15元。1994年、1995年合订本,每本20元。

我社发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惠新里甲8号

发行部电话:(010)64227842

邮政编码:100101

联系人:朱京华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和平里分理处

银行代号:042

帐号:144814—93

欢迎
订阅

《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以关注热点、荟萃精品为宗旨,依靠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展示文艺界最新创作成就,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熔文学性、新闻性、趣味性为一炉的90年代文化快餐。

《作家文摘》每逢周五出版,辟有众多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栏目,视野开阔,选编精当,真实生动,品位高雅。

《作家文摘》将从1997年元月起扩为4开16版。扩版后的《作家文摘》栏目增多,内容更加充实生动、丰富多彩;扩版后的《作家文摘》字号将由6号字改为小5号字,字迹清晰,版面活泼,更方便中老年人阅读。

《作家文摘》自1993年元旦创刊以来,已跃为首都零售量最大的周报,愿在新的一年里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怀与厚爱!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22

邮发代号 1—190

月价:340元

季价:10.20元

半年价:2040元

全年价:4080元

中央苏区第一任妇女部长

周月林的曲折人生

● 万 刚 辛 畅

1926年秋天,上海举行武装起义的前夕,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了。紧急情况下,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决定让她去苏联,既可避难,又能留学。

这位童工出身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就这样走向了异国他乡。

到了苏联,她取名“诺云斯克娃”,先是在一所党校学习,后来又由伯力任华工俱乐部主任。就是这段时期,她结识了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已很有影响的梁柏台,不久,他俩结了婚。

在苏联,丰富纷繁的革命生活,使9岁就当童工的周月林更感自己的文化低,知识不够用。在她的要求下,她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特别班。

1931年5月,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踏上回国的征途。

到了上海,在组织的安排下,于7月下旬,由秘密交通陪同,经香港进入福建省的闽西苏区,又几经辗转才到达中国的红都——瑞金。

这时的周月林剪一头短发,着一身军装,骑一匹战马——别看她才26岁,却很快成了中央苏区的“国家领导”了。

1932年4月,她担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这个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妇女联合会,因此,周月林可说是中国妇联主任的第一人。

这位专门改善妇女生活的主任,经常骑着马往下面跑,每到一处就发动妇女们“废除童养媳”,开展“放脚运动”。风风火火的斗争生活把周月林锻炼得更加大胆泼辣了。

有一次,中央苏区要召开一个公审政府总务处长刘凯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大会,但熟知法律的梁柏台认为,情况还够不上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便要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不必出面了,公审大会改成批判大会,临时决

定由周月林主持。

这一天,年轻的周月林在中央政府的广场上,声音嘹亮,气度不凡,把个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群众大会主持得有声有色。恰在此时,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路过会场,一下子就被台上的这位能干的女干部吸引住了。当时,党中央正缺一位妇女部长,问清这位“女能人”是谁之后,张闻天就提议中共中央局任命周月林为妇女部长。周月林虽然舍不得政府的工作,但仍然服从党的决定,担任了党内的妇女部长。

1933年3月23日,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了刘伯坚夫人王叔振写的一篇报道,说的是周月林和贺子珍带头学习犁田,带动了中央各机关的女干部和苏区的妇女打破旧传统争先恐后学犁田的事迹。

这年2月,苏区中央政府发出了开展春耕生产竞赛的号召。一天,周月林向毛主席汇报组织妇女学习参加春耕生产的想法,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犁田是保证春耕生产的关键,如果广大妇女掌握了犁田这个本领,今年的春耕生产一定会打个漂亮仗!”接着,毛主席又问她:“那你怎么个组织法呢?”

周月林说:“我明天就约中央机关的两个女同志下地犁田,先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在旁静听他俩谈话的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忍不住大声说:“周月林,明天有我一个!”毛泽东也高兴地说:“好,明天我也去看你们犁田。”

第二天一大早,当她和贺子珍正扛着犁、赶着牛,向村边的水田走去时,毛泽东大步赶了上来,招呼说:“来来来,你们先别下田,先到河边的沙地上去练练,待犁把稳了再下田不迟。”

“好办法,我们怎么没想到!”周月林、贺子珍齐声说,随着毛主席来到沙河边的沙地上。

“我先犁给你们看看。”毛泽东十分熟练地驾好犁,吆喝着牛就犁开了。他边犁边讲解,怎样把得稳,怎样

犁得直，周月林佩服不已，真想不到，红军的高级领导竟还是一个犁田的好把式！

毛泽东犁了两圈之后，又手把手教她俩犁了几遍。

毛主席教周月林、贺子珍犁田的消息传开后，中央机关的女干部们都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在苏区掀起了一个妇女学犁田的热潮。瑞金县组织起260个女子生产学习小组，2万多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其中8000名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

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梁柏台是司法人民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重要，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李维汉）等17人被选举为中央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月林则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如今，仍然健在的中央主席团成员只有周月林一人了。

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样一幅黑白历史照片：画面上是6名女红军，那是周月林和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朱德夫人康克清、毛泽民夫人钱希钧、古柏

夫人曾碧漪、陈正人夫人彭儒的合影。自从周月林来到苏区和贺子珍相遇之后，两个人是一见如故，情同姐妹。是贺子珍提议拍的这张照片。6个年轻的女红军亲亲热热地聚在了一起，周月林站在后排，她的右手挎着钱希钧的左胳膊，左手搂着贺子珍，而贺子珍的右手又拉着周月林的左手……她们的身后是一片苍翠欲滴的小树林，衬托得她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女军人们，是那样青春、快活、潇洒……

1934年4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又找周月林谈话，笑呵呵地对她说：“周月林同志，张闻天和我研究，让我和你谈一谈，将你的工作动一动。”“怎么个动法？”周月林问。

“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家医院，让你去当院长。”毛泽东说。

“当医院院长？我不懂医务，干不了呀！”

“医务方面已决定派傅连暲去负责，不必担心。你去主要是加强政治领导。现在医院的医生，我们自己培养的很少，多数是俘虏来的。你的任务是教育团结他们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为革命服务，为红军服务，为工农服务。”

听了毛主席这番话，周月林愉快地点点头：“好，我去！”

果然，周月林干得确是很让人放心。除了自己以身作则，边学边干，艰苦奋斗外，她还专门立了一条规矩：凡是女同志生孩子，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是难产顺产，一定要通知她到场。有一次，有位红军女干部难产，接生的是俘虏才不久的白军医生，慌得不知所措，产妇十分危急。周月林叫医生站在一边，自己亲自接生，终于产下了一个水灵灵的可爱的女孩子，母子平安。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之后，高兴地说：“周月林干得不错嘛！”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了。周月林和梁柏台留下随项英、陈毅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但是最终他们也得走。梁柏台是在1935年3月的突围中，负伤被俘，英勇就义的，年仅36岁。而周月林早在这年的2月，经留在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决定，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些老弱病者先行转移。接下来，便是周月林生命中最惨痛的一幕了，这惨痛将伴随她终身！

转移的方向是上海或香港，转移的方案则设想了好几个。化装成红军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工农红军妇女代表合影。后立者左起：康克清、钱希钧、周月林、贺子珍；前排坐者左起曾碧漪、彭儒。

虏、装扮成香菇客之类的方案先后被否定，最终是瞿秋白他们几个戴着演戏用的假面具，由一连红军战士掩护，沿着僻静山路撤退。戴假面具是因为瞿秋白他们都是苏区内外影响很大的著名人物，用以遮人耳目。

曲曲折折，他们已来到了福建闽西的水口镇附近。借着夜幕，他们悄悄地渡过河，在一座小山村休息时，被国民党一支土顽部队包围了。红军战士们拼死掩护着他们冲到一个山坡上，往下一看，大家都愣住了，山那面没有路，全是悬崖陡坡。再回头一看，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土顽部队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不知谁喊了声：“我们滚下山去吧！”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他们双手抱头，眼一闭，心一横，便向着岩石嶙峋的陡坡扑了下去。

一阵剧痛和震动之后，周月林睁开两眼一看，已经滚落到山下的一片泥潭之中。她伸展了几下手脚，都还能动。这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寻找瞿秋白、何老。搜索了一圈，何老没有找到（何叔衡已在“下山”中壮烈牺牲）。在一丛乱石中她看到了瞿秋白。脸色苍白、身患肺病的瞿秋白正疲惫地默坐在一块石头上。一见到周月林向他走来，眼睛一亮，脱口叫了声：“阿妹，你来了！”温文尔雅的瞿秋白从不随意称呼别人的，此时此刻，大概是患难见真情吧，亲昵的称呼脱口而出。从那以后，瞿秋白就一直叫周月林“阿妹”。然后，他们又找到了性格毛糙、外号“张飞”的项英之妻张亮，三人结伴继续前行。

但是，瞿秋白身患重病，张亮又怀有身孕，走了一阵就实在走不动了。更糟糕的是，漫山遍野都是白军在搜索，情况万分危急。

这时候，他们看到一间破房子，便进去休息。周月林又主动地到屋外的灌木丛中去站岗，说好发现情况就拍三下手，屋里的人便赶紧出来。短暂的平静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瞿秋白、张亮就在周月林的“警报”声中，也钻进了灌木丛。

就在瞿秋白和张亮往灌木丛钻的时候，土顽迅速包围了灌木丛。但是他们不敢往里进，只是对着丛林乱嚷：“里面有没有人，要开枪了！”张亮沉不住气了，大声叫着：“别开枪，有人！”说着，她就自管走了出去。张亮走出灌木丛后，就站着不动了，白军问她里面还有没有人，她也不吭声，就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这一来，匪兵们更加怀疑，端着枪进去把瞿秋白和周月林搜捕了出来。

被捕的第一夜，他们被关押在敌军营部，没有受审，并且是三人囚禁在同一室。利用这个机会，三个人便商量编串口供。瞿秋白确定大家的总体身份都是从苏区逃出来。而具体的身份分别为：周月林化名“陈秀英”，是国家医院的护士。张亮化名“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她长得胖，倒也挺像。瞿秋白化名“林琪祥”，是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医生。周月林问他：你不会看病，谁相信你是医生？瞿秋白说：我编其他的身份更加不像，只要



周月林近影

能混过去就行。

他们还真的差点混过去！第二天被押解到福建上杭，关押在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审讯中，白军相信了他们的口供，要他们找到保人后就可释放。瞿秋白托人到上海找鲁迅担保，就是这期间，他们差一点点即能获得自由的时刻，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倒底是谁出卖了瞿秋白呢？根据掌握的确切材料看，是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在被捕后供出，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在福建濯田抓获的20余名红军战士，是掩护瞿秋白转移的部队，这些被抓的人中间很可能有瞿秋白。

敌人轻而易举地就辨认出谁是瞿秋白。“怎么会认不出呢？瞿秋白长得文绉绉的，说话软绵绵的，一副新科状元的样子，一下子就能看出他不是一般人……”周月林用低缓的语调回述着这刻骨铭心的沉痛往事。从此，她在国民党监狱蹲了10年……1955年周月林又为瞿秋白被俘牺牲一案被人民政府关押审查，后被判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平反。1996年2月的一天，我们在新昌县城的棋盘新村再一次拜访了这位传奇老人。夕阳下，周月林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她把我们带到她那朴实无华的居室里，我们看到新昌县委党史办在祝贺周老九十华诞时敬写的一副对联：

九十老人多福多寿多贡献
五洲女将愈老愈坚愈精神

（责任编辑 刘家驹）

1966年5月15日,在台北湖底路的士林官邸,蒋介石亲笔为一位俄罗斯女子题写鎏金匾额,以纪念她的50岁生日:

贤良慈孝

——芳娘贤媳五十生日纪念

中正题

这位被称为“芳娘”的女人,就是蒋经国的结发夫人。

1933年的早春二月,西伯利亚还是一派冰封奇寒。在一个名叫塔哈的小火车站附近的雪野上,一位17岁的俄罗斯少女芬娜·伊帕季耶娃·瓦赫洛娃,鬼使神差地救助了一位冻昏的中国青年。这个自称“尼古拉”的人,原来是从莫斯科因肃反而被清理到西伯利亚“劳改”的负罪者。一年之后,她与这位负罪者再次重逢在距此不远的乌拉尔机械厂,患难中萌生的爱情导致了她一生的走向——和异国落魄青年蒋经国的结合。

芬娜与蒋经国有一段幸福而甜蜜的婚后生活。在芬娜的支持下,蒋经国升任了乌拉尔机械厂的副厂长,纯真的爱情结出了果实,一年后,儿子爱伦降生了。

然而好景不长。芬娜嫁给蒋经国不久,就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是1936年冬,蒋经国在当时驻在莫斯科的中共负责人王明的施压下,在《真理报》上发表与蒋介石决裂的公开信;第二件是1937年春,王明以蒋经国是托洛茨基忠实追随者为口实,取消了他候补党员资格,同时也下令撤销了其乌拉尔厂副厂长的职务。蒋经国在这种困境中只好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回国。

1937年3月的一个风雪之夜,国民党驻苏大使馆里灯火辉煌。在记者们的镁光灯下,蒋廷黻大使左手挽着芬娜,右手挽着蒋经国,来到人头攒动的宴会大厅,他当众说:“祝贺你们,明天就可以回国了!”

芬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

芬娜走进蒋介石家门

● 袁应泰



蒋方良青年时代

在蒋氏的故里——浙江奉化的溪口小镇,她遵从公公蒋介石之命,依照中国习惯,凤冠霞帔,重新补办婚礼。公公还为这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少女更名蒋方良。

1949年农历3月27日,蒋方良带着孝文(爱伦)、孝章、孝武和孝勇,从奉化飞向台湾。

蒋方良虽然嫁到蒋家后从不过问政治,可是她从蒋经国的话里已经猜测到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在离开溪口镇之前,她随蒋氏父子前往蒋母陵墓上祭扫,蒋介石见她习惯了下跪磕头这一套拜祭的礼仪时,情不自禁地对她大加赞叹。就在这天夜里,蒋方良下灶烹烧的一碟碟家乡菜端上桌时,公公掩饰不住兴奋地当场夸奖,这使蒋方良愉悦不已。她来到中国12年了,她与公公、婆婆同席共餐的机会屈指可数。当初她也极想处处取悦于公公,可是蒋介石对她这个俄罗斯血统女子的反感厌恶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曾对她出身微寒而冷眼视之,也曾无数次因她不通中国语言与大家族礼仪而拍案震怒。但是,蒋方良很快就以她的聪颖智慧,在溪口镇上潜心学会了国语(宁波话),而且也通晓了中国最大家庭内的繁冗礼节,这一切不能不让蒋介石为之刮目相看。

当然,真正让蒋介石扭转印象的,还是蒋经国在江西赣州与章亚若的婚外艳闻闹得满城风雨之时,蒋方良非但没有寻她的公婆大闹,反而以她善良的心胸去感化陷入婚外恋苦恼的蒋经国。蒋介石因此欣赏这位俄国儿媳的美德。

在台北长安东路18号的官邸里,蒋方良熬过了最初的艰难时日。因为出生在苏联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蒋方良,她习惯了风雪漫天的严寒环境,却无法忍耐台湾岛上的高温酷热和连绵不断的阴雨。其时,蒋方良最难忍受的倒是丈夫对她越来越多的限制与束缚。

1937年，蒋方良
与蒋经国在奉化
丰镇房举办第二
次婚礼



1966年，蒋介石为蒋方良
50岁生日题辞手迹



她曾随丈夫转辗重庆、上海和杭州，精力旺盛的年代她一直没有机会到外边去工作，她到台湾以后，虽多次向丈夫请求外出工作，但都被蒋经国以种种理由加以婉拒。后来由于宋美龄的从中干涉，蒋方良才担任了台湾陆海空“三军幼稚园”的董事长和“妇联会”的委员。在最初的几年，蒋方良也能像其他国民党要夫人那样，社会上做些抛头露面的事。但是，由于蒋经国地位不断上升，他越来越看不惯继母宋美龄这个女强人，在蒋介石执政之时干预军政的行为。出于这种忧虑与担心，蒋经国在60年代后开始有意识地限制蒋方良的社会活动，他在官邸里研讨的所有军政事宜，严格限制蒋方良的过问与插手。

蒋方良在长安东路居住期间，

她将最大的乐趣集中在与佣人养鸡和养鸭上。她最大的自由，就是在入夜时带着子女们去附近的街上去逛商场，品尝台北的风味小吃。

她万没有想到这种表面平静的生活里却孕育了危机。1951年，从前极少看戏的蒋经国时常出入台北的长安戏院。他几乎是风雨无阻地去为那位从上海来的京戏坤伶捧场，有一段时间蒋经国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痴迷地步。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传播着蒋经国与那位女伶坠入情网的种种艳闻。这对于蒋方良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打击与挑战。因为这是丈夫继江西赣州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情之后，又一次移情别恋。面对这严峻局面，善良的蒋方良依然还像当年在江西赣州时一样，泰然处之，自认为与她在苏俄有

着患难深情的丈夫决不会恩断义绝。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蒋经国与那位名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暧昧。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公公出面干预了。蒋介石在儿子面前拍案大骂：“当年我离婚又再婚，那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如今你想和那个女戏子结婚莫非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吗？……”

蒋经国唯唯无以对。

事隔数十年后，据知情者说，蒋介石当年所以严厉拒绝蒋经国另寻新欢，除了台湾媒体的舆论压力之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位俄罗斯儿媳贤良慈孝的美德在公公心目中的地位牢固，方使她在接连两次“第三者”挑战中得以化险为夷。

蒋方良自60年代末随丈夫迁

进台北大直地区的七海官邸以后，这里警卫森严，她本来性格内向，由于长期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变得更加忧郁。此时的蒋方良俨然已是丈夫为终身依托的东方传统女性了。她与丈夫之间几乎无话可以交谈，因为她被多次告诫不要干预“政务”，只能是一些少得可怜的问候之类。她整天抑郁而呆痴，有时她独自一坐半天，在她面前有人经过，她也视而不见。到后来，她开始到卧室里翻箱倒柜，甚至将她所喜欢的中国旗袍丢得楼上楼下满地全是。与蒋方良这种可怕的忧郁症相伴而来的，是她晚年患上了心脏病。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病与世长辞。在蒋方良坐轮椅前往圆山脚下的“忠烈祠”灵堂，为丈夫守灵的日子里，著名美籍华人、女作家陈香梅曾给蒋方良写了一封长信。蒋方良读到这封信时不禁苦泪潸然，因为陈香梅说出了她内心的苦痛。

陈香梅写道：“我和你相知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十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对你都有无限的同情。也附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求你的丈夫，你离开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庭执政等事过于执著，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

“如今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落寞……当50年代和60年代民航公司尚在台湾作业时，民航公司有几位机长的太太是从东北来的俄国沙皇时代的遗族，她们会说俄语，她们也是你小圈中的朋友。她们常常提到你，说你有自由而不自由，因为你的

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50年没有再重踏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50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1993年10月的一天，当一架“华航”客机从美国旧金山飞越大洋，终于在台北桃园机场缓缓降落的时候，人们发现在那些通过自动扶梯流向候机大厅的旅客中间，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妪，她就是两个月前去美国探望女儿蒋孝章归来的蒋方良。

随着蒋经国的去世，她自由了，可七海官邸贵客盈门的繁华景象也像梦幻一般地随之消失了。从前在这里担任警卫的大批士兵奉命调离，只留给她寥寥可数的侍卫和女佣。使蒋方良更感忧虑的是官邸开支日益拮据。从前丈夫在世时每月将固定的薪俸交给她，蒋方良负责统筹。即使这样，那时官邸的开支也不宽裕，丈夫生前每月的俸额5.76万台币，他死后按规定可领20个月的俸额，共计115.2万元。蒋方良就依靠这些钱度日，此外还要靠儿子蒋孝勇的资助。正因为如此，蒋方良虽有到美国去散散心的意愿，但一直无法成行。因此事，台湾的一些报刊还以《蒋方良闹穷的玄机》为题，对这位可怜的俄罗斯老太太进行种种非议。蒋方良听了不禁独自悲叹：“太欺负人了，连那些记者也欺负我，我是确实没有一笔出国旅行的费用啊！”

后来，蒋经国生前提拔的台湾上层要员们看不下去了，方才为蒋方良的美国之行筹款。在蒋方良启程前，郝柏村、俞国华等人还亲自设宴为她饯行，期望她能在美国多住些时日，或者希望她也像宋美龄那样留在美国颐养天年。可是蒋方良却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归了。当她

由儿媳徐乃锦等陪着回到地处大直的那所空荡荡的七海官邸里时，蒋方良感叹地说：“美国再好，终究不是我的家呀！我的家在中国……只有回到这所院子里，我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呀！……”

“李祖怡怎么不见了？”蒋方良的晚年令她心中不快的事情很多，其中有一件就是侍卫李祖怡的突然调走。她从美国回到台湾不久，就意外地发现跟随她19年的侍卫官李祖怡居然神秘地从她身边消失了。佣仆们不便告之李祖怡离去的内幕，只是说李奉命调往情报局，是高升了。平时李祖怡与蒋方良最为亲近，现在竟然不通知她就调走了，蒋方良为此十分伤心，直到后来蒋方良了解到李祖怡被调走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李祖怡答应了“华视”《追追追》电视节目，来官邸里拍摄了许多蒋家珍贵的历史照片，被她的小儿子蒋孝勇得知并勃然大怒，才被轰撵出去的。蒋方良她觉得七海官邸与她从前很听话的蒋孝勇一样，突然变得陌生了。

1994年元旦刚过不久，台湾《中国时报》忽然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蒋方良严重中风送院观察》。这是她自丈夫死后最重的一次病，虽然这几年她一直多灾多病，但是这样兴师动众地住进荣民总医院来抢救，还是第一次。1988年也是冬天，蒋方良生了一次较为严重的心脏病，她在七海官邸的住地接受以姜必宁为首医疗小组的治疗。那时，她虽然已经知道大口咯血的蒋经国已危在旦夕，就在与她一墙之隔的房间里接受抢救，可是她无法过去守候。只能听任医生的叮嘱，带着氧气罩来稳定心脏。以致当蒋经国的死亡传来，她只能伏在床上饮泣，却不能在丈夫的遗嘱上签字。这一次中风莫非真的要追随亡夫而去吗？

但是奇迹却在这位瘦削的俄罗斯老妇人身上发生了。经过荣民总

医院医生日夜急救,至8日晨她已完全脱险,蒋方良在神态清醒时潸然垂泪,她成为蒋氏未亡人后,厄运、孤独与寂寞对她来说已司空见惯,她深感沉痛的是,蒋氏家族接连而至的不幸,无情地向这位孱弱的老妇人袭来。蒋经国去世不久,已经在阳明山别墅的病榻上缠绵二十余载的长子蒋孝文,1989年秋天突然被诊断为喉癌。蒋方良十分钟爱这个生于西伯利亚、当年她与蒋经国患难中的爱情结晶爱伦。当蒋方良已知爱伦所患为不治之症后,多少回梦里哭醒。当年仅54岁的蒋孝文在荣总医院病逝的噩耗传来时,蒋方良当时就哭昏了。

如果说蒋孝文的死已在意料之中,那么次子蒋孝武的猝然死亡,对于风烛残年的蒋方良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本来蒋孝武的身体一直很好,只不过在中年以后发现他患有蒋家遗传性的糖尿病。蒋方良在初时认为此病还不至于危及性命,那时,次子蒋孝武一直在新加坡任商务代表。1991年6月,蒋孝武总算可以调回台北,来接受他垂涎已久的“广播电视公司董事长”一职。可是就在7月1日凌晨——蒋孝武就职仪式的前一日,他突然被医生发现神秘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虽然蒋孝武死得有些奇怪和突然,又曾激起台湾舆论的轩然大波。医生在事后还是做出蒋孝武生前长期患有糖尿病、慢性胰脏炎和高血脂病,系因急性心脏衰竭而猝死的权威诊断。蒋方良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悲痛已极,却又欲哭无泪。

蒋方良身边的人都为这位俄罗斯老妪居然以超人的坚毅,挺得住人生的风刀霜剑袭击而颇感惊奇。

耄耋之年的蒋方良尽管晚景悲凉,但是她心头也有值得欣慰的快事。那就是老人已是孙辈绕膝,并且都能不依赖蒋家的荫庇而得以自立。特别是蒋孝武的儿子蒋友松,更为听从蒋方良的训导。1991年7

月7日,当蒋孝武病故一周年时,刚满18岁孙儿友松在接受台湾记者的采访时,曾经道出了蒋方良女士所关照呵护下的蒋家第四代人的心声:“从商不从政!”

在七海官邸里饱览了世态炎凉、蒋门兴衰的蒋方良,极力劝导自己的孙儿孙女们远离尔虞我诈的台湾政坛。她长子孝文的独生女儿蒋友梅,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伦敦的渣打银行,本来有一份很安适优越的工作,后来她在祖母与母亲徐乃锦的影响下,舍弃工作而重进剑桥,攻读她所酷爱的艺术系。此外,蒋方良的女儿孝章的儿子俞祖声、蒋孝勇的两个儿子友柏和友常,也均在“从商不从政”的思想启迪下,在美国潜心钻研学业。这一切均使在台北旧官邸中的蒋方良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4年9月18日,多年来深居简出的蒋方良,由儿媳徐乃锦、方智怡陪同,乘车来到她许久不登门的士林官邸,拜见刚从美国回到台北探望孔令伟病情的婆婆宋美龄。这次士林官邸的相逢,是宋美龄、蒋方良婆媳间分别数十年后难得的一次见面。令宋美龄惊讶的是,蒋方良比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她告别台北赴美时显得更加憔悴苍老。蒋方良在这位严厉的婆母面前,依旧保持着从前惯有的谨小慎微,毕恭毕敬。她向宋美龄问候起居后便没有更多的话,而宋美龄却对蒋方良哀叹:“我历来主张女人要强,可是你却老是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经国已经不在了,你为什么还要那样束缚和禁锢自己呢?”

蒋方良温顺地笑答:“我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信您的话,这些年来我也时常到外面去看看。主要是到人不多、风景可看的地方去走走。前些时我和乃锦还去游了翡翠水库,又接受了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邀请,去那里观看国宝。此外,我还去过三芝乡观赏陶瓷艺术家孙

超先生的彩墨结晶釉。总之,我过得很好,我已经习惯了……”

这就是蒋方良的自白。

台湾报纸在报道蒋方良拜会宋美龄时如是评说:

“宋美龄在9月19日返美的前一天,与蒋方良在士林官邸见了一面。对生活在不同世界里,而甚少往来的两位蒋夫人来说,这次的会面绝对是难得的历史镜头……平时,蒋方良从来不到士林官邸……蒋方良是家庭妇女,不涉政事,宋美龄则如‘末代皇后’,宋美龄欣赏跟她一样有能力独当一面的女强人。宋美龄在蒋方良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她自己的影子。不过由于宋十分洋派,她对方良倒尚能包容,另外因方良的和善,使得两位蒋夫人不亲,却未见不睦。这一次蒋方良在宋美龄回美国之前,赶去和她见一面,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意义,这意味着在逐渐凋零的蒋家,枯枝紧紧缠绕,就像蒋孝勇在宋美龄返台的这些日子,总是搀扶着她一般……”

蒋方良的暮年几乎没有任何寄托。她每年矢志不忘的一件事就是——1月13日那一天,她必要携在太子儿媳妇驱车前往桃园县大溪镇,祭拜暂厝在那里的蒋经国亡灵。虽然在蒋方良与蒋经国长达50年的夫妻生活中,她的丈夫曾经有过两次背叛甚至企图抛弃她,但是痴情如铁的蒋方良似乎在心中永远牢记着她们在苏联的患难与日后数十年的风雨深情。

蒋方良到大溪头寮祭祀丈夫历年如此,从不间断。只有1994年的1月13日,经过医生和子女的苦劝,蒋方良终因卧病在床而难以成行。最后达成妥协,由她刚从加拿大赶回来的三子蒋孝勇代为前往头寮扫墓。蒋方良在病榻上,思绪却已飞到大溪陵寝那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里,飞往由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灵台旁……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骇人听闻： 40万女性沦为 日军的性奴隶

——撕开日本军妓
制度的秘幕

● 苏智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但在这场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逆流却持续不断。每年的8月15日即日本的“战败日”，靖国神社便会上演为东条英机等战犯鸣冤叫屈的丑剧。近年来，日本的政界要人一面重弹对战争感到“歉意与悔恨”的旧调，一面却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迹象不能不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

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包括令人发指的慰安妇问题。慰安妇问题经新闻媒介曝光后，世界各国瞩目，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强逼女性充当日本兵性奴隶的军妓制度，是日军在中国创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军妓所也是在上海设立的；在1932—1945年间，至少有10万中国女性被迫充当军妓。

一、“一·二八”事变后 日军创立军妓制度

1918年，新生的苏俄红军斗志昂扬地解放了西伯利亚。当时的日本为阻止苏军的东进，



日军慰安所

派二十多万主力进攻淞沪。为了解决日军官兵的性问题,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决定从后方征召慰安妇。为此,司令松井石根于1937年末要求朝鲜总督及日本关西各县政府征募慰安妇。

1938年1月2日,运送第一批慰安妇的“海运丸”到达上海,这104名朝鲜和日本女子被检查后被送到军工路侧的日军军营。日军第十四兵站决定设立“杨家宅娱乐所”。这个1月13日开业的慰安所,门口挂着太阳旗,接待室内贴有日军制定的条例,规定陆军官兵须持有“慰安所外出证”才可入内,每张票为二日元,入室后将票交给慰安妇,开放的时间,士兵为上午10时到下午5时,军官则可延长到晚上9时等。

为了避免官兵染上性病,娱乐所给每个人分发避孕套。日军军部早已将避孕套列入军用紧急物资而大量运往前线,而且还要求所有慰安妇必须能熟练使用,如拒绝使用而染上性病,将严惩不贷。

据笔者考证,这个“杨家宅娱乐所”是战时日军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其地点并不在杨家宅,而是在杨家宅北侧的东沈家宅。据当地老人的回忆,这个军妓院一直开到战争快结束,日军战败时,才将这些房屋烧毁了。

三、悲惨的慰安妇们

日军轻蔑地称慰安妇为“P”,“P”是英文妓女 prostitute 的第一个字母。

从慰安妇的国籍来看,主要是日本、朝鲜和中国,这三国的慰安妇尽管均遭受着日军的奴役,但其程度仍有所不同。



日军慰安所规定

迅速出兵中国东北,以扩大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这样在三年之间,共有7个师团的日军精锐占据东北。由于日军军纪败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遂引起性病流行,因性病而减员者竟达一个师团的人数。自此以后,日军高层便考虑确立一种新的制度以解决性问题,防止因性病流行而减弱战斗力。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又策动了上海“一·二八”事变,一时,日海军陆战队云集上海,陆军也频频登陆。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为了防止日军因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而影响国际声誉及战斗力,便致电长崎县知事代征妓女等,组织慰安妇团,然后运至上海,在虹口一带设立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慰安所。于是日军有了白天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晚上入慰安所卧美人膝的景象,尽管如此,但由于慰安妇太少,强奸案仍时有发生,性病也在蔓延。停战以后,日军陆续回国,但慰安所并未全部关闭,根据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调查,到1932年底,海军的慰安所仍有17家之多。

这位创立慰安制度的冈村宁次,后升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战后他承认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二、战时日军的第一个军妓所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陆续增

来中国的日籍慰安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应召的妓女,从日本国内招募妓女充任慰安妇,是战争初期日军的既定政策,因此,可以说妓女是早期慰安妇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慰安妇的需要量急速增加,日本国内有限的妓女资源便渐渐枯竭。第二类是在军国主义的宣传下,受骗而为慰安妇的。第三类是家境较为贫困的,迫于生计而让女儿暂时受苦。

来自殖民地的朝鲜或日本的朝鲜族女子,除部分人是因家境贫困而被迫卖淫外,绝大多数是被日本人抢掠强征来的。据对现在在韩国的38位原慰安妇的调查,她们全部是因为被诱拐欺骗或作为从事抗日活动的处罚而被迫沦为慰安妇的。比起日籍慰安妇,她们的遭遇更凄惨。例如在上海“杨家宅陆军娱乐所”的80名朝鲜人中,70%是处女,像17岁的李金花、李必连和嘉穗等,每日遭受野蛮的摧残,坠入万劫不回的深渊。在中国各地的日军部队里,有数万名朝鲜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不少人客死异乡。

与日籍、朝鲜人慰安妇相比,中国慰安妇的命运则更为痛苦,更加不幸。自日军入侵中国

后,便开始掳掠本地妇女为慰安妇。宋美龄在战时曾撰文指出,日军占领上海后,便把掳掠来的中国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以供兽军奸淫。日军突入南京后,捕捉了大批“花姑娘”运到上海“皇军娱乐部”,即慰安所,她们最后均被虐待而死。

根据笔者的调查与研究,抗战期间,中国妇女受日军强迫而沦为慰安妇的不会少于10万人。鉴于侵华日军的凶残,以及肆无忌惮地设置慰安所,这一数字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夸张的。

时至今日,慰安妇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1995年7月,联合国官员专程赴亚洲,听取前慰安妇的血泪控诉。1996年8月23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彻底解决慰安妇问题。同年7月19日,中国慰安妇首次在日本出庭作证,69岁的刘面焕、68岁的李秀梅老人血泪控诉日军的暴行,并提出日本政府赔偿2000万日元的要求。现在,能否妥善解决慰安妇问题,已成为日本政府认识战争罪行,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关键点,人们将拭目以待。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责任编辑:杜 晋)



日军慰安所

长征途中红军将领的坐骑

● 于 东

万水千山的长征路上,红军将领们的坐骑驮着长征、驮着中国革命前进在雪山草地,这些“无言的朋友”,个个都有说不尽的感人故事。

一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后,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的岩盐,一罐罐来自资阳、邛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阿坝草原的酥油糌粑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塞到正处在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时,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一天,中央机关秘书长刘奇打电话给红四方面军负责后勤供应工作的余洪远,要他急需再办两件事:一是给中央机关再送点酥油、骡马和毛驴,因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人喜欢骑毛驴;二是特别提出要给毛泽东选一匹温顺的驮马和一位有文化的男护士。

余洪远向徐向前汇报后,徐向前亲自谋划这些事,指示余洪远要想尽千方百计办好。

第二天,余洪远就选送去了酥油、骡马和七头毛驴。毛驴都是买的土司家的挂红彩、吊铃铛的好毛驴。几位老人都很满意,徐特立还舍不得骑,只用它驮东西,自己穿着草鞋拄着木棍在后面走。因当时难以找到好马,余洪远便把自己的骑

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要的男护士,因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中的护士大多是女的,且识字不多,余洪远只好让自己身边工作的符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条件的医生孙玉华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对此很满意。

朱德也接受了红九军政委陈海松送的大青马,中央红军许多将领也都有了新的坐骑。

聂荣臻在懋功与李先念会面后,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了一番。

“你的牲口呢?”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坐骑,关心地问道。

“原来有一匹茶褐色的大骡子,前几天推到河里去了。”

聂荣臻的警卫员忙解释说:“几天前在灵关过铁索桥时,政委那匹骡子的一只蹄子陷到桥板缝里,怎么也弄不出来,大部队又正在过桥,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政委命令我们把骡子的那腿砍断,推下了河。”

半个小时后,李先念把一匹膘肥体壮的大青骡子送到了聂荣臻的住处。

会师后邓小平遇到了与他在法国一同勤工俭学和一起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高兴地招呼邓小平:“老同学,你需要什么就吭声。”

邓小平诙谐地说:“我人矮腿短,行军总是吃亏,别人走一步,我要赶两步。要是可能的话,你还是

给我一匹马吧。”

“好,好。”傅钟慷慨应允。

邓小平在后来谈起长征时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真是顶了大事呀!”

二

送大青马给朱德的陈海松,这位时年仅21岁的红九军政委,对革命有着满腔热忱和忠心。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他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朱德原有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的坐骑送给了朱德。

本来,送坐骑和驮马给中央红军,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是件很普遍的事,可就单陈海松送马给朱德这件事连锁引出许多怪事。原来该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一直在嫉妒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的谢富治比陈海松大五岁,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但他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也低一点。为此,谢富治多次在张国焘面前诋毁陈海松,想取而代之。过去张国焘对谢富治的“反映情况”并不在意,知道谢富治别有用心,可这送马的事非同小可,觉得应该对陈海松“教训”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的一步步成长,是我看着你才到今天这个样的。你的军政委正好有人想干呢!”张国焘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

了“大树”。

陈海松猜知又是谢富治告了黑状，回到军部后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谢富治的冷嘲热讽和军领导的围攻，使陈海松有口也难辩。陈海松正年轻气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怎能经得住如此上压下拱，最后竟私下决定采取偷回大青马的方法来平息这场风波。

处事犹如孩童的陈海松让警卫员偷回了大青马，暂时放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国焘过目，表示自己对他的尊重和服从。

可这个头脑简单的陈海松是在情急慌乱中办了一件大傻事，没过半天他就后悔莫及。恰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他还没与朱德打招呼，脸就红了。朱德在这时却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盗马人会是大青马原来的主人，因此，他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真可惜呀！”

“大青马……”从来就不会撒谎的陈海松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了几下口，终于大着胆子说出：“总司令，实在对不起的是我们。你的大青马，我查清楚了，是我们军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让他们牵回来。”

朱德一听乐了：“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过几天再给我也可以。”

“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胆子太小。为了讨好张国焘，谢富治在再次告状后，干脆决定把大青马杀掉。

大青马在阿坝丢失被杀，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其详细经过和主事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当年在阿坝的当事者仍没有一个人

承认此事是自己所为。只是有人传说是谢富治指使红九军交通队的人把大青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后，杀了吃肉；有人则说是张国焘亲手所杀；也有人说是其他人所干，如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备科负责人李明在1982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总部已到达噶曲河两岸。一天晚上在宿营地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交通队化装成藏民偷杀朱总司令的坐骑的事件。当时只见一伙藏民装束的人骑着马向总司令部驻地冲来，打了一阵子枪就跑了。当时，我以为真是藏民来袭击。但随后一查，什么东西都未少，单单丢了朱总司令的马。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带着人去查找朱总司令的马。结果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了那匹马的马皮……”

但据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治部交通队长兼保卫队长姚保明后来的回忆，又说明朱德的坐骑被抢是事实，但并非张国焘主谋，张国焘是背了这个黑锅的。

朱德的战马是被抢了，朱德在阿坝之后只好换乘一匹骡子。可就在不久，在张国焘的煽动下，阿坝接着发生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一群伤病员起哄，要拉走朱德的骡子的事，当时在总司令部一局三科工作的周立范回忆道：

“一天上午，一群红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地喊着拥护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饲养班，在马厩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骡子。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朱总司令让一个同志来到马厩，对那些伤病员说：‘朱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骡子就给你们骑吧！’说来奇怪，原来吵吵嚷嚷的一群伤病员，听了这些话后都不再闹了，窃窃私语地

商量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默默地走开了。”

朱德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征服了所有在场的人。“骡子事件”平息了。

三

草地岁月，是红军长征中一段最为艰苦的历程。红军指战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粮后可挖野菜吃，走在后面的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殿后，他眼见到战士们一个个因饥饿而昏倒在地，他把目光盯向了自己的坐骑大黑骡子。这匹自从江西就跟随彭德怀走向长征路的黑骡子，一路上又驮伤病员，又驮粮食和器材，每天它的背上堆得像座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抚摸着黑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没有。”说着，把自己的干粮分出一块，悄悄地塞进黑骡子的嘴里，深情地看着骡子吃完。

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决定杀坐骑解决燃眉之急，他把饲养员喊了来，问道：“总共还有几头牲口？”

“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老饲养员不解地回答。

“好，全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彭德怀的话一出口就是命令。

“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啦！”老饲养员着急了。几个警卫员听说后也急忙围拢过来，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可不能杀啊！”

彭德怀深情地望着拴在不远处的大黑骡子，平静地对警卫员们说：“部队现在连野菜都吃不上了，只有杀牲口，赶快解决吃的，我们或许能多些人走出草地。”

老饲养员掉着眼泪对彭德怀说：“可是你怎么走出草地？别的可以杀，大黑骡子一定要留下，它为革命立过功。”

彭德怀拍着老饲养员的肩膀说：“你们能走，我也能走。雪山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草地又算得了什么！大黑骡子是为革命立了功，这次就让它最后立一次大功吧！”

“还是把大黑骡子留下吧！”大家仍在请求。

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对身边的警卫员命令道：“邱南辉，传我的命令，让方副官长负责杀骡子！”

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老饲养员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在轻轻絮语：“大黑骡子呀，大黑骡子，委屈你

了，你为革命立大功吧！”

彭德怀背过脸去。

枪声没有响，谁也不愿意开枪。

10分钟过去了，没有人下得了那个狠心。6匹牲口都好像预感到什么，集体嘶叫了数声，又都默默地低下高昂的头。

20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快开枪！你不向它们开枪，我就要向你开枪！”彭德怀双手叉在腰间怒吼着。

手提机枪的方副官长把大黑骡子向远处牵了牵，枪口对准6匹牲

口，大家都闭上了眼睛。

枪声响了。彭德怀转过身，缓缓摘下军帽，向着斜倒下的大黑骡子。

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些生机。彭德怀推开警卫员端来的一碗肉汤，发火道：“我吃不下，端开！”

漫漫征途，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背影，它化入北进的滚滚铁流，融进了宣传鼓动员的竹板声，合奏出红军指战员行进步伐的节拍来：“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了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

(责任编辑 刘文)

○ 广 告 ○

中华儿女

中国人物传记的权威刊物

《中华儿女》杂志贴近党的基本路线而不生硬僵化；贴近历史的真实，而不违反纪律；贴近群众，而不媚俗；贴近生活，而不迎合低级趣味；贴近人性，而不丧失党性原则。

《中华儿女》国内版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县以上五大机关领导，中央、国家机关正局以上干部人手一册；《中华儿女》海外版走上香港书摊，在海外华人中发行。

百分之百纪实作品

百分之百独家文章

欢迎订阅 1997 年《中华儿女》

《中华儿女》由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集名家手笔，“独家首发”深层次高品味揭示当代伟人、名人和各界百姓的人生际遇、情感波澜、成功奥秘。

地址：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10 号楼中华儿女杂志社发行部。邮编：100051。电话：(010)67012288—2419

中华儿女

国内版

国际流行大 16 开本，96 页，彩封胶印，文字生动可读，照片独具魅力，零售价 6 元，订阅价 5.5 元，全年订价 66 元，可以破季订阅。

邮发代号：82—349

中华儿女

海外版

国际流行大 16 开本，80 页，彩色精美印刷，中文繁体字，内容与国内版不同，零售价 12 元，订阅价 10 元，全年订价 120 元，可以破季订阅。

邮发代号：82—63

纵横

月刊

纵呈社会百态史林独树一帜
纵横百年史事亲历见闻

曾被评为全国最佳期刊
被列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

《纵横》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每月 15 日在京出版，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1997 年每期定价 3.80 元，全年 45.60 元。订阅《纵横》，您将拥有一部更全面的中国近现代史。

杨廷宝： 中国现代建 筑的创始人

● 孙宅巍



杨廷宝教授遗像

长期致力于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工作的杨廷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建筑学系主任、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等职。他是我国近代建筑设计科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曾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规划，人民英雄纪念碑和1958年北京十大工程方案设计，主持设计北京和平宾馆，主持和参加南京长江大桥、江苏省体育馆、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重大工程设计。

1982年12月13日，杨廷宝先生因病逝世于南京，终年82岁。他的墓地就在距离他指导设计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和主持设计的雨花台红领巾广场不远的望江矶。一代建魂，安息雨花，人们将不会忘记他在事业上作出的丰厚贡献。

一

建筑设计离不开绘画。

杨廷宝早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他勤奋好学的品格，深得美籍教师司达尔女士的喜爱。

1921年，杨廷宝自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前夕，他怀着对母校和师友无限眷恋的深情，画出了一组“清华八景”的钢笔画，这些景物，在他的笔下，无不惟妙惟肖、精练严谨。后来这八幅画都成为珍贵的艺术资料。

杨廷宝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并在这些画上记上日期。这便是他的画“日记”。他的水彩画“日记”有二三百幅，速写“日记”则有百余本。这些特殊的“日记本”既是他生活中的见闻录，更是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勤奋追求的光辉记录。

1954年春的一天，他同梁思成、吴良镛、汪季琦等著名建筑专家来到北京东安市场的西餐厅。只见他坐下后，顾不得品尝满桌的菜肴、点心，也顾不得与同行友人斟酒共叙，而是首先掏出随身携带的卷尺和小本本，认真地量记了餐桌与座椅之间的尺寸。他觉得今天在这里入座后，桌、椅间的距离使人感到特别舒服，于是便细心地连记带画录下了这些数据。

他信手画出的草图，竟能与用比例尺绘制的图稿相差无几，同行们都信服地称他为“神手”。

二

杨廷宝早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不耻下问

的良好习惯。1932年,他接受了修缮北平市古建筑的任务。他深知,这项任务的责任重大,而自己又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于是,他便邀约了老木工侯良臣、老画工郭松泉等人,到东来顺羊肉馆去,边与他们同桌共饮,边向他们请教。如“柱高一丈、出檐三尺”,“方五斜七”,“修旧如旧”等口诀,就是经常同工人师傅一起总结出来的经验。

杨廷宝贡献给纪念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由他主持指导设计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塔。1961年夏天,当花岗石贴面贴到塔身30米高度时,突然发现塔身往东北方向微微倾斜。如果继续按原图纸施工,倾斜的程度将更为加剧。一时间,主张炸掉重建的意见占了上风。杨廷宝心想:工程已经花费了200多万元的巨资,国家又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决不能轻易浪费了人民的血汗;于是他向建塔的工人请教,磋商各种补救措施。终于,他拿出了新的补救方案:将塔肩下的平直部分修改掉,突出回纹线,使之与塔顶相连,像是给纪念塔加戴了一顶端庄的桂冠。修改后的设计,不仅挽救了微斜的塔身,而且比原设计方案更为壮观和富有立体感。

他在指导新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设计的过程中,那是1978年的夏天,他竟每天仅穿一件白纱背心,大汗淋漓地伏在图板上画图。他那以古稀之年所完成的图纸中,比例匀称的造型,丰富得体的细部装饰和精美流畅的铅笔线条,更使人惊叹不止。

三

杨廷宝自1940年到重庆中央大学担任建筑系教授起,开始了一生中40年的教学生涯。他先后开设过建筑设计、素描水彩、外国建筑史、设计初步等项课程。在他的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教诲下,培育出了大批建筑界的栋梁之材。在他们当中,有中央部长、大学校长、有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总建筑师、总工程师等。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杨廷宝作为一名老前辈的建筑专家,特别注意把中青年人才推到第一线,让他们多挑担

子,多承担责任。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淮安县邀请杨廷宝和其他的建筑专家,共商建造周总理纪念馆的设计方案。当大家请杨廷宝谈谈自己对设计方案的意见时,他没有立即发言,而是让他的学生、40岁的鲍家声先谈,而杨廷宝则在要害处,作些补充,画龙点睛。鲍家声的意见,受到了与会同志的重视。很快,鲍家声就在杨廷宝的支持下,拿出了纪念馆的设计方案。

1979年,杨廷宝在主持设计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时,从众多的设计方案中,选中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一位女同志陈宗钦的设计图。他认为这幅设计图,既具有鲜明的中国古建筑色彩,又不失现代建筑的风貌,但是却过于刻板。于是,他以这幅设计图为基础,加上自己的设想,指导陈宗钦画了新的方案草图。杨廷宝还亲自为它画出了水彩渲染画。如今,那矗立在红领巾广场的花岗石结构、牌楼式的少先队礼台,成了杨廷宝精心培育年轻一代的历史见证。

四

杨廷宝进行建筑设计的最大特点、最大长处,是因地制宜。他博采各家之长,兼容并蓄,勇于创新,强调符合国情,讲究实用、经济与美观大方。

1951年,杨廷宝主持设计了北京的第一座高层建筑——和平宾馆。按设计要求,这是一座八层楼房的建筑,比当时最高的北京饭店还高出一层。加之,这幢楼又是为了接待即将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更显得责任重大。

宾馆的主楼到底搞成什么式样?不少人主张设计成飞檐翘角的“大屋顶”,以显示中国的民族传统。杨廷宝差不多在20年前,就主持修缮过北京城的古建筑,对这些独具风格的“大屋顶”建筑物,不仅熟悉,而且具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也深知,搞这种建筑,投资太多。他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要办的事情太多了。”

于是,杨廷宝在北京闹市区的众多四合院

居民住宅区中间,因地制宜地设计出了宾馆的方案。它以一种一字形平顶大楼为主楼,补加若干幢排列整齐、别有风味的四合院;主楼底层设有过街门洞。将前后院连结,汽车可由两边胡同交互进出。院内原有的各种古树,都一应保留,与新建的屋舍组成一组组别致的景观。在主楼过街门洞前,就保留了一棵有五层楼高的古树。它的主干位于门右,而伸出的枝叶却覆盖于门顶之上,大有张臂欢迎游客的黄山迎客松之风貌。这种精巧的布局,真可谓“巧夺天工”。

1958年,南京市在扩建中央路的工程设计中,发生了一场争论。一部分同志坚持借扩建的机会,将中央路取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大城市的气派。可是,杨廷宝在这场争论中,却持另一种观点。他在会上说:“设计一条线,落笔值千金。我们建筑师的笔,落得好,就利国利民,省千省万;落不好,就劳民伤财,浪费成千上万。”接着,他又联系中央路的具体情况有理有据提出自己的意见,获得了南京市领导同志的认可。

五

杨廷宝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

时,曾经在美国建筑系大学生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得1块金牌和4块铜牌。那枚金牌,是美国全国大学生比赛的最高奖——美国政府艺术社团奖。

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杨廷宝个人在一系列国际交往中不断获得赞誉,他于1957年9月,在巴黎国际建筑师协会大会上,被推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选举前,这一分配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名额,本来推举的候选人是波兰建筑师学会的国际部长锡尔库斯女士;可是到选举时,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出要进行差额选举,杨廷宝便被推举出来,作为候选人之一。在这一新的情况面前,杨廷宝再一次表现出他那稳健、持重的气质。在他的提议下,商定了如下的原则:中国代表团遵照原协议,仍投波兰代表的票;但如果别的国家坚持选举中国代表,我们也当仁不让。结果,杨廷宝以他在国际建坛的崇高声望而光荣当选,波兰的锡尔库斯女士反而落选了。从此,杨廷宝一连当了两届、8年的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

杨廷宝教授是中国建坛和国际建坛的一代英杰。他的建筑设计思想、风格和业绩,永远在大江南北那众多的凝聚了他的智慧和汗水的建筑物上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 刘文)



南京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古典建筑与现代功能的结合

洋务运动：一个悲怆而沉重的话题

● 徐庆全

1

17、18 世纪，资产阶级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取得了统治，历史进入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的推进，是以野蛮的杀戮、奴役、压榨和剥削为手段的。从非洲的黑人被贩卖为奴、美洲的印第安人濒临灭绝，到廉价的英国商品把印度手工工人置于死地，一切落后民族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对象。当时，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漫长夜里的古老的中国，自然也未能幸免。

1840 年，英国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后，为了推进在中国的贸易，发动了可耻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虽然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国人举起了抵抗外辱的义旗，关天培、葛云飞等爱国壮士血染疆场，三元里人民奋起抵抗。但是，中国落后的大刀、长矛与英国先进的榴弹炮、滑膛枪之间较量的结果，使得清朝皇帝不得不将排除这场有可能颠覆自己统治的危险的希望，寄托在琦善、伊里布和耆英之类的议和使者身上。结果，中国人连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的资格也丧失了。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大炮，不但“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语），而且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经过比较、探索，开始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割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为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他们从如何取法西方的“长技”而达到“制

夷”的目的出发去了解西方。这样的了解，首推 1840 年林则徐主持编译成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英国“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无需人力”；法国“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

林则徐显然是以羡慕的心情来看待西方先进技艺的，这种心情在描述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术的细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四洲志》写道：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自然是对中国落后却又不思学习的反思。后来，林则徐在被遣成伊犁途中，对鸦片战争中因“器不良”、“技不熟”而导致的失败，仍然耿耿于怀，发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的感叹，并因此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则徐不但在广州时就“筹计船炮水军事宜”，而且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现今被认为是中国放眼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对“夷”可师的“长技”有过论述：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还具体建议在虎门外创建造船厂、火器局，聘用西洋工匠，以期“尽得

西洋之长技”，并设想造船厂除造战舰外还可以造轮船，火器厂除造枪炮弹药外还可以制造“借风力、火力、水力”的各种“有益民用”的“西洋器械”。

林则徐和魏源对挫折和屈辱的反思，却在满清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林则徐用粤海关税以制造枪炮的建议，被道光皇帝指斥为“一派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只是被看作一本新的地理书籍，而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核心思想，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封建统治者对侵略者得陇望蜀的本性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昏昏然不思振作，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

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窒息着中华民族生机的历史惰性，又一次遭到了冲击。清政府原以为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侵略者会以“修约”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更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1858年，联军占领天津，逼订《天津条约》；1860年，联军推进到通州，清朝的八旗军“一战而蹶者十之二三，不战而溃者十之六七”，咸丰逃往承德，联军直抵京师，火烧圆明园，逼订《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本来“断难允行”的种种屈辱条款。与此同时，美国以“门户开放”政策而享受“利益均沾”；沙俄趁火打劫，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中国主权的每一个踪迹，在多项条约规定的限度之内，都被一扫而光。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自上古以来由每个中国人的情感力量凝固起来的中国处在世界中心的传统信念，开始坍塌了。

2 在世界文明史上，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免遭夭折而存活几千年的文化，是极少的，即使是繁荣一时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也在公元5世纪惨遭野蛮民族的摧残，几经失传。中国传统文化自孔子奠基以后，绵延发展了几千年，虽有相对落后的民族或冲击或入主（如魏晋以后的十六国，元、清朝等），但都没有使它断流，反而一个个被它同化。

在西方进入极其黑暗的中世纪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在东方放射出耀眼的文明之光，即使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中国明、清之际，中国文化依然令西方人心驰神往。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因而很早就形成了所谓的“夷夏之防”的观念。中国古史上的“夷”，或专指居住中原以东的夷人，或泛指华夏而外的四方异族，都属于贱称，含有尚未蒙被文明教化的意思。明清之际，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称呼范围，也扩大到这些来自远洋的异邦人身上。“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自尊自大的传统观念的作祟，使得连译外国人的名字也带上了浓重的天朝色彩。如，对负责管理英国臣民对华贸易的总监督Lou Laopi，则被译为“律劳卑”，取其“精疲力尽而卑鄙”或“劳苦卑鄙”的意思。这种在现今看来纯属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在当时却折射出了天朝独尊的傲慢意识——“天朝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胜于雷霆，光天之下，谁敢不服！天朝之庇护，普及四海，沐浴恩泽之国，数以万计”。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了（马克思语）。

虚妄荒诞的天朝观念一旦受到嘲弄，“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马克思对此评论说，“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心时务的人开始从存亡的角度认识到：除非以武力为后盾，琦善、伊里布和耆英之类老于世故的外交努力是不足恃的。奕訢承认：“夷祸之烈极矣”，“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李鸿章则忧心忡忡地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冯桂芬则大声疾呼：“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

指者”，如再不发愤图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因此，冯桂芬作《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甚至已提出学西方的具体步骤，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也纷纷主张“讲求洋器”。

至此，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才被这二十多年来的遭遇而搞得惊慌失措的权贵们所认可。

1860年，清政府在北京嘉兴寺设立了抚夷局，处理对外交涉事务。后来，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根据奕訢、桂良、文祥等所上的“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则成”的建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

总理衙门作为一个外交事务部门，不但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大部分事务，而且包办了一切需要同外国发生联系的活动。它实际上成为中央各部的一个综合机构，而且其主持事务之人，往往是由具有实权的王公大臣担任。如，1861—1864年，由道光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主持，1884—1894年，则由另一位王公庆亲王奕劻主持。

在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政府还设置了南洋和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是1866年由五口通商大臣改称，管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南方开放的五个口岸，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沿江及南方各口岸。通商大臣开始时由江苏巡抚兼领，1865年后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北方三口，所以又称三口大臣。开始时由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掌管，1870年起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南北两个通商大臣，名为“通商”，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也是涉及的。也就是说，既办理有关各口岸的通商事物，也办理其他各项对外事务。

关于总理事务衙门与南洋和北洋大臣在洋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左宗棠曾总结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由此可见，总理事务衙门成了凌驾于六部

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而清政府也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自强新政作为既定国策了。所以，研究洋务运动的学者，往往就把总理事务衙门的成立，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了。

3

然而，尽管总理事务衙门已经成立，洋务派也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是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就会像同时代的日本人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在中国这样一个已承受了几千年文化积淀的民族的心理世界中，零散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必须面对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冲击，更何况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还是在压力与耻辱中产生的。因此，尽管洋务派们在表述自己“图强”的观念时是那样地小心翼翼，但还是需要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现今，历史学家把主张学习西方、采取机器生产方式的人称为洋务派，而把反对者称为顽固派。

按当时积极参加洋务的曾纪泽的划分，顽固派们主要是以下三类人：一类是“斫斫自守之士”，这些人虽然也看到了中国在列强竞争中的落后这一事实，并产生了世风浇薄的末世之感，但他们把一切理想的黄金时代放在了上古，相信以“唯古是尊”定能抵销来自西方的冲击。一类人是“好名之士”，这些人既“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便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这类人的势力很大，因为在历史传统深厚的中国，能轻易地找出一千条依据为守旧辩护，而难得找到一条理由为洋务倡言。一类人是投机钻营者，这些人“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

这三类人，虽然是那个时代的落伍者，但当时落后的社会也给予了他们纠举弹劾、呼风唤雨的政治影响。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几乎没有不被他们弹劾过的。在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代奏的编修丁立钧的一份呈文里，周馥、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等人被斥为“谗邪”、“奸人”；郭嵩焘、丁日昌等人是“创建邪议”；曾纪泽、李鸿章等人是“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

简直没有一个好人。郭嵩焘因为顽固派的攻击而罢了官,得到的是“湖南人至耻为伍”的孤立结局;李鸿章因为位高权重而幸免罢官,但头上也戴了不少“汉奸”、“乱臣”的帽子。与此同时,洋务派所采取的每一项重大的措施,也都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因此,洋务运动虽然历时35年,但在从奏折到函札所发出的一阵阵争吵声中,其步履却像没有拐杖的老人般蹒跚。

4

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较大的争论中,有关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的争论,是最具代表性的。

同文馆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一同开设的,其目的是培养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5年以后的1866年,奕訢等人鉴于“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这一事实,商定在同文馆的外文各馆之外,再设一个天文算学馆,招收满汉举人和恩、拔、岁、副、优贡生汉文业已通顺,年龄在20岁以上者,以及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官年轻聪慧者入馆学习,算学馆聘请西洋人担任教习。奕訢等人在奏折中将这一计划概括为“采西学,制洋器”,其中不能明说的潜台词是:面对古今的一大变局,士大夫苦苦研究的传统知识已经落伍了,只有研究西学,取法西方文明成果,才可能成为于国家自强有用的人才。也就是说,尊重西学的价值,承认西学是一门正当的学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对此评论道:“我们作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教育和文官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待了。”

奕訢等人知道,这是“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因为以政府的名义承认西学是一门学问,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鉴于这种现实,虽然天文算学馆招收的是已通晓汉文的科甲正途人员,不必另设汉教习,但奕訢等人担心该馆只有洋教习而无中国师表,给顽固派留下奉洋人为师的攻击的把柄,特意在奏折中强调要委派一名“群情崇仰”的汉教习在馆中指引开导,“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成了他们推荐的人选。尽管奕訢等人小心翼翼,但

当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计划后,还是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这一新政的出台,恰在春节前后,自然成为士大夫拜亲访友时所议论的话题。“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谎言煽惑人心”。有作俚语讥讽的:“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有作对联攻击的:“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等等。俚语与对联产生了声势,监察御史张盛藻与大学士倭仁又推波助澜,前后上折非难。

张盛藻的奏折在当天就被驳回,而倭仁的奏折则引发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

倭仁在1867年3月20日递上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奏折中认为,天文算学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之人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靠术数而能够振兴国家的。况且“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其精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因此,坚持要求“力罢前议”。

朝廷没有将倭仁的奏折驳回,而是以“该衙门知道。钦此”的不置可否的态度,交付朝中再议。这样,同文馆能否开设天文算学馆重新成为问题。4月6日,奕訢等人上奏折对倭仁的观点进行了反击。在奏折中,他们再次强调了办洋务的目的——“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他们指出:洋人敢于中国肆行无忌者,缘起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设,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不知彼而又不求知彼,徒以道义空谈,已经误了;而今我们要设法求知,却又众议交攻,一误何堪再误!如何解决这种无意义的纷争,奕訢等把球踢给了倭仁:该大学士既以为设立天文算学馆与祖制不合,自必另有计谋,如果确有可以制外国而又不为外国所制的妙策,我们自当追随其后,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相信”。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折,仍然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朝廷“用

人”与“行政”，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转致于人才、政体两无裨益”。通篇没有什么“妙策”，还是老调重谈一番。

4月23日，奕訢等人又上一折，继续斥责倭仁。他们对以“道学明高”自居，在国家处于危亡之秋而仍不自醒的倭仁之流的人深恶痛绝，决心把这个道学家也拉进洋务的“污水”之中。他们奏称：倭仁原奏内谈道：“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其精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据此可知，内外臣工多年内访求人才而不可得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既如此，应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清政府当天便批准了奕訢等人的请求，着倭仁另设一馆。25日，又传出诏令：倭仁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可着实将了倭仁一军。如遵旨，岂不是佛头着粪？而如推辞，自己前已有言，岂能食之？思谋再三不得主意，倭仁只好找与自己一样的“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的李盛藻、翁同龢、徐桐等帮忙。据翁氏日记记载，此后数日，他们互相串联，“商略文字”，议论对策。商量的结果，倭仁只能打自己一个嘴巴，承认前奏折是信口开河：“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至于任总理衙门行走一职则坚辞不受。

虽然倭仁上朝递折时竟至涕泪滂沱，但清政府坚决不准他推辞受职。25日，他只好含泪受命。为避免到总理衙门而受到洋务“污水”的污染，他忽然得了“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的重病了。

奕訢等人把倭仁给攻成“重病”了，但并没有摆脱成为众矢之的的结局，顽固派们的攻击还是日甚一日。通政使于凌辰、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等人继续阐发倭仁的观点，他们在奏折中，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并对奕訢等人进行人身攻击。

双方愈演愈烈、势同水火的争论如果持续下去，将可能会使朝廷陷入瘫痪状态，清廷只好出面劝解。6月30日发布“上谕”说：“杨廷熙奏

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一折，奴才数千言，甚属荒谬。……杨廷熙此折，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闻；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从这段话的语气看来，清廷对倭仁、杨廷熙等人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不过，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又是“和事佬”的口吻了：“该大学士（指倭仁）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著于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会同该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

一场争论就这样化解了。从表面上看，顽固派反对设立天文馆的阴谋没有得逞，洋务派算是胜利了。但是，自这场争论开始以来，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特别是正途出身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有限的学生（当时约有40人）中流品也一般。据说，该十人中只能有五人毕业，殊非当初所期。从这方面来讲，雄心勃勃的同文馆计划，还是遭到了凄惨的失败了。

5

洋务派在与顽固派争争吵吵之中，步履蹒跚而又坚忍不拔地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自强历程，民族工业和军事工业艰难地起步了，并诞生了让清政府赖以自负的本钱——北洋舰队。但是，当1894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支花费了大量银钱的海军竟然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给中国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邓世昌等将领以身殉国的精神和普遍的屈辱心理。以此为标志，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了。

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没有向西方学习吗？而军舰的技术确是来自西方；是不舍得花钱吗？事实又不是这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悲怆而沉重的话题，至今人们仍在谈论着。

当年李鸿章面对顽固派诋毁和攻击的吵吵嚷嚷声，不胜其烦，以至于有时十分懊丧。他曾颇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言官制度，最足以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信口开

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必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路线,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已。……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这番话虽具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不足全信,但倒使我们想到了现代的决策理论。

现代决策理论揭示:一项新政策的成败具

有共同规律。由于传统的阻力,新政策在开始执行就失效的概率很高,这叫早期失效阶段;如果能坚持下去,转入正常,新政策就会发挥其功效,失效率也会随之减少,这叫偶然失效阶段;继续执行相当时间之后,政策就会老化,失效率又会增大,这叫损耗失效阶段。在争吵声中上马的洋务运动,根本没有机会转入所谓的“偶然失效阶段”和“损耗失效阶段”,不管经历多少年,仍走不出“早期失效阶段”,因而,它失败的命运,在开始时已被注定了。

(责任编辑 仲文)

《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读后

《炎黄春秋》编辑部:

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马仲扬同志《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一文,有一些感想。

文中说:“他(康生)有上谗得宠的权术,又有制造冤假错案的‘特长’”。确实如此。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与康生曾有过接触。当时中央研究院是整风试点单位,开始时对王实味错误思想作批评,由于康生插手,把这次思想批评变成政治斗争,又由政治斗争变为敌我斗争,最后直至将王逮捕、处死。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领导,康对李不满而认为李领导不力,又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就采用“上谗”的权术,将李调出中央部门,下放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我当时在中央研究院为哲学研究员,整风时暂调党委工作,故深知其详。

对杨献珍,我没有接触过,但知道他是我们党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读了马文,知道他在“‘大跃进’的昏热”年代,就有对“浮夸风”、“共产风”提出批评的胆识,以后又坚持斗争,我对他也更加尊重。

我在《我所认识的艾思奇》一文(载《炎黄春秋》今年第3期)中,谈到杨献珍和艾思奇的关

系。我是根据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的记述写的,没有一一查实。我在文中说过马列学院秘书长周文,是杨以“叛党自杀”罪名将他开除党籍的。后查明这不符事实。我在文中又说过艾思奇在写批判“合二而一”文章时有些偏颇之处。后查明在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艾奉命写文章,不仅有些偏颇,也确有些上纲上线,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特此说明和更正,并致歉意。

康生在党内究竟干过些什么和多少坏事,远的不说,仅从1942年我在延安与他有过接触算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清理审查开除他的党籍为止,也有三四十年。为什么如此一个大奸,能隐藏在党内如此之久并步步得逞高升呢?这不能光从个人原因,而应从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党的某些制度上找出根源。我希望《炎黄春秋》能继续发表些记述历史(包括党史)上重大事件(包括人物)的文章,重点在总结有益的根本的教训,更好地做到以史鉴今,以史育人。

温济泽

1996年9月23日

司马迁后人 今安在

● 李 镜

司马迁有没有后代？

陕西韩城，以司马迁故里而名播天下。而今日走遍韩城城里城外，虽以“司马”为地名、店名者比比皆是，却无一户一宗姓司马的人家。

莫非一代史圣司马迁身后无嗣？抑或有，却不在韩城？

欲求答案，当然首先应该问司马迁本人。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家世：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错孙薪，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薪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薪孙昌……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毕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司马迁清晰地记叙了司马氏以父系为中心的族系沿革，直至他“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文中的少梁、夏阳即古之韩城。华池、高门在韩城西南，是司马迁的出生地。由于在“自序”里司马迁没有再往下续写，有人就据此推断，司马迁因遭李陵之祸受

宫刑，丧失了生育能力，没有留下后代。

乍看，似有道理。但若稍做留意，司马迁“无后”说便不能成立了。

司马迁是在汉武帝天汉三年以“诬上”被定死罪的。天汉四年，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自请宫刑”。司马迁生年已不可考，若认同司马迁生于汉景帝刘启中元五年，则受刑时已49岁。依另一种说法，以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计，到受刑时则是36岁，因此，受宫刑，并没有影响司马迁早年的生儿育女。

司马迁在炽热沸腾的《报任安书》里，已经向世人和后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这一段文字，司马迁告诉我们，他没有兄弟，却有儿子。

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的后代有这样的记载：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书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不难看出，司马迁不但有儿子，还有女儿（由外孙杨恽可知）。还可得知，在新莽政权时，司马迁的后代还被封为“史通子”的官。

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关于司马迁之后的司马氏的记述，仅此而已。这并不奇怪，不要指望沉甸甸的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会留给被汉武帝判了死刑的司马迁更多的位置，他的家族在那个时代也注定不会显赫起来的。

历史从来都是显赫者的殿堂。

像司马迁这样的文人的后代，注定要默默无闻。

直至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韩城来了一位叫作翟世琪的知事。这位敬慕司马迁的翟大人，为考证司马迁的后代很费了一番工夫。最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勒石为碑，立于重建的太史庙前，于是，有关司马迁后人的情况便有了一些眉目：

司马子长（迁字子长）有二子，长临，字与仲；次观，字何求。史通，临之孙也。莽为安汉公，封史通。史通僻莽乱，偕逢萌居嵩阳，寻迁南阳。

据此可以认定，司马氏到了他的重孙任史通子时，已有一支因避乱由韩城逃到了河南。

那么，韩城还有没有司马迁后裔呢？

司马迁的后代在韩城

在韩城，几乎所有的韩城人都可以告诉你：司马迁的后代在韩城。那口气不容置疑。

这年清明节，当笔者来到芝川镇的司马迁衣冠冢

华池寻根

前,向一位皓首白发的老者提出这个问题时,老者指着坟前的香表供奉,拂髯答曰:“你早来两个钟头,我就把太史公的后人介绍给你了。”

“从资料上看,司马迁后代到其重孙封史通子时,不是已迁到河南去了吗?”

“哦,那是翟县令说的。”老者不愧是太史公故里人,对有关司马迁的事情了如指掌。“翟县令为官清正,执论严谨,但为重建太史庙撰文立碑时却出了几处纰漏。如翟碑所说‘史通避莽乱,偕逢萌居嵩阳,寻迁南阳’考证不足,难以服人。又如碑中另一处说三国时的司马懿是司马迁次子观的八世孙,则更为荒谬。从《三国志》到《晋书》都不难得知,司马懿分明是司马迁的先祖‘去周适晋’、分散在赵国的一支,与司马迁没有任何关系。”老人拉回了话题,“司马迁后人没有去河南,就在韩城。”

“既然司马迁的后人都在韩城,为什么韩城没有姓司马的?”我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是哩,韩城如今没有司马这一姓了。”老者站了起来,用手指一指刚才指过的远处,对我说:“去一趟徐村吧,走一趟华池吧,司马迁的后人在那里。”

见我迟疑,老者又说:“徐村有两大姓,一姓冯,一姓同,华池一大姓马家,都是司马迁的后代。”

韩城冯、同、马姓都是司马迁的后代!?

我不敢小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默默繁衍着司马氏家族的黄河岸边的这个土不拉叽的韩城。

华池在韩县城西南18里。

驱车上原,一片葱绿,终于,一块一人高的石碑竖立在一大片村舍前,三个遒劲的套红大字赫然标出:华池村。

两千年的历史在瞬间拉近了。

一进村,我就向一个老婆婆打听。

“这几年,来寻太史公后人的多了,村里还办了个研究会,我给你喊人,领你去。”说着,老婆婆把一个满脸脏兮兮的七八岁的孩子喊过来交待了几句,那孩子便带着我们走过两条村街,来到了一个干打垒的院子前,孩子推开门,把我们让进了院子,然后朝一间屋喊道:“启怀爷爷,有客人哩!”屋里就走出了一个精瘦的老人。老人客气地要把我们往屋里让。老人从屋子里端出了一个矮桌,招呼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拿来碗,倒上水。于是老人开始了他的介绍。

老人叫马启怀,是司马迁的嫡裔。现为华池村司马迁研究小组成员。

一段为外界鲜知的历史掌故从马启怀老人的口中娓娓道了出来:

司马迁之后,韩城司马氏并没有弃家远去。司马迁虽因李陵之祸受腐刑,但并未累及家庭,况且在他受刑的第二年,汉武帝即“赦天下”,司马迁亦获出狱。出狱



作者与马启怀在华池司马书院



徐村司马迁传人周旭



韩城的司马迁后代们

后,即被任为中书令。在以后的几年里,司马迁还多次作驾出巡。此时的司马迁在帝都虽蒙冤含垢忍辱负重,然几千里外的故乡家人却还算安宁,因此族人没有“去家”之必要,司马迁的后代便在无求无欲的状态中在故乡华池繁衍下来了。

三国时诸葛亮的师父司马徽是司马迁长子司马伉的嫡派。直至今时,韩城司马还未改姓。

司马迁后代改姓马,是在司马晋朝之后的刘宋王朝。晋亡后,刘宋王朝惧怕司马晋朝死灰复燃,遂对司马氏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搜捕和杀戮。朝廷剪灭司马的消息传到韩城后,华池司马迁后裔怕遭受牵连,遂改姓,去“司”留“马”,隐姓改名,以求自安。

“太史公马姓后人,只华池一宗么?”我问。

马启怀摇摇头:“华池马姓,后来也有走出去的,现今韩城市的赵峰村、北阳村、马圪劳、司马迁祠所在的芝川镇,远到到合阳县的伏柳村,都有不少马姓,他们都说司马迁的后代,其祖先在华池村。每到清明,他们都要来祭祖。先到华池拜扫司马墓,再到高门拜扫司马昌、毋恽、喜、谈等列祖列宗墓,最后到芝川镇拜扫司马迁墓。所以在韩城高门司马祖茔,人们又称为马家冢。”

马启怀侃侃而谈,如数家珍。言毕,又兴致很高地带我们参观了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司马书院”和同样残破不堪的马家祖祠。

华池的一砖一瓦,都浓缩着一段历史。

徐村溯源

华池西行十里是徐村。南、北、东三面环沟,地势险要。这里居住着冯、同二姓,也是司马迁的传人。

在村中一间简朴的青砖瓦房里,我们见到了徐村司马迁研究小组的同旭、同熏两位老先生,他们都是“同”姓司马迁的后人。

同旭告诉我,徐村其实并无徐姓。

既无徐姓,缘何以“徐”为村名?

他们归纳了这样几种说法:

一、司马迁因李陵案被判死刑,又改判宫刑。消息传到故乡,司马氏惧诛九族,族人将司马分姓,长门在“马”字实加两点改姓“冯”,二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阖族逃往老牛坡下,定村名为“续村”,后改为“徐村”。

二、司马氏原居住在南高门村,晋朝末年,刘宋剿杀司马遍地血腥。夏阳司马闻讯恐有不测,隐“司马”,改姓“冯”、“同”,举族逃到老牛坡下,是有续村。“续”、“徐”同音,便叫成了徐村。

三、司马迁后裔曾流徙河南南阳。晋朝末年,为避刘裕诛杀,改姓“冯”、“同”,从南阳返回故乡夏阳高门定居,后迁往老牛坡,定名“续村”,有延续司马迁遗脉之意,后改为徐村。

不论哪种说法,都认定“徐”自“续”而来。

听了同旭、同熏一番解释,笔者于豁然开朗之际,不禁又从徐字字形得出另一种解释。司马迁后裔宗族感情十分强烈,为了延续生存,既然能将司马分为“冯”、“同”,为什么不会在自己的居住地上做做文章,既能遮人耳目,又让子孙后世不忘自己是司马迁的传人呢?如将“徐”字拆开,可解释为“余二人”,与徐村遭司马迁之后二门正好吻合。同旭、同熏听了我的这番议论,认为不无道理,并笑道,于此,关于“徐村”,由来又多了一种说法。

我忽然想知道今天韩城到底有多少司马迁后代。问同旭,同旭说不可考,至少也有几千口。光徐村冯、同二姓六门就有近三百户,约两千人。

韩城司马氏,从司马迁九世祖到司马迁,九世单传。长眠在芝川镇司马坡上的太史公恐怕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竟是别一番景象,人丁兴旺,绵绵不绝。

正如徐村“汉太史遗祠”大门上一副楹联所书:

族聚韩原枕山带河一片地脉光先业

姓分司马绍开永德万卷诗书启后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祝賀「炎黃
春秋」创刊
五周年

炎黃文史春秋
肇秋實
發隱傳真光耀神州

祝賀「炎黃文史春秋」创刊五周年

壬午年九月廿四日
吳昌碩

壬午年九月廿四日
吳昌碩



為炎黃文史春秋创刊五周年而作
以垂一覽于雅志

吾本炎黃後
理當共春秋

丙午年九月廿四日
吳昌碩

炎黄春秋



韦国清与莫边府大捷

马上诗人张爱萍的长征诗

异国航天业巡礼

我的老师闻一多

芬娜走进蒋介石的家门

司马迁后代今安在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2817/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00元